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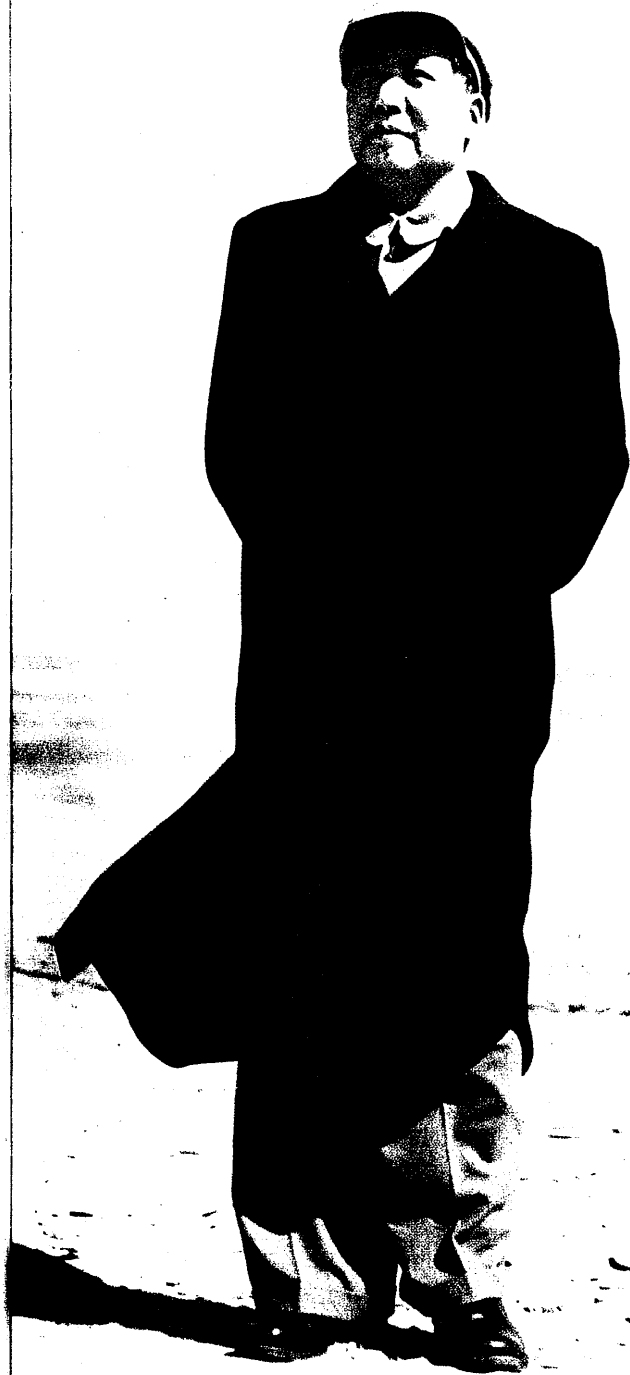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6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任：流星
策划：树旺
编审：黄惠丽

主编：张迪杰
副主编：宋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革 杨健桢 听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颖 杨泽
编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桢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1
(1949年1月20日)	
给司徒美堂的信·····	6
(1949年1月20日)	
给陈嘉庚的信·····	7
(1949年1月20日)	
复林彪、罗荣桓电·····	8
(1949年1月20日)	
复林彪、罗荣桓电·····	9
(1949年1月20日)	
致中共天津市委等电·····	10
(1949年1月20日)	
复潘汉年电·····	11
(1949年1月20日)	
傅作义部队出城整编的部署的指示·····	12
(1949年1月21日)	
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	15
(1949年1月21日)	
关于转发东北九纵和刘谭电据以鼓励士气增强纪律致林彪等电·····	19
(1949年1月21日)	

要把北平敌军改编当作一件大事来完成	20
(1949年1月22日)	
复林彪等电	21
(1949年1月22日)	
蒋介石“引退”真相	22
(1949年1月22日)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	24
(1949年1月22日)	
复林彪等电	26
(1949年1月23日)	
复林彪等电	27
(1949年1月23日)	
解决太原问题的部署	28
(1949年1月24日)	
复林彪等电	29
(1949年1月24日)	
复李济深电	30
(1949年1月24日)	
致林彪、罗荣桓等电	31
(1949年1月24日)	
中共发言人就和平谈判问题发表谈话	32
(1949年1月25日)	
勿擅自向外表示态度	34
(1949年1月26日)	
不要在约法八章等之外再发任何口号	36
(1949年1月26日)	

在《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上加写的话	39
(1949年1月27日)	
在致吴克坚的电报上加写的话	40
(1949年1月28日)	
致刘伯承等电	41
(1949年1月28日)	
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 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	42
(1949年1月28日)	
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各民主人士对战犯名单意见致东北局电	48
(1949年1月28日)	
中央社窜改中共发言人声明用意何在	49
(1949年1月31日)	
北平解放	53
(1949年1月31日)	
哀悼冯裕芳的唁电	56
(1949年1月31日)	
为《天津日报》题写报头	57
(1949年1月)	
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	58
(1949年2月1日)	
复李济深等五十六人电	65
(1949年2月2日)	
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电	67
(1949年2月3日)	
复彭真、叶剑英等电	68
(1949年2月3日)	

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	69
(1949年2月5日)	
复彭真、叶剑英、徐冰电	70
(1949年2月5日)	
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	71
(1949年2月5日)	
中共发言人声明拒绝甘介侯来平	75
(1949年2月7日)	
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78
(1949年2月8日)	
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	81
(1949年2月9日)	
复彭真、叶剑英电	82
(1949年2月10日)	
复潘汉年电	83
(1949年2月10日)	
对部队进行地理常识教育极为重要	84
(1949年2月10日)	
同意三月底渡江作战的计划	87
(1949年2月11日)	
中共中央关于苏联贸易机关在烟台设立分号事给华东局的电报 ..	91
(1949年2月11日)	
东北野战军先出两个军迫近汉口钳制白崇禧部	92
(1949年2月12日)	
关于归绥问题谈判的方针	94
(1949年2月12日)	

不要轻敌甚为重要	95
(1949年2月13日)	
任何外国或联合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	97
(1949年2月13日)	
致天津市委等电	98
(1949年2月13日)	
为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致杜镛和魏文翰电	99
(1949年2月13日)	
致天津市委等电	101
(1949年2月13日)	
在中共中央关于对邵力子等谈话方针问题的电报稿上加写的话	102
(1949年2月14日)	
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应按时向太原出动	103
(1949年2月15日)	
把南北通船通航通邮诸事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104
(1949年2月15日)	
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	107
(1949年2月15日)	
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	111
(1949年2月15日)	
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	112
(1949年2月16日)	
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	117
(1949年2月18日)	
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电	124
(1949年2月18日)	

致叶剑英等电·····	125
(1949年2月20日)	
致叶剑英等电·····	126
(1949年2月20日)	
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	127
(1949年2月21日)	
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	128
(1949年2月21日)	
和傅作义的谈话·····	132
(1949年2月22日)	
给周恩来的信·····	133
(1949年2月26日)	
复华东军区电·····	134
(1949年2月27日)	
致罗荣桓电·····	135
(1949年2月27日)	
同意三个兵团攻击方向之区分的部署·····	136
(1949年2月27日)	
防止敌袭扰我后方的部署·····	137
(1949年2月28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139
(1949年3月5日)	
复沈钧儒、章伯钧电·····	159
(1949年3月10日)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160
(1949年3月13日)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	165
(1949年3月13日)	
十九、二十兵团按原计划集结·····	175
(1949年3月17日)	
第四野战军主力应于四月一日前完成出发准备·····	176
(1949年3月17日)	
待谈判接触数天后决定是否攻占浦口浦镇·····	178
(1949年3月19日)	
第四野战军先头两个军的任务·····	180
(1949年3月20日)	
复陈毅、谭震林电·····	182
(1949年3月20日)	
致中原局电·····	183
(1949年3月21日)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	184
(1949年3月23日)	
嘉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	188
(1949年3月24日)	
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电·····	200
(1949年3月27日)	
致林彪、罗荣桓电·····	201
(1949年3月28日)	
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	202
(1949年3月28日)	
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电·····	203
(1949年3月29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	204
(1949年3月30日)	
为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题词·····	205
(1949年3月)	
复傅作义电·····	207
(1949年4月2日)	
致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电·····	209
(1949年4月2日)	
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	210
(1949年4月3日)	
同意太原作战方案·····	212
(1949年4月3日)	
对桂系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采取具体步骤·····	214
(1949年4月4日)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	216
(1949年4月4日)	
应即派人进城接洽和平解决太原问题·····	221
(1949年4月5日)	
关于如何对待桂系部队的问题·····	222
(1949年4月5日)	
给周恩来的信·····	224
(1949年4月5日)	
复白崇禧电·····	225
(1949年4月5日)	
注意吸收自由资产阶级代表参加工作·····	227
(1949年4月7日)	

为李宗仁电报写的按语·····	229
(1949年4月)	
复李宗仁电·····	230
(1949年4月8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231
(1949年4月10日)	
致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电·····	232
(1949年4月10日)	
致总前委等电·····	233
(1949年4月10日)	
攻击太原时间推迟至二十二日·····	234
(1949年4月11日)	
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题词·····	236
(1949年4月11日)	
复总前委等电·····	240
(1949年4月11日)	
致周恩来电·····	241
(1949年4月13日)	
关于我军渡江时间的考虑·····	242
(1949年4月14日)	
准备攻占安庆至南通一线北岸敌人据点·····	244
(1949年4月14日)	
致总前委等电·····	246
(1949年4月15日)	
复粟裕、张震等电·····	247
(1949年4月15日)	

致总前委等电·····	248
(1949年4月16日)	
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	249
(1949年4月16日)	
可在任何有利时间攻打太原·····	252
(1949年4月17日)	
必须争取渡江一举成功·····	254
(1949年4月17日)	
南京方面和平协定须于二十日前表态·····	256
(1949年4月17日)	
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	257
(1949年4月18日)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260
(1949年4月21日)	
复粟裕、张震等电·····	270
(1949年4月21日)	
致总前委等电·····	271
(1949年4月22日)	
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272
(1949年4月22日)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274
(1949年4月22日)	
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的联合进攻·····	277
(1949年4月22日)	
致总前委等电·····	280
(1949年4月23日)	

复杨成武、唐延杰、李天焕等电·····	281
(1949年4月23日)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	282
(1949年4月24日)	
第十八第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	287
(1949年4月2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289
(1949年4月25日)	
复彭德怀等电·····	293
(1949年4月25日)	
给胡乔木的信·····	294
(1947年4月26日)	
在李涛送审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295
(1949年4月26日)	
书报上的错误必须更正·····	296
(1949年4月)	
要做好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	298
(1949年4月27日)	
应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	299
(1949年4月28日)	
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301
(1949年4月28日)	
关于稳住汤恩伯及外交对策问题·····	302
(1949年4月28日)	
复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信·····	304
(1949年4月28日)	

- 复粟裕、张震等电·····305
(1949年4月29日)
-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306
(1949年4月)
-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314
(1949年4月29日)
- 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320
(1949年4月30日)
- 高级领导机关对下级应加强文电指示·····321
(1949年4月30日)
- 复粟裕、张震等电·····323
(1949年4月30日)
- 致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电·····324
(1949年4月30日)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325
(1949年4月30日)
- 给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的信·····328
(1949年4月30日)
- 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以分置于皖南赣东浙西三区为适宜·····335
(1949年5月1日)
- 为《人民晚报》题写报头·····337
(1949年5月1日)
- 复徐向前等电·····338
(1949年5月3日)
- 致总前委等电·····339
(1949年5月3日)

致斯大林电·····	340
(1949年5月3日)	
推迟占领杭州上海的时间·····	341
(1949年5月3日)	
为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题词·····	343
(1949年5月4日)	
在柳亚子《羿楼纪念册》上作题记·····	347
(1949年5月5日)	
占领吴淞嘉兴等地应注意的问题·····	350
(1949年5月6日)	
望刘金轩部向汉中方面行动切断胡宗南逃路·····	354
(1949年5月8日)	
复粟裕、张震电·····	356
(1949年5月8日)	
关于第四野战军应提早渡江及十三个军的使用问题·····	357
(1949年5月9日)	
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问题·····	359
(1949年5月10日)	
复总前委等电·····	362
(1949年5月10日)	
致粟裕、张震等电·····	363
(1949年5月10日)	
致东北局等电·····	364
(1949年5月14日)	
为张瑞岐题词·····	365
(1949年5月16日)	

- 复林彪、萧克等电·····366
(1949年5月16日)
- 致林彪、罗荣桓、萧克等电·····367
(1949年5月17日)
- 对何应钦四月三十日部署之对策·····368
(1949年5月17日)
- 电慰国民党起义伞兵·····372
(1949年5月18日)
- 致起义海军官兵电·····373
(1949年5月18日)
- 复郭沫若、许德珩等二十九人电·····374
(1949年5月18日)
- 致总前委等电·····375
(1949年5月19日)
- 第四野战军三个军在江西的作战部署·····376
(1949年5月19日)
- 总攻上海的时间和步骤·····378
(1949年5月20日)
- 对外国军舰轮船进入黄浦江的处理办法·····379
(1949年5月20日)
- 致林彪、萧克、谭政、陶铸电·····381
(1949年5月20日)
- 致华中局等电·····382
(1949年5月21日)
- 给柳亚子的信·····383
(1949年5月21日)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杭州市委重组文件致华中局等电·····	385
(1949年5月21日)	
致香港分局电·····	387
(1949年5月23日)	
致华中局、西北局电·····	388
(1949年5月23日)	
在中共中央给华东局并告华中局、西北局等电上加写的一段话··	389
(1949年5月23日)	
关于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	390
(1949年5月23日)	
为《长江日报》题写报头·····	393
(1949年5月23日)	
对张轸部按起义待遇加以改编·····	394
(1949年5月25日)	
歼灭桂系主力的作战部署·····	396
(1949年5月25日)	
致萧劲光、陈伯钧等电·····	398
(1949年5月25日)	
致各野战军电·····	399
(1949年5月25日)	
同意第一野战军暂时停止前进·····	400
(1949年5月26日)	
通报平津接收企业的经验·····	402
(1949年5月26日)	
预备对策防备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	404
(1949年5月28日)	

复林彪等电·····	406
(1949年5月28日)	
占领粤桂川滇黔五省所面临的两个问题须立即去办·····	407
(1949年5月28日)	
致罗荣桓、黄克诚电·····	408
(1949年5月28日)	
十三兵团进击宋希濂部的两个方案·····	409
(1949年5月29日)	
祝上海解放·····	411
(1949年5月29日)	
复第二野战军前委电·····	415
(1949年5月30日)	
关于认真对待“左”倾错误的通知·····	416
(1949年5月31日)	
中共中央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	417
(1949年5月31日)	
为人民铁道报题写报头·····	419
(1949年5月)	
给张澜的信·····	420
(1949年6月1日)	
在中共中央对第四野战军前委关于进入江南新区指示的批复上加写的话·····	422
(1949年6月1日)	
第四野战军休整和作战的部署·····	423
(1949年6月2日)	
入川入闽行动时间等问题·····	426
(1949年6月2日)	

- 各外国不应再与国民党逃亡政府发生关系·····428
(1949年6月3日)
- 诱敌深入俟兵力集中再打·····429
(1949年6月9日)
- 给任弼时的信·····430
(1949年6月9日)
- 中共中央关于留用旧职员工人工薪问题致华中局等电·····433
(1949年6月10日)
- 给胡乔木的指示·····435
(1949年6月10日)
- 复彭德怀电·····436
(1949年6月11日)
- 致周恩来电·····437
(1949年6月13日)
- 致华东局等电·····438
(1949年6月14日)
- 复粟裕、张震、周骏鸣等电·····439
(1949年6月14日)
- 充分注意敌人中间突破的战法·····440
(1949年6月15日)
-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441
(1949年6月15日)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448
(1949年6月15日)
- 给张轸将军及前国民党军十九兵团的复电·····451
(1949年6月16日)

- 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452
(1949年6月16日)
- 粮食困难行动时间可酌情推迟·····454
(1949年6月17日)
- 第二野战军西进似以九月为宜·····455
(1949年6月17日)
- 在薛愚的来信上批示·····457
(1949年6月19日)
- 钳制马继援等部消灭胡宗南的作战部署·····458
(1949年6月20日)
- 致华东局等电·····460
(1949年6月21日)
- 复吴奇伟将军等电·····461
(1949年6月22日)
- 对付敌军分向渭南泾北进攻的对策·····463
(1949年6月22日)
- 复上海市委等电·····465
(1949年6月23日)
- 复华中局电·····466
(1949年6月24日)
- 复华南分局等电·····467
(1949年6月24日)
- 给胡乔木的信·····468
(1949年6月24日)
- 祝涅克索八十寿辰的贺电·····469
(1949年6月24日)

- 钳制两马歼灭胡宗南四五个军·····470
(1949年6月26日)
- 致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电·····472
(1949年6月26日)
- 对进军西北和川北的部署·····473
(1949年6月27日)
- 给周谷城的信·····476
(1949年6月28日)
- 致林彪、邓子恢、谭政、陶铸电·····477
(1949年6月28日)
- 论人民民主专政·····478
(1949年6月30日)
- 为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塔题名·····495
(1949年6月)
- 中共中央电贺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497
(1949年7月1日)
- 为华北军政大学成立一周年题词·····499
(1949年7月1日)
- 为《新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题词·····501
(1949年7月2日)
- 哀悼季米特洛夫的唁电·····503
(1949年7月3日)
- 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504
(1949年7月4日)
- 给程潜的信·····507
(1949年7月4日)



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1]

(1949年1月20日)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陈赓^[2]诸同志，华东人民解放军和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同志们：

淮海战役自去年十一月六日开始，至今年一月十日已完全胜利结束。在这六十五天作战中，你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南线的主力黄百韬兵团^[3]全部五个军十个师，黄维兵团^[4]全部四个军十一个师（内有一个师起义），杜聿明所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5]全部十二个军三十一个师（内有一个骑兵旅），冯治安^[6]部两个

[1] 这个电报大部分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

[2] 刘伯承，当时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小平，当时任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张云逸，当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谭震林，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陈赓，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3] 指黄百韬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

[4] 指黄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

[5] 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当时分别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

[6] 冯治安，原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



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1]

(1949年1月20日)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陈赓^[2]诸同志，华东人民解放军和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同志们：

淮海战役自去年十一月六日开始，至今年一月十日已完全胜利结束。在这六十五天作战中，你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南线的主力黄百韬兵团^[3]全部五个军十个师，黄维兵团^[4]全部四个军十一个师（内有一个师起义），杜聿明所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5]全部十二个军三十一个师（内有一个骑兵旅），冯治安^[6]部两个

[1] 这个电报大部分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

[2] 刘伯承，当时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小平，当时任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张云逸，当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谭震林，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陈赓，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3] 指黄百韬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

[4] 指黄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

[5] 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当时分别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

[6] 冯治安，原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

军四个师（内有三个半师起义），刘汝明^[1]部一个师，孙良诚^[2]部一个军两个师，宿县、灵璧守军各一个师，以上共正规军二十四军六十一个师，加上其他部队，共消灭敌军兵力五十三万余人。你们生俘了战争罪犯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聿明，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及国民党军其他高级将领多名，击毙了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你们击退了李延年^[3]、刘汝明两兵团的增援，迫使他们向沿江一线逃窜，从而使淮河以北地区完全解放，使淮南一带地区亦大部入我掌握。你们在淮海战役中获得如此伟大的胜利，与东北人民解放军在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诸役中的伟大胜利一样，证明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的强大，因此我军能在一个战役中同时包围敌人的几个兵团，连续消灭敌人六十一个整师（内有四个半师起义）。淮海战役既然消灭了南线国民党军的主力，这就奠定了你们渡江南进夺取国民党匪巢南京，并解放江南各省的巩固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我参加此次伟大战役的一切指挥员、战斗员、前后方服务的工作人员、游击部队、民兵等全体人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慰问。同时告诉你们：敌人的主力虽已消灭，敌人的残部尚图抵抗，南京伪政府尚在布置所谓“京沪决战”。南京伪政府发动反革命战争，残杀数百万人民，在所谓“剿匪”“戡乱”的伪令之下，压迫工、农、兵、学、商各界人民，无所不用其极。凡此种种，南京伪政府今已自食其果，主力被歼，众叛亲离，伪政府统治已至不能维持的境地。在此种形势下，南京伪政府乃由战争罪

[1]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

[2] 孙良诚，原任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一〇七军军长。

[3] 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

犯蒋介石、孙科^[1]等出面，一面提出虚伪的反动的和平条件，一面布置所谓“京沪决战”，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保存匪帮残余力量，取得美帝国主义援助，休养生息，然后向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消灭人民解放军。此种阴谋诡计，现已完全暴露。现在全国人民对于南京伪政府业已完全丧失信任，伪政府已无继续存在之余地。伪府诸酋，虽欲恋栈，已不可能。为使全国人民早日获得和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业已向南京伪政府提出八个真正的民主的和平条件，等候南京伪政府答复。如果他们同意这些条件，你们即应和平地开入南京，代表中国人民接收南京伪政府的一切权力，听候即将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处理。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些条件，那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建议不过是一个骗局，你们即应命令南京伪政府投降。如果他们又不愿意投降，你们即应歼灭之。在等候南京伪政府答复我们的和平建议的期间内，你们的攻击暂以长江北岸为范围，准备渡江，但是不要立即渡江，以便给南京伪政府人员一个考虑和战的机会。

在这里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不论和战，战争罪犯是必须拘捕的。我们的八个和平条件的第一个，就是惩办战争罪犯。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争罪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何应钦、吴铁城、王世杰、戴传贤、张群、陈果夫、陈立夫、翁文灏、王云五、张厉生、朱家骅、顾祝同、刘峙、余汉谋、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陶希圣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企图继续作恶。你们现在就应侦察他们的动向，以便你们在不论是和平开进或者战斗解决时，能够不失时机，一律拘捕，

[1] 孙科（1891—1973），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

交给人民法庭判罪。一切在逃之战争罪犯，即使逃到天涯地角，亦须穷追务获，归案法办，决不宽恕。而对于其他在伪党伪政府系统内服务之绝对大多数人员（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则应采取宽大政策，免于追究，并可分别优劣，量材录用，转为人民政府服务。对于那些过去犯有罪咎，现已彻底悔悟，愿从伪方自拔来归，或愿于伪方不愿和平解决时里应外合协助我军攻城歼敌者，应即准予将功折罪，并得依其情况酌予奖励。总之，你们应按照人民解放军总部早已宣布的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三项原则，妥为办理，不纵不滥，以竟全功。

现在长江以南一带地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工、农、兵、学、商各界广大人民群众，盼望你们前去，帮助他们获得解放，十分迫切，你们的责任还很重大。希望你们团结一致，继续努力，为完成解放南京及江南一带地方的伟大任务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淮海大战》（油画）



《淮海大捷》（油画）

给司徒美堂^[1]的信

(1949年1月20日)

司徒美堂先生：

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惠书，因交通阻梗，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谨电欢迎，并盼赐复。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1] 司徒美堂（1868—1955），广东开平人，爱国华侨领袖。曾任美洲致公党主席。1949年应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给陈嘉庚^[1]的信

(1949年1月20日)

嘉庚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1] 陈嘉庚（1874—1961），福建厦门人，爱国华侨领袖。1949年应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复林彪、罗荣桓电^[1]

(1949年1月20日)

根据莫文骅报告^[2]看来，北平出城谈判之十个代表是傅作义布置准备和我们和平解决的一个步骤。此种代表出城谈判，对于我们争取北平人心向我，瓦解敌军内部及促使傅作义出城改编是有益的。如该代表等再来要求见你们或见叶^[3]时，应妥为护送招待，并接见他们，但要警惕其可能的破坏行为。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2] 林彪、罗荣桓1月19日给中共中央军委转去的第四纵队政治委员莫文骅的报告说：我与北平出来谈判之代表见面，他们之中以何思源为首，谈话中表示要给傅作义一条路走，不要逼得太紧，双方代表谈判应和平解决，以免北平打坏了，并要求见叶参谋长。我已将总部指示向北平出来之十个代表提出，当时大家认为满意，干脆、很宽大，特别是傅部撤出城外听候改编及保障其本人、军官家属财产安全。谈话后已将代表全部送回北平。

[3] 叶，指叶剑英。

复林彪、罗荣桓电^[1]

(1949年1月20日)

同意你们规定北平守军各部开至沿平汉、津浦两线之间及三河、香河地区驻扎。但我军应重新部署，对敌军驻地取包围控制态势。并须对我军各部首长下达通令，使他们明了策略意图。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致中共天津市委等电^[1]

(1949年1月20日)

你们对待外国人的每一具体步骤，均应事先向中央提出意见，经中央批准才能行动。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共天津市委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及中共北平市委电的主要内容。

复潘汉年电^[1]

(1949年1月20日)

(一) 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十四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二) 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2]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三) 如白欲派代表与刘、邓^[3]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

[1] 这是毛泽东为周恩来、李克农起草的关于答复黄绍竑复潘汉年电的主要内容。李克农，当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黄绍竑，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副院长、立法委员。

[2] 李，指李宗仁。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

傅作义部队出城整编的部署的指示^[1]

(1949年1月21日)

林、罗：

(甲) 你们廿十日十一时半电、十九时电及转来苏静十九日廿二时电、北平党廿日十三时电均悉。(乙) 你们应即告苏静^[2]转告傅、邓^[3]：(一) 傅、邓既决心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方面，则我们便必须告诉他们对蒋介石死党提起警觉性，他将他自己的主力一〇一军及骑四师首先开出城外，他是否有把握命令十三军、九四军^[4]等部亦能出城，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怀疑的。如果蒋党不但不服从傅令反而将傅总部包围攻击，傅是否尚有足够兵力抵抗，以待我们之援助。蒋党暗害及蒋机轰炸亦须预为计及。(二) 一〇一军可以先出城，由我军接替广安门、右安门一带防务，然后令中央军各部依次出城，由我军依次接防。骑四师及其他傅部最后出城，似较稳当。(三) 如傅确已一切部署妥当，则第一个军出城日期可照原议在二十二日；如傅尚未部署妥当（主要是中央军问题），则我方可以推迟几天时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傅作义部出城整编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林彪、罗荣桓的复电。

[2] 苏静，当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人民解放军方面参加北乎和平解放谈判的人员。

[3] 傅、邓，指傅作义、邓宝珊。

[4] 第十三军、九四军，均为驻北平的国民党军中央系部队。

间。(丙) 苏静所提及你们答复各条：(一) 接收名称可以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其人选及比例可照你们所定。(二) 同意你们意见。(三) 同意。(四) 可同意傅方意见。(五) 可同意傅方意见，事实上只要部队出城，可以提早整编时间，那时他们亦不会有异议。(六) 同意。(七) (八) (九) 均同意你们意见。(十) 同意。(十一) 可同意傅方意见。(十二) 邮电照你们意见，报纸照中央意见。(十三) 不要提解散国民党三青团事，要在我们完全控制北平，秩序大定以后，才能谈得上解散及登记这些反动党派，此条可照傅方提议，以安反侧。(十四) 同意。(丁) 你们下达各首长的命令是对的，但还须注意，对出城军队取完全包围态势，以防其乘我不意，突然突围而出。固安方面单是华北七纵是不够的，我包围各纵须有很大的警惕性，须在距敌廿里外构筑防御工事，此点万不可大意。此种敌我杂居办法，我军原来没有做过，故须有充分准备，否则难免出乱子。

军委

廿一日四时

毛泽东
 档案
 林彪
 罗荣桓
 中央军委

林彪 (甲) 你们廿一、廿二两日电报及转来
 薛静九日廿二时电、北平廿廿二时电均悉。(乙) 你们
 在日告薛静转告傅部 ~~一切事宜~~
 傅部既决心站在有利抗、民事业方面我
 们便必须告 ~~诉~~ 诉他们 ~~对~~ 对薛石克提
 起警惕性他将自己的主力一、二及骑的部
 首先割出城外他是否有把握 ~~命令十三军~~
 九的军部亦能出城 对于这一点我

同意。(一) 可以同意傅方意见 (五) 可以同意
 傅方意见 以上要即出城 我们可以提早整理
 时割那时他们亦不会背盟 (六) 同意
 你们意见 (六) 同意你们意见 (七) (八) (九)
 均同意你们意见。(十) 同意 (傅方意见) (十一)
 可以同意傅方意见。(十二) 新电照你们意见报纸照
 中央意见 (十三) 不要提解放国民党清国事
 在我完全控制北平秩序大定以后 ~~傅部~~
 才能谈得上解放及军地这些反动党派此语可
 照傅方程序以安反例 (十四) 同意。(丁) 割
 下意者着长的命令是对的但还须注意 ~~对~~ 对
 出城军队取完全包围态势以防其乘我不
 意突然突围而出 围安方面是华北七旅

你们提提的如果蒋克不 ~~不但~~ 不但傅令及而傅部
 总部包围 ~~以~~ 以成傅部是否有足够的兵抵抗以
 待我们之援助 蒋克暗害及蒋机亦须预
 为计及 ~~傅部~~ 傅部 ~~亦~~ 亦须预
 接替 康安列在安列一带防 ~~傅部~~ 傅部
 然后令中央军各部依次出城 由我军依次接
 防骑的部及其他傅部最后出城 ~~傅部~~ 傅部
 (一) 如傅部一切部署妥当则第一军出城
 日期可照原计划在廿二日如傅部未部署妥当 (主
 要是中央军问题) 则我方可以推迟几天时割
 (二) 薛静所提及你们答复各条 (一) 接收
 名称可以成 ~~立~~ 立 联合解放机构其人选及比例可
 由你们研究。(二) 同意 (三) 你们意见 (三)

是不够的我包围各据点有很大的警惕性
 必须距敌廿里外构筑防寨二事此点万不可大
 意。军委廿日四时
 此种 ~~就~~ 就我团杂居
 办法我军原来没有做过
 故须有先准备。否则就
 免出乱子。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电的手稿。

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

(1949年1月21日)

【二十一日陕北电】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方通讯社中央社十九日电称：十九日上午九时行政院会议广泛讨论时局，决议如下：“政府为遵从全国人民之愿望，蕲求和平之早日实现，特慎重表示，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中国共产党发言人称：南京行政院的这个决议没有提到一月一日南京伪总统蒋介石建议和平谈判的声明，也没有提到一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建议和平谈判的声明，没有表示对于这两个建议究竟是拥护哪一个，反对哪一个，好像一月一日和一月十四日国共双方并没有提出过什么建议一样，却另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是完全令人不能理解的。在实际上，南京行政院不但完全忽视中共一月十四日的建议，而且直接推翻了伪总统蒋介石一月一日的建议。蒋介石在其一月一日的建议中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过了十九天，同一个政府的一部分机构，即南京政府的“行政院”，却推翻了政府的“总统”的声明，不是“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而是“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了。我们要问南京“行政院”的先生们，究竟是你们的建议为有效呢，还是你们的“总

统”的建议为有效呢？你们的“总统”把“停止战事恢复和平”认为是一件事，声明必定开诚相见愿与中共商讨实现这件事的具体方法；你们则将战争与和平分割为两件事，不愿意派出代表和我们商讨停止战争的具体方法，而却异想天开地建议“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然后再派代表“进行和平商谈”，究竟是你们的建议对呢，还是你们“总统”的建议对呢？我们认为南京伪行政院是越出了自己的职权的，它没有资格推翻伪总统的建议而擅自作出自己的新建议。我们认为南京行政院的这个新建议是没有理由的，打了这么久这么大和这么残酷的战争，自应双方派人商讨和平的基本条件，并作出双方同意的停战协定，战争才能停得下来。不但人民有这种希望，就是国民党方面亦有不少人表示了这种希望。如果照南京行政院的毫无理由的“决议”，不先行停战就不愿意进行和平谈判，则国民党的和平诚意在什么地方呢？南京行政院的“决议”是做出来了，不先行停战就没有和平谈判的可能了，和平之门从此关死了，而如果要谈判，则只有取消这个毫无理由的“决议”，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南京行政院不愿意取消自己的“决议”，那就是表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并无与其对方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人们要问：南京方面果有诚意，为什么不愿意商讨和平的具体条件呢？南京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这样一个论断，难道不是已经证实了吗？中共发言人说：南京现在业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伪总统有一个建议，伪行政院又有一个建议，这叫人们和谁去打交道呢？

文播一次，口播三次。

通讯

二十日陕北电：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方

社中社十九日电称：十九日上午九时行政院会议广泛讨论时局，决议如下：政府为尊重全国人民之愿望，~~早日实现和平之早日实现~~，特慎重表示，愿与中共~~各方~~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中国国民党~~发言人称~~：南京行政院的这个决议没有~~不可~~，~~且~~且~~南京~~之~~代表~~使~~说~~和平谈判的~~声明~~，也没有提到一月十四日~~中~~中~~国~~与~~毛~~毛泽东~~建~~建~~议~~议和平谈判的~~声明~~，没有表示对~~于~~于这两个建~~议~~议究竟~~是~~是~~否~~否~~反~~反~~对~~对，~~也~~也~~未~~未~~加~~加~~以~~以~~回~~回~~答~~答。

~~（中）~~好像~~（中）~~一月一日和一月十四日~~（中）~~国~~（中）~~共双方并没有提出过什么建~~议~~议，~~（中）~~（中）~~（中）~~完全令人不能理解的，却另外提出了自己的

毛泽东撰写的《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的手稿。

① 建議，這完全令人不能理解的。在實際上，蔣的政府不但完全忽視一月十四日的建議，而且直接翻覆了蔣一月十四日的建議。蔣在二月十四日的建議中說：『只要中共有和平的誠意，我們作何的表示，政府必樂於相見，務與商討停止戰爭，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過了十九天，同一個政府的一部分機構即南京政府的行政院，就推翻了這個政府的大總統的聲明，不是以商討相見，而是商討停止戰爭，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② 但是，立即先行無條件停戰，並指定代表進行和平商談了。我們要問南京行政院究竟是你們的什麼建議為有效呢？還是你的大總統的建議為有效呢？你們的大

② 總統把停止戰爭恢復和平認為一件事，聲明必定商談相見，與中共商談這件事的具體方法，你們則將戰爭與和平分為兩件事，不願意派代表與我們商討停止戰爭的具體方法，而僅僅先行立即無條件停戰，然後再派代表進行和平商談，究竟你們的建議對呢？還是你們大總統的建議對呢？③ 我們認為行政院是越出了自己的職權的，大總統推翻了大總統的建議，而擅自作出自己的新建議。我們認為南京行政院的這個建議是沒用的，打了這麼久，這麼大

④ 和這麼殘酷的戰爭，自雙方派人商討和平的具體條件，才能停下來。不但人民有這種希望，就是國民黨方面亦有不少人表示了這種希望。如果照南京行政院的毫無理由的決議，不先行停戰就不願意進行和平談判，則國民黨的和平誠意在什麼地方呢？南京行政院的決議是做出來了，不先行停戰就沒有和平談判的可能了，和平談判從此斷絕了。而如果要談判，則只有取消這個毫無理由的決議，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南京行政院不願意取消自己的決議，那就還表明南京國民黨及政府並未與其對方進行和平談判的誠意。人們要問：南京方面果有誠意，為什麼不願意商討和平的具體條件呢？

⑤ 南京的和平建議是虛偽的，這已經被證實了嗎？中共發言人說：南京現在業已陷入無政府狀態，偽大總統有一個建議，偽行政院又有一個建議，這叫人們和誰去打交道呢？

毛泽东撰写的《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的手稿。

关于转发东北九纵和刘谭电 据以鼓励士气增强纪律 致林彪等电^[1]

(1949年1月21日)

林、罗、刘、谭：

本日收到你们转来东北九纵一月十六日电及刘谭一月十九日电均已阅悉，甚为欣慰。已立即将这两个电报转发给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前委及各军区并转所属，据以鼓励士气增强纪律。所有攻击天津各部队，凡战斗英勇、纪律良好者，应予通令嘉奖，并向我军致庆贺。

军委

一月二十一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的电报。

要把北平敌军改编 当作一件大事来完成^[1]

(1949年1月22日)

林、罗、刘：

二十一日二十一时电^[2]悉。(一)为使东北全军于解决北平问题后能立即进入休整，应付迅速变动的全国局势起见，太原作战以华北部队担任为适宜，但你们须配属必要数量之炮兵。(二)北平二十余万敌军出城改编，你们须令各兵团各纵首长均看作一件大事，全军紧张地周密地在你们的统一指挥下对付这一个大事件，达到完满地处理此事件之目的，务必不要有轻敌疏忽之观点。

军委

二十二日四时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9年1月21日21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一)为防止北平敌开出后叛变逃跑或抵抗命令，已令华北七纵向保定前进，我驻廊坊之十纵移固安，插入敌各部之间，分割敌人，以便随时以我武力解决敌人。(二)北乎和平解决大约可实现。太原作战是以华北部队担任，还是以华北部队担任，请军委指示。

复林彪等电^[1]

(1949年1月22日)

(一) 你们应同意与傅作义会面。(二) 会面时间，以十三军、九十四军有一个军开出城外以后之时为适宜，如该两军抗不出城须面商协同作战事宜，则可以早日会面。(三) 会面地点，以在前次你们与邓宝珊会面之处或其他适当地点为宜。(四) 会面时你们对傅应有礼貌地接待他，并表示诚恳态度，如同你们最后一次对邓宝珊谈话所取态度那样。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蒋介石“引退”真相^[1]

(1949年1月22日)

【新华社陕北二十二日电】国民党政府伪总统蒋介石在二十一日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而把职务“依据宪法”交给伪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是美国政府久已内定在必要时机代替蒋介石的工具，正是因为这样，美国人才支持他当了伪副总统。美国政府在去年十二月以来曾用各种方式再三催促蒋介石退到幕后去。据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合众社上海电称：杜鲁门曾于去年十二月直接致函蒋介石，问他“是否已考虑他辞职或继续执政的问题”。但是事实上蒋介石并没有宣布辞职。蒋介石宣布的是“因故不能视事”，暂时离开南京，他仍然是国民党政府的“总统”。蒋介石所发的“引退”文告中说了一句“李代总统”，随即由中央社更正为“李副总统”，以免人们关于蒋介石的“总统”地位继续存在一点发生任何误会。蒋介石在“离职”以前对于继续反革命战争作了新的安排，以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和台湾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方天为江西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主席，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于十九日作出“立即

[1] 这是新华社的消息。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先行无条件停战”的荒谬决议的同时，通知驻南京各国使节迁往广州。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实际权力仍然操在蒋系和蒋介石本人手里。一切迹象，都表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没有任何愿意接受真正的民主的和平的诚意。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1]

(1949年1月22日)

东北局，并告各地：

子元电悉。同意你们关于招待和欢迎民主人士的布置，发表时，欢迎地点可以不宣布。此外，望注意：

(甲) 我党对待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对政策问题，均予以正面解答，不加回避。除党的秘密和某些具体策略外，一切可以公开谈的都可以谈。对政策实行的情况亦应据实相告，在强调说明各种重大成就时，并应指出困难和缺点，以及我们依靠群众力量，虚心学习等克服困难和缺点的方法。同时，请他们充分发表，并提出批评和意见，以加强共同努力的精神。

(乙) 此间曾根据上述方针和态度对民主人士进行过以下工作：
(1) 依据他们的提议，由我党各部门负责同志作报告（已报告过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
(2) 举行座谈，除座谈上述报告外，还座谈过我党新年献词、主席八条文告（他们致东北民主人士两个电报即由此产生）及有关新政协诸问题，我们有负责同志参加。
(3) 他们可以和我任何负责同志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并告各地的电报。

谈话，交换意见。(4) 组织一部分同志进行日常的接触和交谈。(5) 组织参观。(6) 供给他们以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每人赠一册)，党的公开文件及材料，解放区建设的材料、报纸及参考消息(无党内新闻)。(7) 他们得自由与老百姓接触交谈。(8) 民主人士间推有负责人，并有分组研究。许多工作进行均经其负责人与我方负责同志商洽。以上各项工作进行以来，民主人士均感收获甚大。(9) 关心他们的生活及疾病。这些经验，供你们参考，可依据你们的具体环境加以运用。

(丙) 上述方针，应在干部会议上明确地传达与讨论，使大家都能掌握其精神，主动地向民主人士进行教育宣传又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一方面保持积极主动，另一方面要反对我们自己的无纪律无组织状态。

中央
子养

复林彪等电^[1]

(1949年1月23日)

同意你们的意见，允许傅方成立结束办事处。其职务为对出城部队之管理约束，并与联合机构联系办理出城部队之补给事项。至于结束办事处存在之时间，以上述职务逐步交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其所属补给机构接管完毕之时为止，不要呆板规定在出城部队整编完毕后结束。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复林彪等电^[1]

(1949年1月23日)

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至于停止战斗，恢复通车，双方派人联系（由井泉主持）等工作，则可立即开始进行。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李井泉电的主要内容。

解决太原问题的部署^[1]

(1949年1月24日)

林、罗、聂，杨、罗、耿，杨、李^[2]，并告华北局及徐、周、陈^[3]：

各电均悉。(一)北平和平解决后，太原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华北第一、第二兵团的大休整，应放在夺取太原之后。(二)杨罗耿、杨李待林罗派出接替所任防务之部队到达后，即开至石家庄附近休整半个月，即向太原开进。(三)东北临时配属之两个炮兵团，即直接向太原开进，受徐周陈指挥，控制太原一切机场，迫使阎^[4]匪谈判，和平接收太原。如阎匪顽抗，则待华北二、三兵团到达后，实行攻城。

军委

二十四日十八时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徐、周、陈，指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4]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复林彪等电^[1]

(1949年1月24日)

可令他们即见剑英，探明来意，以凭处理。

[1] 这是毛泽东关于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转来傅作义方面的电报中获悉，白崇禧派出的代表黄启汉、刘仲华到达北平的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罗、聂并告彭真、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复李济深电^[1]

(1949年1月24日)

北平解放在即，晤教非远，诸容面叙。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复李济深电的主要内容。

致林彪、罗荣桓等电^[1]

(1949年1月24日)

据息，北平郭宗汾^[2]告阎锡山称，北平已于二十二日晨休战。并称，今后发电及郭个人自由能否获得，恐成问题。另据息，郭宗汾、王怀明、梁化之、杨贞吉、贾龙芝、程继忠、曹国忠、宫子清、赵恭（以上六名为阎军师长）等之家属，现均在北平。请你们注意对郭宗汾、王怀明及阎军师长在北平之家属拉一把。请叶剑英入城后经傅作义、邓宝珊介绍，找郭宗汾谈判和平解决太原、大同问题，郭宗汾在北平的电台亦让其存在，不要没收。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电的主要内容。

[2] 郭宗汾，在北平解放前，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他曾任以阎锡山为主任的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在北平有电台与阎锡山联系。

中共发言人就和平谈判问题发表谈话^[1]

(1949年1月25日)

【新华社二十五日陕北电】据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中央通讯社二十二日报道，这个反动政府的行政院已于二十二日推翻了它自己在十九日所作若不先行停战便不愿意进行谈判的那个荒谬决议，而重新决定派遣五个代表向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这五个代表是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2]。中共发言人称：我们愿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之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南京反动政府应负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全部责任，全国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早已完全丧失信任，这个政府早已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只能是由即将召开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所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因此，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新闻稿，在1949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

[2] 邵力子（1882—1967），浙江绍兴人，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张治中（1890—1967），安徽巢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兼新疆省政府主席。黄绍竑（1895—1966），广西容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彭昭贤（1897—？），山东牟平人，曾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部长。钟天心（1902—1987），广东长乐（今五华）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水利部部长。

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在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如果这个政府感于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人民的信任，感于它手里的残余反动军事力量已经无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愿意接受中共的八个和平条件^[1]的话，那末，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最近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一个实例。但是，南京反动政府是否愿意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反映全国人民公意的八个条件，现在谁也不知道。现在所知道的，就是在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放出了许多虚伪的装腔作势的和平空气，企图欺骗人民，以达其保存反动势力，获得喘息机会，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之目的。全国人民应有清醒的头脑，决不可被那些伪善的空谈所迷惑。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2]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关于战争罪犯名单问题，中共发言人称，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主要负责人员决不止四十三个。

[1]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对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的所谓“和谈”建议，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即：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2] CC派，指国民党内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拥蒋集团。

勿擅自向外表示态度^[1]

(1949年1月26日)

华东局，华中工委并刘、陈、邓、粟、谭，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并转所属：

据华中工委报称，华中某分区地委一级同志不向上级请示，擅自回答从广州来的一个外国记者及从上海来的一个中国杂志社记者很多带侦察性和挑拨性的问题。他们似乎完全不知道事先要请示这样一件事，或者虽然知道但不愿意请示，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这件事证明你们反对下级事先不请示的无纪律状态的斗争，并未展开和深入。你们必须以此事为例证通令所属，引为鉴戒。并给予该地委一级的负责同志以适当的处分。以后各地对于从国民党区来的一切情况不明的中外记者，必须拒绝接谈任何问题。对于确系革命的或同情的记者，是否接谈，亦须请示上级决定。任何下级人员，不得擅自表示态度。

可央
子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华东局、中原局及淮海前线总前委的电报。

不要在约法八章等之外再发任何口号

(1949年1月26日)

林、罗、谭^[1]，并告北平市委、天津市委，并转所属，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新华社东北前线分社转来东野^[2]政治部所拟口号十六条收到阅悉。我军入北平，只宣传约法八章^[3]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4]，不

[1] 林、罗、谭，指林彪、罗荣桓、谭政，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

[2] 东野，即东北野战军。

[3] 指1948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以林彪、罗荣桓名义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布告》中宣布的“约法八章”。其要点是：（一）保护各城市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及其他一切公共建筑；（五）除首要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省、市、县各级政府机关的官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本军一律不加俘虏和逮捕，凡有一技之长而无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民主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六）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本军部队及警备司令部或公安局投诚报到；（七）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八）无论在本军进城以前和进城以后，城内一切市民及各界人士，均须共同负责，维持全城秩序，免遭破坏。

[4] 指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

要再发出任何口号。不论军队或党、政，都应如此。你们所拟十六条口号中有些已包括在约法八章内，例如“没收官僚资本”，而约法八章内很多重要内容十六条口号中又未提到，故很不完全，使人怀疑这些重要内容似乎不重要了。“实行土地改革”一条，实行于大城市附近的种菜地有很多不适宜的地方，乡村中的土地改革办法，决不能施行于大城市附近。“消灭封建势力”一条宣传出去，必致惊动许多老官僚、老军阀及大批藏在北平的土豪劣绅，以为就要动他们了，他们将大起恐慌，埋藏财物，对于我们将来逐步地用征税方法或其他适当方法去吸收他们适当分量的财富归公的政策，会发生困难。目前时期，在大城市中，对于这类封建财富，以保存不动为有利。“把革命进行到底”“打到南京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两条口号，只应在军队中做实际教育，而不要当作标语写在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也不要当作单纯的口号登在大城市报纸的广告上，也不要在我军尚未实行打南京时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市民会议上去叫出来。这样去写、去登、去叫这两个口号，就显得很不策略，因为我党正在根据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准备和南京的代表开谈判，借以击破美帝及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并争取仿照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榜样去和平地解决南京等处的问题（假如有此可能的话）。其他几条口号，或则空洞无大意义（例如建设新北平），或则已包括在我党一月十四日声明中（例如召开新政协）。因此，你们只要将林、罗约法八章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各点去做宣传就够了，不要另外提出一批口号。此外，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写大字标语是否适宜，亦值得考虑。我们觉得，以张贴一月十四日声明及约法八章的印刷品为适宜。

总之，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风，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

在大城市，凡事均须从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凡属处理较重要的新事件，均须事前向上级请示，以免犯了错误，收不回来，影响很坏。务望注意。

中央
子宥



1949年1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以米高扬为首的苏方代表团。

在《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 处理办法》上加写的话

(1949年1月27日)

(一) 我军占领的城市在其秩序安定以前，不要忙于宣布对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这种急忙宣布处理是盲目的、没有效力的，易使敌人隐藏和使自己被动。在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我们对城市情况已经大体明了，那就必须着手有准备地、有系统地处理这些反动组织。(二) 如果我们一定要一切国民党、三青团的普通党员、团员一律登记，则纷扰太大，易于引起恐慌，故以不登记为有利。(三) 我们有了党员、团员的名单，对其组织情况已全部明了，对其中的坏分子可以随时处分，故免于登记并无危险。

在致吴克坚的电报上加写的话^[1]

(1949年1月28日)

望要刘仲容即去告李、白绝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

[1] 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起草的致吴克坚电上加写的一段话。吴克坚，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在上海负责党的地下情报联络工作。

致刘伯承等电^[1]

(1949年1月28日)

白崇禧派来的代表，你们可以接见，探明来意电告。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在商丘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 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 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

(1949年1月28日)

据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中央通讯社一月二十六日电称：“政府发言人称：政府为提早结束战争，以减轻人民痛苦，一月以来已作种种措施与步骤。本月二十二日更正式派定和谈代表^[1]。日来只待中共方面指派代表，约定地点，以便进行商谈。惟据新华社陕北二十五日广播中共发言人谈话^[2]，一面虽声明愿与政府商谈和平解

[1] 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派定的和平谈判代表是：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5人。

[2] 1949年1月25日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谈判的谈话指出：“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在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如果这个政府感于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人民的信任，感于它手里的残余反动军事力量已经无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愿意接受中共的八个和平条件的話，那末，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关于谈判地点，谈话中说：“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关于谈判代表，谈话中说：“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

决，一面则肆意侮谩，语多乖戾。且谓谈判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试问中共方面如不即时指派代表，约定地点，又不停止军事行动，而竟委诸所谓北平完全解放以后，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须知全国人民希望消弭战祸，已属迫不及待。政府为表示绝大之诚意，仍盼中共认清：今日之事，应以拯救人民为前提，从速指派代表进行商谈，使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又据南京中央社一月二十六日上海电称：“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二十六日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于十六时由石美瑜庭长宣判无罪。当时庭上空气紧张。冈村肃立聆判后，微露笑容”等情。据此，中共发言人表示下列诸点：

（一）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1]，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

[1] 冈村宁次（1884—1966），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罪恶最大的日本战犯之一。1925年到1927年，担任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1928年任日军步兵联队长，曾参加日军侵占济南的战争，是济南惨案的刽子手。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侵占上海的战争。1933年曾代表日本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签订《塘沽协定》。1937年至1945年期间，历任日军第十一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在中国实行了极其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1945年12月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被列为首要战争罪犯。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他曾充当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为蒋介石策划向解放区的进攻。1949年1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判无罪，释放回国。1950年又被蒋介石聘为“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1955年以后，又纠集日本陆海军旧军人组织“战友联”（后改名为乡友联盟），积极参与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活动。

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必须立即起来反对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此种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我们现在向南京反动政府的先生们提出严重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决不许可你们这样做。我们有权命令你们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依照我们将要通知你们的时间地点，由你们负责押送人民解放军。其他日本战争罪犯，暂由你们管押，听候处理，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

（二）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言人一月二十六日的声明中，获知南京的先生们要求和平谈判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据说都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感觉中共方面对于接受你们的愿望则是这样地不紧张，不热烈，不殷勤，不迫切，“又不停止军事行动”，实在是“拖延时间，延长战祸”。我们老实告诉南京的先生们：你们是战争罪犯，你们是要受审判的人们。你们口中的所谓“和平”“民意”，我们是不相信的。你们依赖美国势力，违反人民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这次残酷无比的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的国内战争。那时你们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你们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选举伪总统，颁发“动员戡乱”的伪令，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

劝告也不听。那时，上海、南京和各大都市的官办的或御用的所谓参议会、商会、工会、农会、妇女团体、文化团体一齐起哄，“拥护动员戡乱”“消灭共匪”，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如今，过了两年半，被你们屠杀的人民何止数百万，被你们焚毁的村庄，奸淫的妇女，掠夺的财物，被你们的空军炸毁的有生无生力量，是数不清的，你们犯了滔天大罪，这笔账必得算一算。听说你们很有些反对清算斗争。但是这一次清算斗争是事出有因的，必得清一清，算一算，斗一斗，争一争。你们是打败了。你们激怒了人民。人民一齐起来和你们拼命。人民不欢喜你们，人民斥责你们，人民起来了，你们孤立了，因此你们打败了。你们提出了五条^[1]，我们提出了八条^[2]，人民立即拥护我们的八条，不拥护你们的五条。你们不敢批驳我们的八条，不敢坚持你们的五条。你们声明愿以我们的八条为谈判的基础。这样难道还不好吗？为什么还不快点谈呢？于是乎显得你们很紧张，很热烈，很殷勤，很迫切，很主张“无条件停战”“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我们呢？显然是不紧张，不热烈，不殷勤，不迫切，“拖延时间，延长战祸”。但是且慢，南京的先生们，我们会要紧张起来，热烈起来，殷勤起来，迫切起来的，战争

[1] 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的“五条”，指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声明中所提出的关于和平谈判的五个条件，即：一、“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三、“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四、“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五、“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平”。毛泽东当时即对这五条作了严正的驳斥，参见《评战犯求和》。

[2] 中国共产党的“八条”，指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所提出的和平谈判的八个条件。参见《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时间一定可以缩短，人民的痛苦一定可以减轻。你们既然同意以我们的八个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你们和我们会要一齐忙碌起来的。实行这八条，够得上你们，我们，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全国各界人民忙上几个月，半年，一年，几年，恐怕还忙不完呢！南京的先生们听着：八条不是抽象的条文，要有具体的内容，目前这一个短时期内还是大家想一想要紧，为此耽搁一段时间，人民也会原谅的。老实说，人民的意见是要好好地准备这一次谈判。谈是一定要谈的，谁要中途翻了不肯谈，那是决不许的，因此你们的代表一定得准备来。但是我们还得一些时间做准备工作，不容许战争罪犯们替我们规定谈判的时间。我们和北平人民正在做一件重要工作，按照八个条件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你们在北平的人例如傅作义将军等也参加了这件工作，经过你们的通讯社的公告，你们已经承认了这件工作是做得对的^[1]。这就不但替和平谈判准备了地点，而且替解决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太原、归绥、兰州、迪化、成都、昆明、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台湾、海南岛等地的和平问题树立了榜样。因此，这件工作是应当受到赞美的，南京的先生们对此不应当表示不够郑重的态度。我们正在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包括在我们区域的和在你们区域的都在内，商量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准备第一个条件的具体内容。这个名单，大约不要很久就可以正式公布出来。南京的先

[1]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1949年1月27日发表南京政府国防部的文告称：“华北方面，为了缩短战争，获致和平，借以保全北平故都基础与文物古迹，傅总司令作义曾于二十二日发表文告，宣布自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休战。平市国军大部当即遵从总部指示，先后撤离市区，开入指定地点。”文告并称：“绥远大同两地亦将实施休战。”

生们，你们知道，直到现在，我们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都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和正式公布这样一个名单，这是要请先生们原谅的。其原因，是你们的和谈要求来得稍为迟了些。如果早一点，也许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你们也并不是没有事做。除了逮捕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以外，你们必须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四十三个战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台湾等处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人^[1]。特别重要的是蒋介石，该犯现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国，托庇于美国或英国帝国主义，因此，你们务必迅即逮捕该犯，毋令逃逸。此事你们要负完全责任，倘有逃逸情事，必以纵匪论处，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我们认为只有逮捕这些战争罪犯，才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认真地做了一件工作。只要战争罪犯们还存在，就只会延长战争时间，加重人民痛苦。

(三) 以上二项，要求南京反动政府给予答复。

(四) 八条中其他各条双方应行准备的工作，另一次再通知南京。

[1] 宋子文，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部长、驻美特使等职。陈诚，曾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台湾省主席。何应钦，曾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部长。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都是国民党CC派的主要头目。王世杰，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吴国桢，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市长。戴传贤，即戴季陶，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周至柔，当时任国民党军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当时任国民党军空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桂永清，当时任国民党军海军总司令。

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各民主人士 对战犯名单意见致东北局电^[1]

(1949年1月28日)

东北局：

(一) 经新华社发给你们的战犯名单是否收到？请你们于数日内即征求各民主人士的意见，迅速电告。

(二) 南京方面极为混乱，企图拉拢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站在南京方面的计划已告失败。

(三) 北平和平解决，傅作义将功折罪，可以免除战犯罪名，此点可告民主人士，将来李宗仁、白崇禧等如能照此办理，亦可许其将功折罪，惟蒋系各主要战犯决不能宽待。

(四) 五十五人声明影响极好，莫斯科一切报纸都登载了。

(五) 民盟、民促、三党、救国会、致公党各项声明均到照发。惟民革的尚未收到。

(六) 你们欢迎会稿件，速即发来。

中央

二十八日三时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电报。

中央社窜改中共发言人声明用意何在^[1]

(1949年1月31日)

【新华社陕北三十一日电】南京中央社一月二十九日转发一月二十八日中共发言人声明，除删掉或窜改许多重要的字句之外，还有意地删掉许多包含着极重要意义的段落。关于日本战犯冈村宁次问题，中央社删掉了下面一段：“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必须立即起来反对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此种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下面的一段也被中央社删掉了：“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结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关于内战罪犯问题，中央社删掉并窜改了下面一段：“你们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选举伪总统，颁发‘动员戡乱’的伪令，又是那样的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述评。1月28日中共发言人声明，即《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

听。那时，上海、南京和各大都市的官办的或御用的所谓参议会、商会、工会、农会、妇女团体、文化团体一齐起哄，‘拥护动员戡乱’‘消灭共匪’，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如今，过了两年半，被你们屠杀的人民何止数百万，被你们焚毁的村庄，奸淫的妇女，掠夺的财物，被你们的空军炸毁的有生无生力量，是数不清的，你们犯了滔天大罪，这笔帐必得算一算。听说你们很有些反对清算斗争。但是这一次清算斗争是事出有因的，必得清一清，算一算，斗一斗，争一争。你们是打败了。你们激怒了人民。人民一齐起来和你们拼命。人民不欢喜你们，人民斥责你们，人民起来了，你们孤立了，因此你们打败了。”上面这一段，中央社删窜成为这样几句：“如今，过了两年半，你们犯了滔天大罪，这笔帐必得算一算。虽说你们反对清算斗争，但是这一项清算斗争是事出有因的，必须清一清，算一算，斗一斗，争一争。”在谈内战罪犯问题的末尾一段中，原文是：“除了逮捕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以外，你们必须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四十三个战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台湾等处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1]等人。特别

[1] 宋子文，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等职。陈诚，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台湾省主席。何应钦，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部长。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都是国民党CC派的主要头目。王世杰，曾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部长。吴国桢，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市市长。戴传贤，即戴季陶，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周至柔，当时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当时任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桂永清，当时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

重要的是蒋介石，该犯现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国，托庇于美国或英国帝国主义，因此，你们务必迅即逮捕该犯，毋令逃逸。”中央社将这一段删窜成为下列几句：“除了逮捕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以外，你们必须继续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四十三个战犯。你们务必迅速逮捕，勿使逃逸。”读者们和听者们注意：中央社擅自删掉和窜改的是些什么呢？是关于必须逮捕日本战犯的理由，是关于必须清算内战罪犯的理由，是关于要求南京政府首先逮捕蒋系直属各重要战犯的名单，特别是蒋介石这个战犯魁首。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是同意以中共的八条^[1]为谈判基础的，八条的第一条是惩办战犯，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我们提起所以要惩办战犯的理由和战犯的具体名单。此外，中央社还整个地删掉了中共发言人声明的第三点，这一点的全文总共只有十七个字，即“（三）以上二项，要求南京反动政府给予答复。”删掉这十七个字的用意何在呢？难道是为了文字太长吗？

[1] 参见《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一）新华社的评述《中央社审改中共发言人声明用意何在》的手稿。文字密集，部分被划掉。

（二）手稿片段，文字清晰，位于上方右侧。

（三）手稿片段，文字清晰，位于下方左侧。

（四）手稿片段，文字清晰，位于下方中间偏右。

（五）手稿片段，文字清晰，位于下方右侧，包含一个较大的草书落款。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述《中央社审改中共发言人声明用意何在》的手稿。

北平解放^[1]

(1949年1月31日)

【新华社陕北三十一日电】世界闻名的文化古都，拥有二百余万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北平的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原有国民党反动军队及其军事机构大约二十万人左右据守的北平，乃是执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所宣布的八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的第一个榜样。这个事实的发生，是人民解放军的十分强大，所向无敌，国民党反动军队中的广大官兵战意消沉，不愿再作毫无出路的抵抗，和北平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拥护真正民主和平的结果。北平的国民党主力现已开至城外指定地点，人民解放军定于本日开始入城接防。北平的人民久已象亲人一样地渴望着人民解放军。在知道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开入北平之后，北平的工人、学生、市民连忙热闹非凡地筹备着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因国民党全部出城之一再延期而感觉不耐。人民解放军即将和平地开入北平的消息，使这个古城突然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从一月二十三日起物价顿然下降。街道上重新拥挤着欢天喜地的行人，他们到处探听着解放军入城的确实日期，询问着和传说着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宣传品的内容。北平的和平谈判曾经进行了

[1] 这是新华社的消息。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一个很长的时间。事实上，从去年十二月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的一天就已开始接触，但是直至天津解放的前夜，傅作义将军还不愿意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条件，因而使谈判未获结果。开始时期傅作义还梦想着作绝望的抵抗，随后又梦想着率部逃跑到绥远，或太原，或青岛、上海，并与蒋介石信使往还不绝，对于与人民解放军的和平谈判采取敷衍的态度。傅作义直系主力在新保安和张家口被歼，以及国民党整个军事政治形势处于绝望境地，动摇了他的原定计划。一月十四日，中共毛泽东主席宣布八项和平条件，十五日天津迅速解放，十六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将军、政治委员罗荣桓将军向傅作义送出关于北平和平解决办法的公函。这些事变，促使傅作义将军决心接受解放军的提议，谈判才得到进展。双方的谈判决定：为了便于移交和接管，在过渡期间，成立七人的临时联合委员会，人民解放军方面四人，傅作义将军方面三人，以叶剑英将军为主任。这个委员会在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领导之下工作。双方协议：开出城外的傅作义将军所部全军在大约一个月后开始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双方又协议在过渡期间，北平市内的各级行政机关、企业机关、银行、仓库、邮电机关、报社、学校、文化机关等，一律暂维现状，不得损坏，听候处理。北平的解放基本上结束了华北的战争。中国北部的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五省及河南一部，现在只有太原、大同、归绥、包头、五原、临河、青岛、安阳、新乡等少数地方尚未解放，这些地方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如果不愿意跟随北平的榜样，就只有跟随天津的榜样。天津是在二十九小时内经过战斗解放的，守城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全部解决，其高级将领全部被俘，其中拒绝和平解决、坚持抵抗到底并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的首要分子，将被审讯判罪。北平的解放对

于长江以南及其他地方的解放也指出了—个榜样。全国人民要求战争罪犯们统率的所有执行“戡乱剿匪”伪令，屠杀中国人民的一切反动军队，都能像傅作义将军及其所部—样地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条件，这将证明他们确有诚意实现真正的和平。傅作义将军在过去两年半中是积极执行“戡乱剿匪”伪令的—人，因此成为战争罪犯之—。但是，人们相信，既然他现在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条件，率部出城听候改编，那么，只要他今后继续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向走去，他就有希望取得人民的谅解，允许他将功折罪。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市各大学学生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

哀悼冯裕芳的唁电^[1]

(1949年1月31日)

冯裕芳先生家属礼鉴：

裕芳先生不幸因病逝世，曷胜哀悼，特电致唁，尚希节哀。

毛泽东

一月三十一日

[1] 这是毛泽东给冯裕芳先生家属的唁电。冯裕芳，广东琼崖人，曾在香港从事文化工作与民主运动多年。冯裕芳之弟即人民解放军琼崖军区司令员冯白驹将军。

为《天津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1月)

天津日报

天津日报

毛泽东第一次为《天津日报》题写的报头。

[1] 1949年1月17日，《天津日报》创刊，应天津市长黄敬之请，毛泽东为《天津日报》题写了报头。

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1]

(1949年2月1日)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北平的和平解决采取什么态度，是值得注意的。国民党中央社于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傅作义^[2]将军的文告，该文告称北平的和平解决，是为了“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一月二十七日中央社又发表南京政府国防部的文告称：“华北方面，为了缩短战争，获致和平，借以保全北平故都基础与文物古迹，傅总司令作义曾于二十二日发表文告，宣布自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休战。平市国军大部当即遵从总部指示，先后撤离市区，开入指定地点。共军已有少部开进市区。绥远、大同两地亦将实施休战。”

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比较好的一条出路，是军队离城改编，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和平地接收城防和市政，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述评，在1949年2月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2] 傅作义，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1月21日与人民解放军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后，率20余万守军撤出北平市区接受改编。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为什么一月二十二日应当“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应当，而令天津的和平解决不能实现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天津打败了，二十九个钟头内十几万人解除武装，陈长捷、林伟俦、杜建时^[1]等一齐被俘，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人民解放军十五日攻克天津，十六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位将军即和傅作义将军的代表邓宝珊^[2]将军、周北峰^[3]将军成立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协议，往后数日又成立了细节方面的许多协议。周北峰将军是在一月八日由张东荪^[4]教授引导出城和林彪将军等谈过一次的，这回出城是第二次。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难道还不明显吗？

北平人民，包括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及绅士们在内，一齐渴望和平解决，又是一个原因。一月十九日北平人民的十一个代表出城和人民解放军公开接洽，他们听了人民解放军方面的宽大处理政

[1] 陈长捷（1905—1980），福建闽侯人，原任国民党军津塘防区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官。林伟俦（1905—1998），广东台南人，原任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区司令部副司令官兼第六十二军军长。杜建时（1906—1989），天津杨村人，原任国民党政府天津市市长。

[2] 邓宝珊（1894—1968），甘肃天水人，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当时为傅作义的和平谈判代表。

[3] 周北峰（1903—1989），山东永济人，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土地处处长，当时为傅作义的和平谈判代表。

[4] 张东荪（1886—1973），浙江杭州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北平分部负责人、燕京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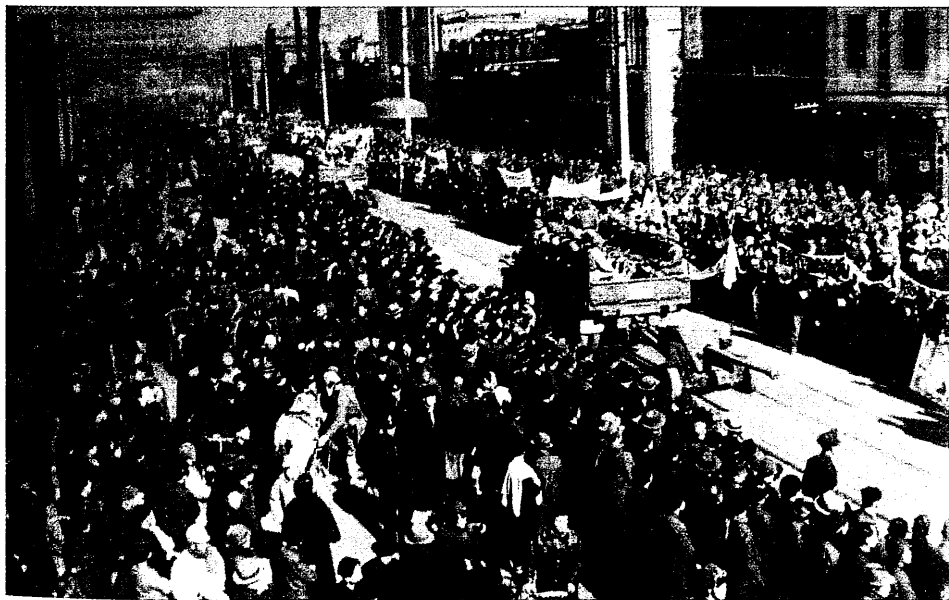
策，甚为满意。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军部招待了代表们，举行了畅谈和欢宴。代表们中的一个的前北平市长何思源，他是过去山东国民党省政府的主席，坚决反对过人民解放军，当北平市长时也是坚决压迫人民的，他是国民党系北方派的干员之一。不管他过去做得怎么坏，这一次总算做对了。又一个代表是吕复，他是国民党法统内的立法委员。又一个代表是北平古物保管机关的康同璧女士。其余是官办的民众团体的代表。他们就是二十二日傅作义将军文告中所说“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那一句话中所谓“人民公议”的表现。不管这一切，他们总算是代表了真正的民意，这和过去大半个月来国民党CC系^[1]在南方各省策动官方的参议会、商会、工会等起劲地叫嚣的所谓“和平攻势”，是截然不同的，人们切不可将这二者混为一谈。最近南京、上海、武汉开始酝酿的局部和平运动，也是资产阶级及绅士们策动的，应属于何思源、吕复、康同璧这一类，因而被CC系死硬派战争罪犯潘公展^[2]所反对。

北平和平解决的又一个原因，是近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兵士们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天津失守后的傅作义将军代表了这种情绪，下了出城改编的决心。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在军队改编问题上予以协助，不起阻碍作用，而不再企图高踞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并给他以新的出路。

[1] CC系，指国民党内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拥蒋集团。

[2] 潘公展（1895—1975），浙江吴兴人，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参议会议长。

南京政府为什么也同意这样干呢？这是全国革命高潮和国民党大崩溃的表现。他们不得不同意，就像他们不得不同意以共产党的八个和平条件^[1]为谈判基础一样。在全国人民的逼迫下，他们孤立了，他们的二十万军队已经这样做了，他们无法不同意。这一同意是有巨大意义的，全国的问题就有合法（合国民党之法）理由遵循北平的道路去解决，他们丝毫也没有理由反对别地这样做了。尽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死硬派还在准备“抵抗到底”，但是他们将被完全地彻底地孤立起来，他们的反动政策会被人民的革命浪潮迅速地打得粉碎。



傅作义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图为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庄严的入城仪式。

[1] 指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49年1月14日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的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

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北平人民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国民党政府在北平问题上，采取了和平的方针，这是符合北平人民的利益的。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广泛的民主运动，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要求和平、民主、团结。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北平的稳定，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建议。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

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北平人民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国民党政府在北平问题上，采取了和平的方针，这是符合北平人民的利益的。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广泛的民主运动，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要求和平、民主、团结。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北平的稳定，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建议。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

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北平人民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国民党政府在北平问题上，采取了和平的方针，这是符合北平人民的利益的。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广泛的民主运动，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要求和平、民主、团结。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北平的稳定，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建议。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

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北平人民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国民党政府在北平问题上，采取了和平的方针，这是符合北平人民的利益的。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广泛的民主运动，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要求和平、民主、团结。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北平的稳定，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建议。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

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北平人民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国民党政府在北平问题上，采取了和平的方针，这是符合北平人民的利益的。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广泛的民主运动，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要求和平、民主、团结。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北平的稳定，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建议。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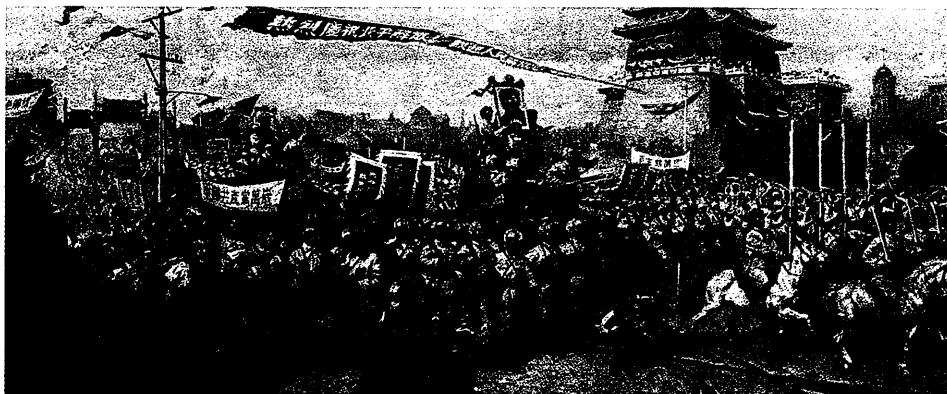
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北平人民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国民党政府在北平问题上，采取了和平的方针，这是符合北平人民的利益的。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广泛的民主运动，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要求和平、民主、团结。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北平的稳定，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建议。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

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北平人民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国民党政府在北平问题上，采取了和平的方针，这是符合北平人民的利益的。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广泛的民主运动，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要求和平、民主、团结。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北平的稳定，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建议。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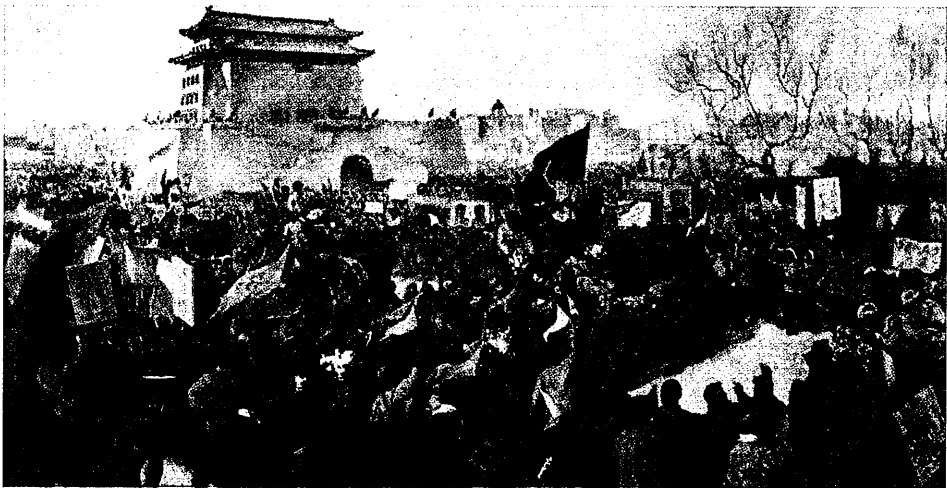
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北平人民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国民党政府在北平问题上，采取了和平的方针，这是符合北平人民的利益的。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广泛的民主运动，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要求和平、民主、团结。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北平的稳定，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建议。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

的国民党死硬派还在继续
借国民党旗帜将共产党
起来，他们企图
被人民的革命浪潮迅
速地打得粉碎。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述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的手稿(部分)。



《和平解放北平》(油画)



《北平解放》(油画)

复李济深等五十六人电^[1]

(1949年2月2日)

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李锡九、蔡廷锴、周建人、符定一、章乃器、李德全、胡愈之、沙千里、茅盾、朱学范、陈其尤、黄振声、朱蕴山、邓初民、翦伯赞、王绍鏊、吴晗、许广平、楚图南、丘哲、韩兆鹗、许宝驹、田汉、洪深、侯外庐、沈兹九、宦乡、杨刚、曹孟君、李文宜、罗叔章、刘清扬、张曼筠、施复亮、孙起孟、严信民、李民欣、梅龚彬、沈志远、周颖、安娥、吴茂荪、何惧、林一元、赖亚力、孔德沚、袁震、沈强、王蕴如诸先生共鉴：

二月一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仆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

[1] 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6人，是当时已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文化艺术界、新闻界、社会科学界以及其他方面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们在1949年2月1日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等，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1]，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特电布复，敬表欢迎。

毛泽东 朱德

二月二日

[1] 八条，指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49年1月14日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的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当时国民党政府已口头表示接受这八条作为谈判的基础。

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电^[1]

(1949年2月3日)

(一) 对傅态度如新华社公开所表示者，他过去做的是错的，此次做的是对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他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如果他暂时不愿发这样的通电，也可以，等一等想一想再讲。以上态度应向傅本人及傅左右公开明确反复说明，特别是对邓宝珊、周北峰、王克俊、阎又文诸人你们要多做工作。目前留傅住在北平(城内或城外)对改编傅部和争取太原、武汉、南京、上海的局部和平解决都有必要，目前不要让他飞到绥远去。将来他去绥远或他处都是可以的。入城后，请林彪和傅、邓见面扯开谈一次。(二) 南京公布有南京地方人民代表团八人一日飞平，不久并有上海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冷御秋五人代表团来北平，据说他们是得李宗仁同意，从事沪宁局部和平试探工作的。你们不要拒绝他们来平。他们到平后，你们应有礼貌地招待他们，探明来意，报告中央。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电的主要内容。

复彭真、叶剑英等电^[1]

(1949年2月3日)

北平电信局无线电台目前若干天内，可听其照旧与京、沪等地保持联络，但应派出军事代表前往监督，并防止其逃匿器材。飞机场应立即控制于我手中，对民航机暂时可在我方同意的条件下，有限制地降落。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彭真、叶剑英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1]

(1949年2月5日)

依整个形势看，武汉、京、沪、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虽然仍有再打几仗的可能，但是各地逐一和平解决的可能是很大的，太原亦有此种可能性。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有十分必要。太原如能照北平样和平解决，阎锡山又能作上述傅作义那样的表示，我们亦可照待遇傅作义那样待遇他。只要李、白能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一方面，依照北平办法解决京、沪、汉等处问题，我们即会以对待傅的态度对待他们。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复彭真、叶剑英、徐冰电^[1]

(1949年2月5日)

上海五代表及李之私人代表如果不是为着进行和平攻势，而是真想用和平方法解决京、沪、汉问题（全国问题谈不到），则我们可以许其来平和我方地方人员（北平市长）试谈一次；如果是为着美蒋利益欲来进行所谓和平攻势，则无来平之必要，即使来了，我们亦必尖锐地揭露之。此点请叶明确地告诉刘仲华，叫他回去通知李、白及上海、南京、武汉想来谈和者。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彭真、叶剑英、徐冰电的主要内容。徐冰，当时任北平市副市长。

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 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

(1949年2月5日)

上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声明，到上月三十一日得到了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发言人的答复。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发言人在这个答复里，对于中共发言人所提出的各项问题，提出了狡辩。对于中共要求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负责重新逮捕日本侵华罪魁冈村宁次，准备押送人民解放军，并负责看管其他日本战犯勿令逃逸一节，该发言人说，这“是一个司法问题。这完全与和谈无关，更不能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对于中共要求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负责逮捕战争罪犯蒋介石等人一节，说是“真正的和平不应该有先决条件”。并且说中共发言人的声明“态度上似乎不够郑重”，而且是“节外生枝”。对此，中共发言人声明：在一月二十八日那种时候，我们还把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说成是一个政府，在这点上说来，我们的态度确乎不够郑重。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有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别的什么都没有。因此郑重地说起来，已经不应当把它看成一个政府，它至多只是一个假定的或象征的政府了。

但是我们仍然假定有那么一个象征的“政府”，并且假定有一个足以代表这个所谓“政府”发言的发言人。那末，该发言人应当知道，这个假定的象征的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现在不但对于和平谈判毫无建树，而且确确实实地是在不断地节外生枝。例如当着你们如此急切地要求谈判的时候，忽然判决冈村宁次无罪，这难道不是节外生枝吗？在中共要求予以重新逮捕以后，又把他送往日本，并且把其他二百六十名战犯也送往日本，这难道不是节外生枝吗？日本现在是什么人统治呢？难道是日本人民在统治而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在统治吗？日本是你们如此热爱的地方，以致使你们相信日本战犯们生活在你们统治的区域，还不如使他们生活在日本较为安全些，较为舒服些，较为能受到正当待遇些。这是一个司法问题吗？为什么发生这个司法问题呢？难道日本侵略者和我们打了八个整年这件事，你们也忘了吗？完全与和谈无关吗？一月十四日中共提出八条的时候，并没有发生释放冈村宁次这件事情。一月二十六日这件事情发生了，就应提出了，就与和谈有关了。一月三十一日你们接受麦克阿瑟的命令，又将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连同冈村宁次一起送往日本，就更与和谈有关了。为什么你们要求和谈呢？是因为你们打了败仗。你们为什么打败仗呢？是因为你们发动反人民的国内战争。你们在什么时候发动这次国内战争呢？是在日本投降以后。你们发动这次战争是打谁呢？是打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大功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区。用什么力量来打呢？除了美国援助之外，是在你们统治区域从人民方面捉来和刮来的力量。中国人民和日本侵略者一场大决斗刚刚完毕，一个对外战争刚刚完毕，你们就发动这次对内战争。你们打败了，要求谈判，忽然又宣告日本首要战犯冈村宁次无罪。我们刚刚向你们提出抗议，要求你们重新监禁冈村宁次并

准备交给人民解放军，你们又慌忙将他和其他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一齐送往日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你们这件事做得太无道理了，太违反人民意志了。我们现在特地在你们的头衔上加上卖国二字，你们应当承认了。你们的政府很久以来就是卖国政府，仅仅为了节省文字起见，有时我们省写了这两个字，现在不能省了。你们除去历次的卖国罪以外，现在又犯了一次卖国罪，而且这一次犯得很严重，和平谈判会议上必得谈这个问题。无论你们叫节外生枝也好，不叫节外生枝也好，这件事必得谈，因为这件事是发生在一月十四日以后的，没有包括在我们原来所提的八个条件以内，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在第一个条件中增加惩办日本战犯一个项目。这样，这一条就有两个项目，即是：（甲）惩办日本战争罪犯；（乙）惩办国内战争罪犯。我们提出这个项目是有理由的，是反映全国人民意志的。全国人民都要惩办日本战犯。即在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认为惩办冈村宁次等日本战争罪犯和惩办蒋介石等国内战争罪犯一样是理所当然。无论你们说我们是有和平诚意也好，没有和平诚意也好，这两类战犯问题都得谈判，这两类战犯都得惩办。关于叫你们在谈判之前逮捕一批内战罪犯和防止这些战犯逃跑的问题，你们认为“不应有先决条件”。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这不是先决条件，这是你们承认惩办战犯一条为谈判基础之后自然产生的要求。叫你们逮捕，是怕战犯们跑掉。当着我们在谈判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的时候，你们如丧考妣地急着要谈判，你们闲得发慌，因此叫你们做一件合理的工作。这些战犯总是要逮捕的，任凭他们跑到天涯海角也是要逮捕的。你们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人们，你们是有很多的好心眼儿的人们，你们对于这些屠杀几百万同

胞的负责者应当没有什么爱惜，从你们愿意以惩办战犯作为一条谈判基础这一点来看，你们似乎也并不很爱惜这些东西。但是既然你们声明叫你们马上逮捕这些东西显得颇有为难之处，那末也罢，你们就防止他们逃跑吧，千万莫叫这些东西跑掉了。先生们，请想一想，当着你们辛辛苦苦地派出代表团和我们讨论惩办战犯问题的时候，战犯们已经跑了，那末，还谈什么呢？你们的代表团先生们的脸上还有什么光彩呢？你们那样多的“和平诚意”从何表现呢？怎么可以证明先生们是真的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没有一点儿假呢？此外，该发言人还说了许多废话，这些废话是骗不了任何人的，我们认为没有答复的必要。南京或广州或奉化或上海的假定的象征的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注意，政府二字加上引号）的先生们，如果你们以为我们的这篇声明的态度又有些不够郑重的话，那末，请原谅，我们对你们只能取这种态度。

中共发言人声明拒绝甘介侯来平^[1]

(1949年2月7日)

【新华社陕北七日电】据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中央社五日上海电称：“甘介侯^[2]声明，颜惠庆^[3]、章士钊^[4]等六人组织之和平代表团，将于二三日内飞往北平。邵力子^[5]及渠两人则以私人资格随行前往策助。甘氏声明，代表团之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速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等情。中共发言人声明：如果上海颜惠庆、章士钊诸先生是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参观，并于国事有所商谈，则北平市长准备予以接待。如果照甘介侯声明“代表团之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速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声明的形式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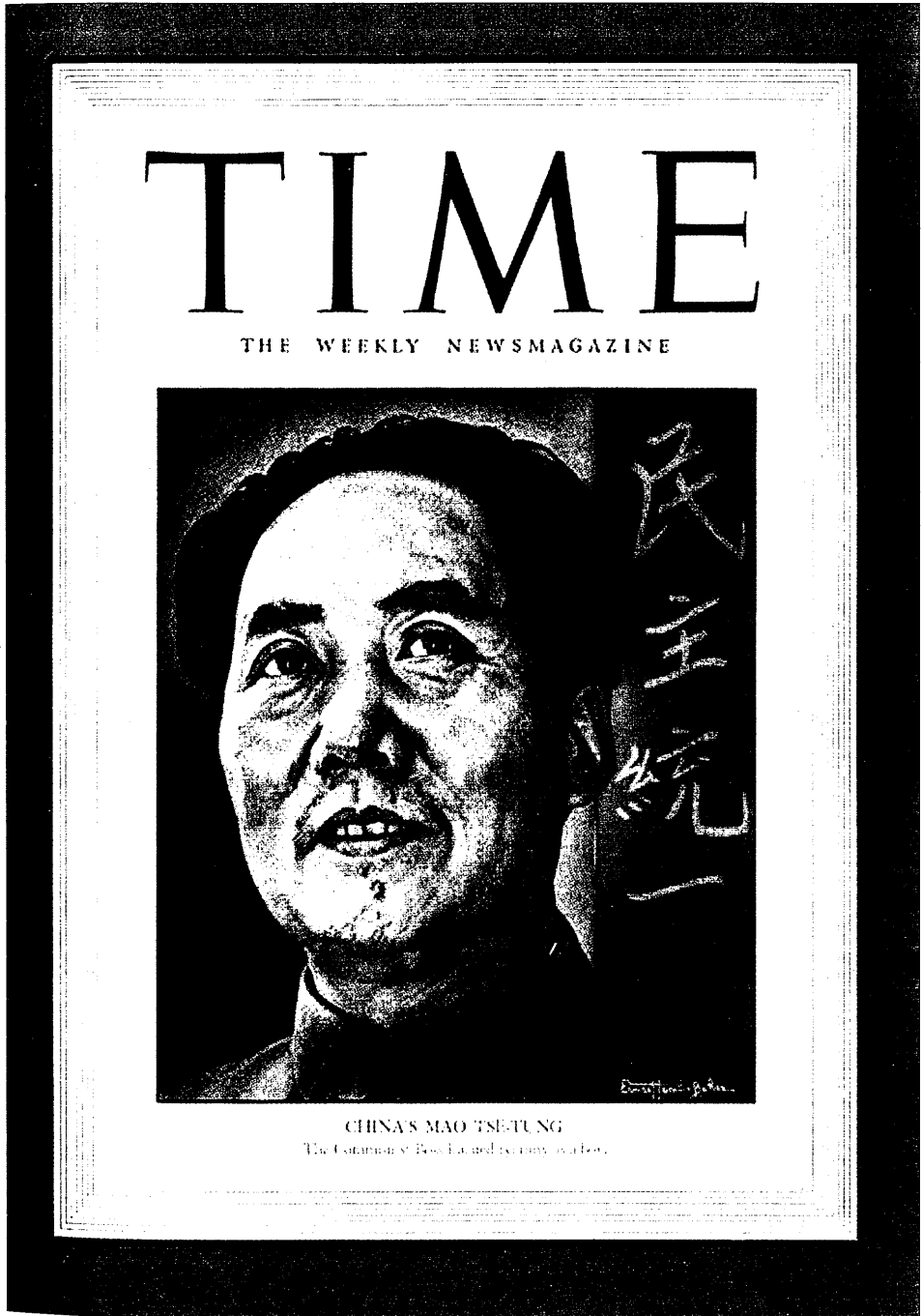
[2] 甘介侯，早年曾任大学教授、外交官员，当时是李宗仁私人顾问。

[3] 颜惠庆，曾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外交总长，国民党政府驻英、驻苏大使等职。

[4] 章士钊，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律师等职。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后遂留北平。

[5] 邵力子，早年曾任上海大学代理校长，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西安事变后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驻苏联大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后遂留北平。

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则中共早已声明，和平谈判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目前无从谈起，我们对于任何方面的人暂时均不准备接待。至于甘介侯这类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他只有资格在南京、上海一带出卖其“和平攻势”牌的美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人民的北平不欢迎这类货色。对不起，请止步。如果甘介侯竟敢混入北平，贩卖私货，则北平人民很可能把他驱逐出境。



1949年2月7日，毛泽东第一次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

把军队变为工作队^[1]

(1949年2月8日)

四日电悉。你们加紧整训，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2]，甚好。望照此去做，不要放松。但在实际上，三月仍须整训，并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写的复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电报。这个电报，同时发给其他有关的野战军和有关的中央局。这个电报估计到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因而及时地提出了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必须是一个工作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主要地要担负工作队的任务。这个方针，对当时新解放区干部问题的解决和人民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关于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性质，参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第二部分。

[2] 指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准备把渡江作战的行动由1949年4月提前到3月。后来由于同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间又延至4月下旬。

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你们前进，要占领四五个省的地区，除城市外，还有广大乡村的工作要你们去做。南方乡村，因为完全是新区，和北方老区的工作根本不同。头一年还不能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大体上只能照原样交租交息。要在此种条件下去进行乡村工作。因此，乡村工作，也得从新学习。但是，乡村工作和城市工作比较起来，是易于学习的。城市工作则较为困难，而又是目前学习的最主要方面。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因此，你们必须在二月处理其他一切问题，而在三月一个整月内，全部学习城市工作和新区工作。国民党只有一百几十万军队，散布在广大地方。当然还有许多仗要打，但是像淮海战役那样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就不多了，或者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了，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了。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松气，如果松气，那就是错误的。但是，军队变为工作队，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现在正在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此点，你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既然严重的战争基本上已经过去，则军队人数和装备的补充，以达到适当程度为宜，决不可要求太多、太好、太完备，以至引起财政危机。这一点，你们亦必须严重考虑。上述方

针，完全适用于第四野战军，请林彪、罗荣桓同志同样注意。我们已和康生同志谈了许多，请他于十二日赶到你们处，和你们会商。你们意见如何及如何处置，会商后请即电告。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立即移至徐州同总前委^[1]和第三野战军前委一同工作，集中精力布置南进。一切后方工作交山东分局负责。

丁平陈毅，粟裕，谭震林，你们加紧徐州
 准备，十一月间出动，你们此次出动，不要带
 在实际上三月以后出动，你们此次出动，不要带
 董增训大，城市，今后有一反过去，城市，不要带
 的方式，如改变着先城市，再农村的方式，不要带
 我半力量，而且主要的一个工作，是城市，不要带
 会战，如城市和管理城市，不要带，不要带
 和，如城市和管理城市，不要带，不要带

丁平陈毅，粟裕，谭震林，你们加紧徐州
 准备，十一月间出动，你们此次出动，不要带
 在实际上三月以后出动，你们此次出动，不要带
 董增训大，城市，今后有一反过去，城市，不要带
 的方式，如改变着先城市，再农村的方式，不要带
 我半力量，而且主要的一个工作，是城市，不要带
 会战，如城市和管理城市，不要带，不要带
 和，如城市和管理城市，不要带，不要带

丁平陈毅，粟裕，谭震林，你们加紧徐州
 准备，十一月间出动，你们此次出动，不要带
 在实际上三月以后出动，你们此次出动，不要带
 董增训大，城市，今后有一反过去，城市，不要带
 的方式，如改变着先城市，再农村的方式，不要带
 我半力量，而且主要的一个工作，是城市，不要带
 会战，如城市和管理城市，不要带，不要带
 和，如城市和管理城市，不要带，不要带

毛泽东起草的《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手稿。

[1] 为适应淮海战役作战的需要，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于1948年11月16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淮海战役后，中央军委又作出决定，在渡江作战中，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和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1]

(1949年2月9日)

林、罗军决在平津地区休整至三月底为止。在此期内，须改编与溶化二十万傅作义军，修复津浦路津济段及平汉路郾城驻马店段，并夺取太原。四月上旬你们开始渡江行动时，林、罗即由铁路先运两个军至三个军共约十二万至十八万人直达信阳，夺取信阳、孝感之线，威胁汉口，使武汉方面之敌不敢轻动。林、罗主力，亦于该时步行南下。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并告林彪、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复彭真、叶剑英电^[1]

(1949年2月10日)

你们对南京代表团^[2]所取态度是适当的。你们可向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你们应对代表们表示，对于天津、上海恢复通船、通邮及商业联系感到兴趣，如果他们在此点上能起某些作用，我们是欢迎的。代表们所谓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国际已经承认的旧中央，运用旧中央权力实行对蒋系讨伐等语，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彭真、叶剑英并告林彪、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2] 指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该团由当时南京人民和平促进会组成，成员有邱致中、吴裕后、曾资生、邓季雨、宋国枢、夏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诺等。1949年2月6日至11日该代表团以私人资格来北平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国是。在北平期间，叶剑英等曾两次与他们接谈。

复潘汉年电^[1]

(1949年2月10日)

你可以和左恭、钟天心见面，告诉左、钟，战争罪犯只有蒋介石及其死党中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不能赦免，其他各人包括孙科、薛岳、余汉谋、张发奎等在内，只要他们在将来某种紧急时机能够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愿受中共领导，则他们过去的罪恶行为可能取得人民的谅解而予以赦免，并给以新的出路。你应乘此时机抓紧对孙科、薛岳、余汉谋等人的工作。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潘汉年电的主要内容。

对部队进行地理常识教育极为重要

(1949年2月10日)

林、罗、刘、陈、邓、粟、谭、彭、张、赵、徐、周^[1]：

据杨罗耿潘丑鱼电^[2]称，华北第二兵团一九三师干部学习感到重要，读文件已深入一步，普遍感到越学越有好货。特别是在此次时局与任务传达后，情绪很高涨，都说好像打了清血针。同时，并发现干部水平很低，营连干部中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全国人都成共产党员，过了长江还过黄河，故今后对地理与名词常识的教育很重要等语。关于地理常识的教育极为重要。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

[1] 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代理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指张宗逊，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赵，指赵寿山（1894—1965），陕西户县人，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徐，指徐向前，当时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指周士第（1900—1979），广东乐会（今海南琼海）人，当时任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指第十九兵团（原华北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参谋长耿飏和政治部主任潘自力1949年2月6日反映部队学习情况的电报。

制印长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简明地图一张，图上有大的河流、山脉，有省界，有大城市及中等城市的名称。在省名及大城市名的旁边注明该省该市的人口总数。在各野战军自己担任占领和工作的区域内，标注重要县镇的名称。图幅不要太大，以纵横一公尺左右为适宜。除发给营部以上各级机关每处一张外，如能每个连队有一张，使一切识字的连排长及战士都能阅看，则极为有益。我们认为，此种地图常识的教育，将使指战员们增加勇气和对于任务的明确性。望酌量办理为要。

军委

丑灰

同意三月底渡江作战的计划^[1]

(1949年2月11日)

刘、陈、邓，饶、康、曾，粟、谭，并告林、聂：

丑佳电^[2]悉。(一) 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 指1949年2月9日刘伯承、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给中共中央军委并华东局的电报。电报说：(一) 关于渡江时间，以在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二) 关于战役部署。确定以华野四个兵团、中野一个兵团为第一梯队。中野另两个兵团除以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五个军作为总预备队。预定的突破重点位置拟在芜湖、安庆地段。(三) 关于开进。华野拟先移一个兵团至合肥，另一兵团则于三月半移动，以半月行程到达江边。中野各部路程较远，拟于三月初旬移至潢川、固始、六安之线休息，待机即向指定位置开进。(四) 华野、中野指挥机关拟于三月初移至合肥及六安。(五) 为适应紧迫的作战要求，安徽省委必须立即建立。对建立皖豫鄂三省委事，如中央认为此时尚非建立省委时机，而为作战需要，我们建议豫皖苏分局移至合肥，统一领导皖西、江淮两区及豫皖苏之安徽部分。而将豫皖苏之河南部分交由中原局另组区党委管辖(但困难很多)。(六) 关于出动时间。部队思想渡江无大问题，具体准备则有许多事项尚无着落，务请军委、华东局予以解决。(七) 粮食是最困难的问题。主要是就地筹集，但仍须后方准备大量接济。(八) 为保障华野、中野的行动，建议东北野战军即以三个军约二十万人迅速南下，于三月底运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

战^[1]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二）饶康曾到后即开一次华东局会议，依据上述计划及中央丑齐电^[2]方针（丑齐电中整训时间应缩短半月至三月半为止）部署一切。（三）你们丑佳电所列八条，除第八条以林罗^[3]一部先行南下一事，已告罗荣桓同志并另电通知外，其余七条凡由华东及你们自己解决者，由此次华东局会议自筹解决，凡由中央解决者另电处理。（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4]四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五）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

[1] 渡江作战，指解放战争时期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对国民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强渡江河的进攻战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但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仍不甘心其失败，表示愿以中国共产党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企图通过“和谈”，实现“划江而治”，以便依托江南各省，争取时间，重整军力，伺机反扑。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国共两党谈判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曾数度命令人民解放军推迟渡江时间。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方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以3个兵团9个军，第三野战军以4个兵团15个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在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的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于1949年4月20日夜起，至21日，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了国民党22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接着，又分路向南挺进，于5月3日解放杭州，5月22日解放南昌，5月27日攻占上海。林彪、罗荣桓等领导的第四野战军于5月14日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100余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长江。

[2] 即《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3] 林，指林彪。罗，指罗荣桓，当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

[4] 张际春，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六）江淮、皖西必须立即统一，究以立即建立安徽省委为宜，还是以豫皖苏分局移至合肥统一江淮皖西两区及淮北安徽部分为宜，请在你们此次会议（邓子恢^[1]如尚在你们那里，应参加此次华东局会议）上解决，并立即施行，报告中央备案即可。（七）二中全会定三月一日开会，会期五天至七天，你们一切工作须于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布置完毕，除因工作不能到会者外，一切到会的同志均须于二月二十八日到达中央，地点仍在石家庄。

中央军委

丑真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

（魏德尊 岳普才稿）
 刘邓李谭，卫伍震志。你们三月末出
 新洲底副渡江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
 准备一切。（作决）（二）既乘曹到后即开
 一次军委会，依上述计划及中央军委
 方针（五军集中整训时间应缩短，期至三月
 为止）部署一切。（三）你们卫伍曹所列
 保障第八师以林耀初先行南下一事已告
 蔡同志，并另电通知外，其他条件，由
 蔡同志及你们自己解决，由此次军委局

会议自筹解决，凡由中央解决，外请
 会议自筹解决，凡由中央解决，外请
 （四）刘邓李谭小平等既请陈毅同志参加
 兼为委员。（五）编前委照章行使领导
 事及作家的职权，军委局和编前委均直
 属中央。（六）江淮皖西必须统一党以
 即建安徽省委为宜，还应以豫皖苏皖
 鄂鲁皖鄂皖西皖南两区及淮北皖
 鄂鲁皖鄂皖西皖南两区及淮北皖
 鄂鲁皖鄂皖西皖南两区及淮北皖
 鄂鲁皖鄂皖西皖南两区及淮北皖
 鄂鲁皖鄂皖西皖南两区及淮北皖

如尚在你们那案，应即此次军委局会议
 上解决，并立即施行，报告中央，简案即
 可。（七）二中全会应三月四日开会，期五天
 至七天，你们一切工作须于三月五日以前
 布置完毕，除因工作不能到会外，一切到会的同
 志均须三月四日到建，地址仍在石家庄。
 中央军委局真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同意三月底渡江作战的计划》的手稿。

中共中央关于苏联贸易机关 在烟台设立分号事给华东局的电报^[1]

(1949年2月11日)

华东局：

曾方艾鱼电^[2]悉。苏联贸易机关派来烟台设立分号事，如系东北秋林公司，可告其在烟应与其他商店一样履行登记批准手续，开张后应照章按期报告资本账目、营业状况，并缴纳一定商业税。如系商务代表，可同意其在烟设立商务机关，待青岛解放后，可移至青岛，并允为其购、租房屋和仓库。同意你们将需要的货单给他们带回，并抄一份给我们。

中央

丑真^[3]

[1] 这是周恩来给华东局的一份电报，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指1949年2月6日华东财经办事处曾山、方毅、艾楚南关于与苏联贸易人员谈话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苏联贸易机关派代表巴尔索夫到山东了解我方需求情况，并准备在烟台设立贸易机关分号，华东财办准备将我方需要采购的货物名称、种类开单子叫他带回去，但不作为定货单。鱼电，即6日电。

[3] 丑真，即2月11日。

东北野战军先出两个军 迫近汉口钳制白崇禧部^[1]

(1949年2月12日)

林、罗、聂，并告刘、陈、邓，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

为配合华东中原两野战军^[2]三月半出动，三月底渡江之行动，决定林罗先出两个军约十二万人左右，于三月二十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间地区，于三月底夺信阳、武胜关，四月十五日以前夺取花园^[3]、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4]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为执行上述任务，该两军应于二月十八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二月十九日由平津线^[5]出发。请饶漱石邓子恢^[6]二同志于电到三日内将济南经徐州、郑州至郾城的铁路运输能力计算电告，是否可以运十二万人及附属装备按时到达郾城，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电报。

[2] 1949年2月9日，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同年2月5日，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

[3] 花园，镇名，位于湖北孝感市北部。

[4]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平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天津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6] 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邓子恢，当时任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

以备决定该两军全部步行至济南车运，或者以一部车运先到，另部取道大名、郑州步行后到（由平津线经大名到信阳约九百余公里，连休息时间在内三月底可到）。

军委

丑文

关于归绥问题谈判的方针^[1]

(1949年2月12日)

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部^[2]退入后套让出绥包^[3]归我，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董、邓^[4]部给养不足，可考虑酌予补给。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间划一界线。但如傅^[5]、邓以部队地盘太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有归绥，我方亦可暂时让步。此事已与罗荣桓^[6]同志面谈，请林罗聂按此方针与傅、邓谈判。在解决鄂友三^[7]匪部后，我方部队即不要再向彼方攻击。如董其武自己让出归绥，则可进占归绥，否则即暂在归绥、卓资山^[8]间划一界线互不侵犯。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给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政治委员李井泉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电报上加写的一段话。

[2] 董部，指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率领的第九兵团团部、第一一军，第三一〇师、第二五八师、第二二八师，新编第七师，整编骑兵第十二旅、第十三旅，骑兵第五旅、第十一旅等部。

[3] 绥包，指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包头。

[4] 邓，指邓宝珊，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傅作义的和乎谈判代表。

[5] 傅，指傅作义。

[6] 罗荣桓，当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

[7] 鄂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骑兵第十二旅旅长。

[8] 卓资山，镇名，今为内蒙古卓资县县治。

不要轻敌甚为重要^[1]

(1949年2月13日)

小平、陈毅同志，并告饶、康、曾，粟、谭^[2]：

(一) 二月六日报告^[3]收到，极好，即转发各处研究，指导所属纠正同类偏向。我们欢迎此种分析党内思想动向的报告。(二) 中野及中原党百余高干会议刚毕，不需要再开会了。华野似宜于二月十八日左右再开一次高干会，检讨上次会议执行情况，加紧准备渡江，传达将重点放在城市的指示。会后你们即来开二中全会，于二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到达中央即可。(三) 不要轻敌一点，甚为重要。我们说国民党基本上已被打倒，以后可能没有像辽西^[4]、淮海那样规模的大作战了，绝不应当被引导到轻敌思想。敌人还是要挣扎的，我们还要打仗，不过往后的作战可能没有像辽西、淮海每次歼敌五六十万那样大的规模和局部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业已增加罢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的电报。

[2] 饶、康，指饶漱石、康生，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和副书记。曾，指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部长。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

[3] 指1949年2月6日邓小平、陈毅关于传达讨论1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4] 这里指辽沈战役。

了。此点在会议时望着重说明，不使产生偏向为要。

中央
丑元

任何外国或联合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

(1949年2月13日)

任何外国政府或联合国组织，绝对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澳大利亚外长关于由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建议，是荒谬的和侮辱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反动卖国集团发言人孙科、潘公展之流的可耻谈话，不过是表示他们一贯的卖国的立场。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在其一月八日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干涉失败之后，仍在梦想新的国际干涉。但是任何这一类的企图，无论其出于何方及采取何种名义，都只能遭受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致天津市委等电^[1]

(1949年2月13日)

据天津市委一月二十八日报告，此次我军进入天津后，连续发生汽车撞死市民事件，死六人伤一人，给市民影响很坏。我们意见除严格训练汽车司机外，对于受害市民，天津市委应以林、罗名义予以抚恤，并对肇事人员给以应得之处分，所有抚恤及处分经过，应使天津市民知道。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天津市委、总前委并告北平市委电的主要内容。

为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 致杜镛和魏文翰电^[1]

(1949年2月13日)

—

彭、叶：

下电请由电报局发往上海为要。

中央
丑元

二

全国轮船业联合会理事长杜镛先生、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翰先生大鉴：


二月七日来电已悉，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

[1]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月初，北平、天津相继解放，上海地区燃煤供应即将中断。全国轮船同业公会联合会（简称船联）向国共双方吁请，建议以面粉北运，交换煤斤来沪。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

为重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此间已嘱北平叶剑英市长、天津黄敬市长准备接待。英商太古公司湖南号驶抵塘沽，系属临时性质，并非事前洽定，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纯系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

毛泽东 周恩来

二月十三日


 519 (综合档案馆) 82
 發北平接。 桐案 華航/HA/MI 0414
 此發亦不抄 0414
 月 NO. 432 NO. 433 NO. 435
 附註：毛、周、運、華、實、周、月
 內容：華航航局公理雜誌熱內工電 類

新信。毛澤東 周恩來 二月十日

彭案，不需請由電報局存往上海存案，快遞。
 蘇聯航業聯合會理事長杜鎰先生上海平報航業公
 會理事長魏文瀚先生熱電二月七日來電已悉，恢
 復航線，與海運無異，此項生產之發展極為重要
 大上海、雲小、兩輪北駛，至派員至華北接洽，極表
 歡迎。此間已囑北平葉劍英市長
 天津黃敬市長準備接待。英商太古公司湖南號
 駛抵塘沽，系屬臨時性質，並非事前洽定。所謂
 華中、華南中國船舶開往華北口岸，將不許其駛
 返原地，純系報紙造謠，流言止于智者。先生

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杜鎰和魏文瀚电的手稿。

致天津市委等电^[1]

(1949年2月13日)

杜月笙^[2]、魏文瀚致电毛、周称，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员接洽，同时与开滦矿局洽妥以煤十万吨南运俾交换面粉三十万吨，由大上海、唐山两轮往返分运，并随带邮件。

恢复华北、上海间船运极为重要，大上海轮到后你们应妥为办理这批生意，对魏文瀚等来访应予接待，并与洽商恢复船运事宜。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天津市委并转唐山市委并告总前委，华北局，北平市委电的主要内容。

[2] 杜月笙，即杜镛。

在中共中央关于对邵力子等谈话 方针问题的电报稿上加写的话

(1949年2月14日)

对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四事，你们应表示关切。津、沪通船现已开始，北平通电未停，天津亦可恢复通电，平、津民航及通邮，均可考虑恢复。估计彼等对此四事，必感兴趣。

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应按时向太原出动^[1]

(1949年2月15日)

杨、罗、耿，并告杨、李、林、罗，聂、薄^[2]：

十四日九时电^[3]悉。两兵团如等候溶编国民党军，则需时将甚久，攻取太原后又需休整。因此，不要等候溶编，应派出溶编部队之干部率领溶编部队跟进。两兵团则于十九日按时出动，三月上旬到达太原附近，争取于三月中旬解决太原问题，然后休整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向西安方向出动。

军委

丑删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和参谋长耿飏的电报。

[2] 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聂、薄，指聂荣臻、薄一波，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9年2月14日9时杨得志、罗瑞卿、耿飏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按原规定华北二、三兵团均应于19日或20日出发，但两兵团均各需溶编一个由北平出来的国民党军，现尚未到手。因此，时间似乎仓促一点，是否可稍为推迟。

把南北通船通航通邮诸事 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1949年2月15日)

彭、叶，并告总前委、天津市委、华北局，并发各局、各前委：
丑文^[1]电悉。

为了（一）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政策措施，便利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地接收管理和发展各大城市的生产；（三）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等项目的，我们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2]），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北平电讯局未停，天津电讯局亦应准备恢复通电。平、津与南方邮务、交通亦应恢复。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在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我们的检查不可过严。对付特务，主要应从群众工作和内线工作方面去取得成绩，而不要从限制交通、通讯方面去求成绩。京、沪、汉等地的国民党必然会利用我们恢复交通、通讯派遣一些特务来平、津，并互相联络。但平、津方面增加了一些特务，京、沪、

[1] 丑文，即2月12日。

[2] 中航、央航，即国民党政府的两个民用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

汉方面即减少了一些特务，特务总数并不因此增加。而京、沪、汉诸地几个月之后即是属于我们的。因此，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此次南京代表团回去对我影响极好。现在上海代表团又来了，将来武汉、长沙亦可能派代表团来。这些代表团都是资产阶级及绅士们的代表，其中有些是国民党人。他们处在国民党灭亡在即、我军即将占领全国的形势下，不得不向我们找出路。这是有利于我们发展的现象，故应好好地应付这些代表团。并由总前委及董薄^[1]、彭叶共同负责研讨并提出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的具体办法报告我们批准，以便与上海代表及魏文瀚、金山^[2]等解决问题。

中央
删亥

[1] 董，指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指薄一波，当时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2] 魏文瀚（1896—？），天津市人，当时任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被推为赴北平参加南北通航谈判的代表。金山（1911—1982），湖南沅陵人，当时是清华电影公司经理，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南北通航谈判工作。

四分五裂的反动派 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

(1949年2月15日)

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速度，比人们预料的要快。现在距离解放军攻克济南只有四个多月，距离攻克沈阳只有三个多月，但是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宣传上的一切残余力量，却已经陷于不可挽救的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国民党统治的总崩溃开始于北线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南线的淮海战役期间，这三个战役使国民党在去年十月初至今年一月底的不足四个月中丧失约一百五十四万多人，包括国民党正规军一百四十四整师。国民党统治总崩溃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伟大胜利的必然结果，但是国民党及其美国主人的“和平”叫嚣，对于促进国民党崩溃一事，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国民党自己从头到脚都打烂了。除了傅作义将军协助人民解放军已经和平地解决了北平问题以外，各地希望和平解决的还大有人在。美国人站在一旁发干急，深恨其儿子们不争气。其实，和平攻势这个法宝出产于美国工厂，还在大半年以前就由美国人送给了国民党。司徒雷登本人曾经泄露了这个秘密。他在蒋介石发出所谓元旦文告以

后，曾告中央社记者说，这是“我过去所一直亲自努力以求的东西”。据美国通讯社称，该记者因发表了这段“不得发表”的话而丢了饭碗。蒋介石集团长期地不敢接受美国人的这个命令，其理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一项指示中说得很明白：“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国民党当时发出这个指示，是因为国民党的其他派别已经在主张言和了。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白崇禧及其指导下的湖北省参议会向蒋介石提出了“和平解决”的问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今年一月一日发布在五个条件下进行和谈的声明。蒋介石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蒋介石于一月八日派张群到汉口去要求白崇禧的支持，同日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干涉中国的内战^[1]。但是这些步骤全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一月十四日的声明，致命地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虽然蒋介石、李宗仁 and 美国人对于这一手曾经作过各种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较可看的双簧，但是结果却和他们的预期相反，不但台下的观众愈走愈稀，连台上的演员也陆续失踪。蒋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但是 he 已丧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来愈少。孙科的“行政院”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它一面脱离了

[1] 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1月8日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干涉中国内战，遭到四国政府拒绝。美国政府在其1月12日答复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中，说明美国之所以拒绝国民党政府的要求，是因“殊难相信”“能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这就是说，美国当时已感到再也无力挽救它所扶植的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灭亡。

它的“总统”“代总统”，另一面也脱离了它的“立法院”“监察院”。孙科的“行政院”号召战争，但是进行战争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州，也不在南京，人们只知道它的发言人在上海。这样，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①。李宗仁自上月二十一日登台到现在下过的命令，没有一项是实行了的。虽然国民党已经没有一个“全面”的“政府”，虽然许多地方都在进行着局部和平的活动，但是国民党死硬派却在反对局部和平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其目的就是取消和平，妄想再战；他们深怕局部和平的活动蔓延起来，至于不可收拾。以一个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的滑稽剧，在本月九日上海伪国防部政工局长战争罪犯邓文仪的一篇声明中，达到了高峰。邓文仪和孙科一样，推翻了上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关于以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为谈判基础的声明，而要求所谓“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否则“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但是邓文仪没有说出在今天他的对方究竟应和什么人去谈判“平等的”“全面的”和平。似乎找邓文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乎不找邓文仪或者其他张三李四也不能解决问题，这就未免叫人为难了。据中央社上海九日电称：“新闻记者问邓文仪：李代总统是否已同意邓局长所发表之四项意见^②？答：本人系在国防部立场发言，本日所发表之四项意

[1] 这是借用公元14世纪元朝人萨都刺所作《念奴娇·登石头城次东坡韵》词中的话。这首词的上阕是：“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惟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南京古称石头城。吴楚泛指长江的中下游。

[2] 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于1949年2月9日在上海发表《和平与战争的发展》的书面谈话，提出所谓“四项意见”：一、“政府要和”；二、“中共要战”；三、“北平局部和平成了骗局”；四、“备战以言和，能战方能和”，“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

见，事前并未呈经李代总统过目。”邓文仪在这里不但创造了一个伪国防部的局部立场以区别于伪国民党政府的全面立场，而且事实上还创造了一个伪国防部政工局的小局部立场以区别于伪国防部的大局部立场。因为邓文仪公开反对并污蔑北平的和平解决，而伪国防部则在一月二十七日称赞北平的和平解决，是“为了缩短战争，获致和平，借以保全北平故都基础与文物古迹”，并称其他地方例如大同绥远等处^[1]亦将依同样方法“实施休战”。由此可见，叫喊“全面和平”最起劲的反动派，原来就是最缺乏全面立场的反动派。一个国防部政工局可以和国防部互相矛盾，又可以和它的代总统互相矛盾。这些反动派是今天中国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他们梦想在“全面和平”的口号下鼓吹全面战争，即所谓“战要全面战，和要全面和”。但是，事实上他们既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和平，也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战争。全面的力量是在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这一方面，不在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握有全面的力量，另一方面，陷于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绝境，这种局面，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和国民党长期作孽的结果。任何郑重的人，都不能忽视今天中国政治形势中这个基本的事实。

[1] 在天津、北平解放后，华北国民党军队只剩下几个残余的孤立据点，其中包括太原、大同、新乡、安阳、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等地。太原国民党军于1949年4月24日被人民解放军完全歼灭。大同国民党军于4月29日接受和平改编。新乡国民党军于5月5日向人民解放军投降。5月6日，安阳国民党军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归绥于9月19日和平解放。

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1]

(1949年2月15日)

八日及十四日十五时两电均悉。(一) 同意你们对傅部彻底处理的方案；(二) 为接收九十二军、十六军及十三军八十九师之目的，华北两兵团可以推迟至本月底或下月初执行太原作战任务。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改编傅作义部队的方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 变为呼吁战争

(1949年2月16日)

【新华社陕北十六日电】是自从一月一日蒋匪介石发动和平攻势以后，曾经连篇累牍地表示自己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英雄好汉们，一到二月上旬，和平的调子就突然低落下去，“和共党周旋到底”的老调忽又高弹起来。最近数日，更是如此。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给“各党部各党报”的《特别宣传指示》上说：“叶剑英向我后方宣传中共对和平有诚意，而指责政府军事布置为无诚意谋和。各报对此，必须依据下列各点从正面与侧面力加驳斥。”这个《特别宣传指示》一连列举了好几点应当“驳斥”的理由。“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谓战犯名单，将政府负责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蛮横无理，显而易见。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则和平商谈之途径，势难寻觅。”两星期以前那种如丧考妣地急着要谈判的神气，再也不见了。所谓“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这些传遍人间、沁人心脾的名句，再也不提了。假如中共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作风”，一定要惩办战争罪犯，那就不能谈

和平了。究竟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呢，还是以拯救战争罪犯为前提呢？按照国民党英雄好汉的《特别宣传指示》，是选择了后者。战争罪犯的名单，中共方面尚在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征求意见中，现在已经收到了好几方面的意见。根据这些已经收到的意见，都是不赞成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所提的那个名单。他们认为那个名单所列战犯只有四十三个，为数太少；他们认为要负发动反革命战争屠杀数百万人民的责任的人决不止四十三个，而应当是一百几十个。现在姑且假定战犯将确定为一百几十个。那末，请问国民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为什么要反对惩办战犯呢？你们不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的吗？假如因为你们这一反对，使得战争还要打下去，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拖延时间，延长战祸”这八个字的罪名是你们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南京政府发言人的名义发出声明，加在共产党身上的，现在难道你们想收回去，写上招贴，挂在你们自己身上，以为荣耀吗？你们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大慈大悲的人们，为什么一下子又改成以拯救战犯为前提了呢？根据你们政府内政部的统计，中国人民的数目，不是四亿五千万，而是四亿七千五百万，这和一百几十个战犯相比，究竟大小如何呢？英雄们是学过算术的，请你们按照算术教科书好好地算一下再作结论吧。倘若你们不去算清楚就将你们那个原来很好、我们也同意、全国人民也同意的提法——“以拯救人民为前提”，急急忙忙地改成“以拯救一百几十个战犯为前提”，那你们可要仔细，你们就一定站不住脚。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就是这样倒霉的，他们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宝塔的

尖顶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人民大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有良心的国民党人，都请听着：站在你们头上横行霸道的国民党死硬派，没有几天活命的时间了，我们和你们是站在一个方面的，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國就要出现了。

新华社十日（按：原稿）自一月一日蒋匪介石发动
 平政变以后，曾经连篇累牍地表示自己愿意
 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民国前途
 的国民党反动派，一到和平，（拯救）和平的帽子
 实在低落下去，和平就周旋到底的老调，忽而高
 弹起来。最近数日，更是如此。南京代表团到
 北平回去之后，立即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
 迫害。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处给各党部各党报的特别
 宣传指示说：李剑英利用所谓南京和平代表重作
 宣传，向我后方宣传中共对和平有诚意，而指责政
 府军事布置为无诚意谋和。各报对此，必须依控例
 各点定正面与侧面，力加驳斥。这个特别宣传指示
 一连列举了好几点。第一，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
 如作战到底。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一点为“国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手稿。

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

(1949年2月18日)

“政府自抗战结束以后，即以和平建国方针力谋中共问题之和平解决。经过一年半之时间，一切协议皆为中共所破坏，故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谓战犯名单，将政府负责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蛮横无理，显而易见。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则和平商谈之途径，势难寻觅。”以上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发《特别宣传指示》中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全部论点。

这个论点，不是别人的，是第一名战争罪犯蒋介石的。蒋介石在其元旦声明里说：“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战事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意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的步骤见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

在蒋介石发表这个声明的前七天，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有中共权威人士提出了四十三个战犯名单，赫然列在第一位的，就是这个蒋介石。战犯们又要求和，又要逃避责任，只有将责

任推在共产党身上一个法子。可是这是不调和的。共产党既然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那末，就应当惩办共产党。既然是“匪”，就应当“剿匪”。既然“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就应当“戡乱”。“剿匪”，“戡乱”，是百分之百的对，为什么可以不剿不戡了呢？为什么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以后，一切国民党的公开文件一律将“共匪”改成了“共党”呢？

孙科觉得有些不妥，他在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的同一天的晚上，发表广播演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论点。孙科说：“回忆三年前，当抗战胜利的初期，由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由于国家需要积极建设，由于各党派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尚有共同的认识，我们曾经集合各方代表和社会贤达于一堂，举行过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三星期的努力，更多谢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先生的善意调协，我们也曾经商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和解决各种争端的具体方案。假如当时我们能将各种方案及时实行，试问今日的中国应该是如何的繁荣，今天的中国人民应该是如何的幸福啊！可惜当时各方既未能完全放弃小我的利害，全国人民亦未能用最大的努力去促进这个和平运动的成功，遂致战祸复发，生灵涂炭。”

孙科比较蒋介石“公道”一点。你看，他不是如同蒋介石那样，将战争责任一塌括子推在共产党身上，而是采取了“平均地权”的办法，将责任平分给“各方”。这里也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也有民主同盟，也有社会贤达。不宁唯是，而且有“全国人民”，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一个也逃不了责任。蒋介石是专打共产党的板子，孙科是给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全国同胞每人一板子，连蒋介石，也许还有孙科，也得挨上一板子。你看，两个国民党人，孙科和蒋介石，在这里打架。

第三个国民党人跑上来说：不然，照我的意见，责任应全归国民党。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宗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发表了一个声明。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他说：“在八年抗战之后，继之以三年之内战，不仅将抗战胜利后国家可能复兴之一线生机毁灭无遗，而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庐舍悉遭摧毁荒废，无辜人民之死伤成千累万，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到处皆是。此一惨绝人寰之浩劫，实为我国内战史上空前所未有。”

李宗仁在这里出的是无头告示，他也没有说国民党应负责任，也没有说共产党或者别的方面应负责任，但是他说出了一个事实，这个“惨绝人寰的浩劫”，不是出在别的地方，而是出在“黄河南北”。查黄河以南直至长江，黄河以北直至松花江，谁在这里造成这个“惨绝人寰的浩劫”呢？难道是这里的人民和人民的军队自己打自己造成的吗？李宗仁是做过北平行营主任的，桂系的军队是和蒋系军队一道打到过山东省的沂蒙山区的，所以他有确实的情报，知道这种“浩劫”的地点和情况。如果说，李宗仁别的什么都不好，那末，他说出了这句老实话，总算是好的。而且他对这场战争起的名称，不叫“戡乱”或“剿匪”，而叫“内战”，这在国民党方面来说，也算得颇为别致。

根据李宗仁自己的逻辑，在同一个声明里，他说：“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李宗仁知道八条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而且也有他自己的大名在内。战犯的应当惩办，是“浩劫”的逻辑的结论。为了这一点，至今国民党死硬派还在吞吞吐吐地埋怨李宗仁，即所谓“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

死硬派的埋怨之所以只能是吞吞吐吐，而不敢明目张胆，是有

原因的。当蒋介石还没有“引退”时，死硬派原来想批驳八条，后来蒋介石一想不妥，决定不驳，大概是认为驳了就绝了路了，这是一月十九日的事情。当着一月十九日早上，张君勱从南京回到上海，发表谈话，说了“关于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不久即可能发布另一文告，提出答复”这句话的时候，中央社即于晚间发出通报说：“顷播沪电张君勱谈话一稿，请于电文末加注按语如下：张氏谈话中所说政府不久即发布另一文告一点，中央社记者顷自有关方面探悉，政府并无发布另一文告之拟议。”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发表“引退”声明，并无只字批评八条，并且把他自己的五条也取消了，改变为“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宪法、法统、军队等项都不敢再提了。因此，李宗仁在一月二十二日敢于承认以中共的八条为谈判基础，国民党死硬派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出面反对，只能吞吞吐吐地说一声“政府原不应接受”。

孙科的“平均地权”政策是否坚持不变呢？也不。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孙科“迁政府于广州”以后，二月七日发表演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他说：“半年以来，因战祸蔓延，大局发生严重变化，人民痛苦万状。凡此种种，均系过去所犯错误、失败及不合理现象种下前因，以致有今日局势严重之后果。吾人深知中国需要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一日不能实现，则中国之问题始终不能解决。追忆本党总理二十年以前以三民主义亲自遗交本党，冀其逐步得以实行。苟获实行，绝不致演至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人们请看，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在这里，不是平分责任给一切党派和全国同胞，而是由国民党自己担负起来了。孙科将一切板子都打在国民党的屁股上，使人们觉得甚为痛快。至于共产党呢？孙院长说：“吾人试观中

共能以诱惑及麻醉人民，亦无非仅以实行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一部分，即平均地权一节为号召。吾人实应深感惭愧，而加强警惕，重新检讨过去之错误。”谢谢亲爱的院长，共产党虽然尚有“诱惑及麻醉人民”的罪名，总算没有别的滔天大罪，致邀免打，获保首领及屁股而归。

孙院长的可爱，还不止此。他在同一演说里又说：“今日共党势力之蔓延，亦即系因吾人信仰之主义未能实行之故。本党在过去最大之错误，即系党内若干人士过分迷信武力，对内则争权倾轧，坐贻敌人分化离间之机会。及至八年抗战结束，本为实现和平统一千载难逢之时机，政府方面亦原有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纠纷之计划，不幸未能贯彻实施。人民于连年战乱之后，已亟待休养生息。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痛苦殊深，亦影响士气之消沉，以致军事步步失利。蒋总统俯顺民情，鉴于军事方法之未能解决问题，乃于元旦发表文告，号召和平。”好了，孙科这一名战争罪犯，没有被捕，也没有被打，即自动招供，而且忠实无误。谁是迷信武力，发动战争，及至军事方法未能解决问题，方始求和的呢？就是国民党，就是蒋介石。孙院长用字造句也很正确，他说过分迷信武力的是他们党内的“若干人士”。这一点，对于中共仅仅要求惩办若干国民党人，把他们称之为战争罪犯，而不要求惩办更多的更不是全体的国民党人，是互相一致的。

我们和孙科之间，在这个数目字上并无争论。不同的是在结论上。我们认为，对于这些“迷信武力”，使得“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的国民党的“若干人士”，必须当作战犯加以惩办。孙科则不同意这样做。他说：“现共方之迟迟不行指派代表，一味拖延，显示共方亦正迷信武力，自以为目前业已羽毛丰满，可以凭借武力征服全

国，故拒绝先行停战，其用心亦极显然。余兹须郑重提出者，即为求获得永久之和平，双方必须以平等资格进行商谈，条件则应公平合理，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这样看来，孙院长又有些不可爱了。他似乎认为惩办战争罪犯一项条件不算公平合理。他的这些话，和二月十三日国民党宣传部的《特别宣传指示》对于战犯问题所表示的态度，是一样地吞吞吐吐，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出反对，较之李宗仁敢于承认以惩办战犯为谈判的基础条件之一，大不相同。

但是孙院长仍旧有可爱的地方，这即是他说共产党“亦正迷信武力”，是表现在“迟迟不行指派代表”和“拒绝先行停战”这两点上，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在一九四六年就迷信武力发动惨绝人寰的战争。夫“迟迟不行指派代表”者，是因为确定战犯名单是一件大事，要是“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少了，多了，都不合实际，“全国人”（但不包括战犯及其帮凶）不能接受，故须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互相商量，以此“拖延”了一段时间，并且未能迅速指派代表，引起了孙科之流颇为不快。但是这也不能一口断定即为“亦正迷信武力”。大约不要很久，战犯名单就可公布，代表就可指派，谈判就可开始，孙院长就不能说我们“迷信武力”了。

至于“拒绝先行停战”，这是服从蒋总统元旦文告而采取的正确态度。蒋总统元旦文告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孙科的行政院，于一月十九日，做出了一个违反蒋介石上述文告的决议，说什么“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中共发言人曾于一月二十一日给了这个不通的决议以严正的批评。不料该院长充耳不闻，又于二月七日乱说什么中共“拒绝先行停战”，就是表示中共“亦正迷信武力”。连蒋介石那样的战争罪

犯，也知道停止战争，恢复和平，没有商谈是不可能的，孙科在这点上比蒋介石差远了。

人们知道孙科之所以成为战犯，是因为他一向赞助蒋介石发动战争，并坚持战争。直到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他还说：“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1]他就是国民党内迷信武力的“若干人士”之一。现在他站在一旁说风凉话，好象他并没有迷信过武力，三民主义没有实行他也不负责任。这是不忠实的。无论正国法，或者在国民党内正党法，孙科都逃不了挨板子。

[1] 这是孙科1947年6月22日在南京接见美联社、国民党中央日报和新民报的记者时发表的谈话中说的，当时孙科任国民党政府副主席。

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电^[1]

(1949年2月18日)

(一) 如果四人^[2]问及李济深时，可告诉他们，李等民主人士不日要来北平。并劝四人多住几天，待李等到了，大家谈谈。(二) 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白、张、邵^[3]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但李宗仁在上任后的和平吹嘘和一月二十日以前蒋介石及CC系的和平攻势并无区别，故我们必须揭露和回击。此种和平攻势，今后还是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在作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但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但必要的批评还是不可少的，李、白还是应当列在战犯名单之内。一则因为桂系是坚决地参加了内战的，不列李、白显得不公道；二则列了李、白并不碍和谈，不列李、白则李、白反不便于应付蒋党。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董必武、彭真、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指上海和平代表团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四人。

[3] 李、白、张、邵，指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

致叶剑英等电^[1]

(1949年2月20日)

请告颜、邵、章、江，毛主席欢迎他们来谈，时间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叶剑英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彭真电的主要内容。

致叶剑英等电^[1]

(1949年2月20日)

欢迎傅作义、邓宝珊和颜、邵、章、江一道来此一谈，请问傅、邓是否同意，如愿来时，亦如颜、邵等一样，不要带任何随从，并要对谈话地点保守秘密。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1]

(1949年2月21日)

关于傅作义、邓宝珊的工作问题，待他们来中央谈过后再考虑。关于过去同傅作义所订协定，请你们抄录一份完全的，字斟句酌，发表出去对内对外均无不良影响者，并交傅、邓看过，得其同意，然后发来中央审阅发表。至于傅自己的通电，我们希望他好好写一个，要有自我批评，要表示反对美帝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中共政策，愿受中共领导，如傅能发此通电，对于教育傅部及对全国均将有好影响。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

(1949年2月21日)

【新华社陕北二十一日电】桂系首领战争罪犯李宗仁、白崇禧的言论行动，究竟是否和蒋介石、顾祝同辈有区别的问题，引起了人们谈论的兴趣。

人们说，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起蒋介石谈和平，从同年同月二十二日起李宗仁谈和平，两个人都谈和平，这是没有区别的。蒋介石没有下过如像言论自由，停止特务活动等项命令，李宗仁下了这些命令，这是有区别的。但是李宗仁的命令全是空头支票，不但一样都没有实行，而且人民被压迫得更厉害了。南京方面连和平促进会也封闭了，上海方面屠杀了罢工工人，白崇禧则活像顾祝同。顾祝同命令刘峙炸毁了津浦路蚌埠淮河大铁桥。白崇禧也正在命令张轸准备炸毁平汉路长台关淮河大铁桥及武胜关的隧道工程，积两年半之经验，黄河南北的人民深知桂系军队的野蛮，较之蒋系军队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骂蒋介石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听惯了，从来不申辩。人们骂李宗仁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李宗仁没有听得惯，急忙忙起来申辩。例如李宗仁在一月二十七日经过中央社发表的“致电毛泽东”里面说：“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这里，李宗仁不但

替一月二十二日以后的李宗仁政府求洗刷，而且替一月二十二日以前的蒋介石政府求洗刷，人们知道“倡导和平”这件事，蒋介石在前，李宗仁在后。

蒋介石昨天是凶神恶煞。李宗仁、白崇禧及其桂系，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则有些像笑面虎了。

蒋介石撒起谎来，大都是空空洞洞的，例如“还政于民”“我历来要和平”之类，不让人家在他的话里捉住什么具体的事物。李宗仁在这件事上显得蹩脚，容易给人抓住小辫子。例如，在他那个“致电毛泽东”里面说：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民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在逐步施实。“事实俱在，何得谓虚？”人们说：“事实毫无，何得谓实？”李宗仁说：“事实俱在，何得谓虚？”李宗仁就是具有这样一种傻劲的人物。

但是李宗仁也有胜过蒋介石的地方。在应否惩办战争罪犯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及其死党从来不说可以惩办的话。他们或者不说话，例如在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的引退文告里对于中共的八条一字不提，或者表示反对态度，例如雷震、朱家骅、潘公展等人所发表的言论，根本反对将战犯当作问题来讨论。孙科也近似这些人，他说和谈条件必须“公平合理”，意思就是反对惩办战犯。李宗仁不是这样，他是又赞成，又反对，这就是李宗仁别致的地方。

李宗仁在其一月二十二日的声明里说：“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这即是说，李宗仁的政府愿意即刻开始商谈中共方面所提的惩办战争罪犯一项条件以及其他七项条件，他首先给你一点甜的东西吃。过了六天，李宗仁的腔调变了，而且变得很厉害。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代总

统，在其“致电毛泽东”里面说：“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谈尚未开始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执行某项条件，则何得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加十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瞧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哎哟哟，李宗仁来得厉害，这一枪非同小可。但是李宗仁的枪法，仍然不过是小诸葛桂系教程里的东西。中国自有孙子兵法足以破之。夫“在双方尚未开始商谈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执行某项条件”者，是因为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自其兵败如山倒以后，即如丧考妣地要求谈判。中共说，好，待我们准备好了你们即来谈。战犯们说，不行，非立刻开谈不可。中共说，你们闲得发慌，给你们一件工作做罢，你们去逮捕一批（自然不是全部）战犯。故事的过程就是这样。后来，中共又将逮捕改为监视，算是作了一个极大的让步，战犯们才安静下来，不再吵闹了。这是后话，不提。且说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又说，恩怨是非不要过分重视，即是说不要分清战争责任，不要惩办战争罪犯，哪怕黄河以南直至长江，黄河以北至松花江，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浩劫”（谨按，此语见之于李代总统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文告），那也算不了什么。如果你们一定要惩办战犯，则战犯们的拥护者会要报复的。这种报复，可能达到可怕的程度，即全国同胞中没有一个人能吃东西了，都死完了。如此，你毛泽东和我李宗仁两个，将要被我们民族（谨按，既然都死完了，为什么还有民族，待考）判决为一千年那么长久时期内的犯罪者。还好，只有一千年受罪，一千零一年又是一条好汉，这算是李代总统的恩典。

人们请看，李宗仁就是这样反复无常的，又赞成商谈惩办战

犯，又不赞成实行惩办战犯，他的脚踏在两条船上，这就是他和蒋介石不同的地方。

和傅作义的谈话

(1949年2月22日)

毛泽东 (以下简称毛): 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 清清楚楚, 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 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 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毛: 我俘虏你的人员, 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傅作义 (以下简称傅): 给我? 我怎么处理呢? 还要送到绥远去, 为什么呢?

毛: 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 共产共妻吗? 他们到了绥远, 可以现身说法, 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 二不侮辱人格, 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 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

毛: 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 等待他们的起义。

毛: 傅将军, 你愿意做什么工作?

傅: 我想, 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 最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毛: 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 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 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 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 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 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

给周恩来的信^[1]

(1949年2月26日)

少奇修改《政策汇编》(似可用此四字为书名)，请印数十份，作为清样，发给二中^[2]诸同志。正式出书，可在二中后一二星期内。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信的主要内容。

[2] 二中，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复华东军区电^[1]

(1949年2月27日)

你们对重庆号的处置是适当的。只要有可能就要争取邓兆祥、陆荣一^[2]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以利争取国民党海军全部归顺过来。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华东军区电的主要内容。

[2] 邓兆祥、陆荣一，当时分别任重庆号巡洋舰正、副舰长，2月25日率该舰全体官兵在上海吴淞口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

致罗荣桓电^[1]

(1949年2月27日)

请你对动员学生参军一事加以适当注意，告诉进行此事的机关不要操之过急，绝不要直接去各学校动员，引起误会。华大现允先拨三千人，已很好，如不足七千人，暂时少一点也不要紧。湘、鄂、赣三省有广大的学生可以参军。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同意三个兵团攻击方向之区分的部署^[1]

(1949年2月27日)

徐、周、陈：

二月二十六日电^[2]悉。同意你们所提三个兵团攻击方向之区分，请按此区分规定三兵团的行军路线。

军委

二月二十七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的电报。

[2] 1949年2月26日，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致电军委，电文内称：“关于各兵团攻击方向区分，我们提议，我兵团及彭绍辉纵队由城东攻，二兵团由城南攻击，三兵团由城东北攻击，晋中部队在河西助攻。”

防止敌袭扰我后方的部署^[1]

(1949年2月28日)

聂、薄，杨成武，钟赤兵^[2]：

(一) 在我主力南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之下，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有向我后方袭击扰乱之可能。(二) 你们有保卫秦皇岛塘沽两处海口，准备击退敌军可能进攻的任务。(三) 第二十兵团除留一个军位于大同区域以外，杨李兵团^[3]部率主力两个军即开秦皇岛塘沽两处布防，钟苏特纵^[4]亦开该两处布防。在杨钟两部未到以前，聂薄迅即令秦、塘附近守备部队，首先部署对海上的防御，如有敌军偷袭应坚决击退之。(四) 请荣臻、成武、赤兵、苏进四同志即来军委面谈部署问题。(五) 钟苏电台即与军委电台联络。

军委

二十八日四时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治委员薄一波等的电报。

[2] 钟赤兵，当时任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政治委员。

[3] 杨李兵团，指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

[4] 钟苏特纵，指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政治委员钟赤兵、副司令员苏进。

加整彭述，林，半局，粟裕，中接

发荣局，杨成武。
NO. 1007
NO. 1008
NO. 1009
NO. 1010
NO. 1011
NO. 1012
NO. 1013
NO. 1014
NO. 1015
NO. 1016
NO. 1017
NO. 1018
NO. 1019
NO. 1020
NO. 1021
NO. 1022
NO. 1023
NO. 1024
NO. 1025
NO. 1026
NO. 1027
NO. 1028
NO. 1029
NO. 1030
NO. 1031
NO. 1032
NO. 1033
NO. 1034
NO. 1035
NO. 1036
NO. 1037
NO. 1038
NO. 1039
NO. 1040
NO. 1041
NO. 1042
NO. 1043
NO. 1044
NO. 1045
NO. 1046
NO. 1047
NO. 1048
NO. 1049
NO. 1050
NO. 1051
NO. 1052
NO. 1053
NO. 1054
NO. 1055
NO. 1056
NO. 1057
NO. 1058
NO. 1059
NO. 1060
NO. 1061
NO. 1062
NO. 1063
NO. 1064
NO. 1065
NO. 1066
NO. 1067
NO. 1068
NO. 1069
NO. 1070
NO. 1071
NO. 1072
NO. 1073
NO. 1074
NO. 1075
NO. 1076
NO. 1077
NO. 1078
NO. 1079
NO. 1080
NO. 1081
NO. 1082
NO. 1083
NO. 1084
NO. 1085
NO. 1086
NO. 1087
NO. 1088
NO. 1089
NO. 1090
NO. 1091
NO. 1092
NO. 1093
NO. 1094
NO. 1095
NO. 1096
NO. 1097
NO. 1098
NO. 1099
NO. 1100
NO. 1101
NO. 1102
NO. 1103
NO. 1104
NO. 1105
NO. 1106
NO. 1107
NO. 1108
NO. 1109
NO. 1110
NO. 1111
NO. 1112
NO. 1113
NO. 1114
NO. 1115
NO. 1116
NO. 1117
NO. 1118
NO. 1119
NO. 1120
NO. 1121
NO. 1122
NO. 1123
NO. 1124
NO. 1125
NO. 1126
NO. 1127
NO. 1128
NO. 1129
NO. 1130
NO. 1131
NO. 1132
NO. 1133
NO. 1134
NO. 1135
NO. 1136
NO. 1137
NO. 1138
NO. 1139
NO. 1140
NO. 1141
NO. 1142
NO. 1143
NO. 1144
NO. 1145
NO. 1146
NO. 1147
NO. 1148
NO. 1149
NO. 1150
NO. 1151
NO. 1152
NO. 1153
NO. 1154
NO. 1155
NO. 1156
NO. 1157
NO. 1158
NO. 1159
NO. 1160
NO. 1161
NO. 1162
NO. 1163
NO. 1164
NO. 1165
NO. 1166
NO. 1167
NO. 1168
NO. 1169
NO. 1170
NO. 1171
NO. 1172
NO. 1173
NO. 1174
NO. 1175
NO. 1176
NO. 1177
NO. 1178
NO. 1179
NO. 1180
NO. 1181
NO. 1182
NO. 1183
NO. 1184
NO. 1185
NO. 1186
NO. 1187
NO. 1188
NO. 1189
NO. 1190
NO. 1191
NO. 1192
NO. 1193
NO. 1194
NO. 1195
NO. 1196
NO. 1197
NO. 1198
NO. 1199
NO. 1200

薛薄，杨成武，钟赤兵，陈国瑞，北及国民党
防止敌人可能进攻秦塘之部署
我主力有任务

有向我后方袭击播乱之可能。(一)你们有保清
秦皇岛塘沽两处，渐以...
特能亦副该两...
薛薄迅即令秦塘附近守备部队首先部

署对海上的防禦如有被军偷襲者坚决起
之。(一)请荣臻、成武、赤兵、薛建之同志即
来军委直接署问题。军委廿四日四时

(一)钟赤兵台即与军委台联络。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聂荣臻等电的手稿。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

(1949年3月5日)

—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

[1]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举行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他在同年6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就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往北平。

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

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

二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三

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

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四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

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五

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区别。南方现时还是被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在这里，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在乡

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那个地区大约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就能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同时必须注意尽可能地维持农业生产的现有水平不使降低。北方则除少数新解放区以外，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已经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并且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

六

我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建设工作，党的经济政策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实施，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这就是说：

第一，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由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有了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受到几重敌人的压迫，得到了锻炼，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资格。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二，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三，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四，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

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多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第五，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

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来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第六，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欲达此目的，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第七，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七

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竭尽全力地帮助国民党。这就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深刻的愤怒，并使帝国主义者丧失了自己在中国人民中的最后一点威信。同时，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大大地削弱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力量是空前地增长了。所有这些情形，使得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

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八

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上海和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正在同我们拉关系。南北通航通邮业已开始。陷于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已经脱离了一切群众。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政府进行谈判。南京反动政府方面在这个谈判中的推动力量是桂系军阀，国民党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他们的目的是使联合政府中有他们一份，尽可能地保存较多的军队，保存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利益，力求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这一派人承认以我们的八条为谈判基础，但是希望讨价还价，使他们的损失不

要太大。企图破坏这一谈判的是蒋介石及其死党。蒋介石还有六十个师位于江南一带，他们仍在准备作战。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这个谈判是全面性的，如能成功，对于我们向南方进军和占领南方各大城市将要减少许多阻碍，是有很大大利益的。不能成功，则待进军以后各个地进行地方性的谈判。谈判的时间拟在三月下旬。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1]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九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

[1] 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从而战败铁扇公主的故事，见明朝吴承恩著的神话小说《西游记》第五十九回。

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我们党内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作风所养成的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确态度，在抗日时期并没有完全克服，在一九四七年各根据地土地改革高潮时期又曾出现过。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现在中国第一次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

十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

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1949年3月5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图为《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消息。

七中附共七屆
卷第七屆

二中全会決議（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

向中國共產黨第七屆

第二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報告

毛澤東

第三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
根據毛澤東同志

的報告認為

自解放以來

代表委員會

中央的領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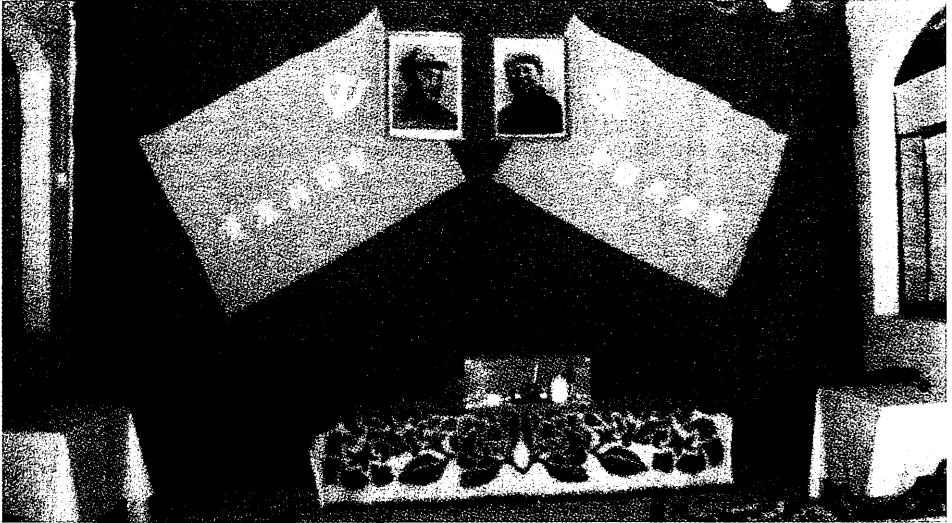
是正確的

並通過如

下的決議

部隊僅僅剩下一百多萬人分佈在新疆到台灣的大陸區內和漫長的戰綫上。今後解決這一百多萬國民黨軍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用戰鬥去解決敵人，例如解決天津的敵人那樣，仍然是我們首先必須注意和必須準備的。人民解放軍的全體指揮員、戰鬥員絕對不可以稍微鬆懈自己的戰鬥意志，任何鬆懈戰鬥意志的思想和輕敵的思想，都是錯誤的。按照北平方式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是增加了，這就是迫使敵軍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徹底地按照人民解放軍的制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用這種方法解決問題，雙方又都命運的迅速掃除和反革命政治影響的迅速消滅，並用戰鬥方法解決問題是要差

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的手稿。



1949年3月5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讨论部署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图为七届二中全会会场。



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



1949年3月，毛泽东和朱德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重要报告。



《两个“务必”》(中国画)

复沈钧儒、章伯钧电

(1949年3月10日)

沈钧儒、章伯钧两先生：

寅虞电奉悉。责盟中委在平设立临时总部，并举两先生为贵盟总部主持人愿与敝党保持密切合作，无任欢迎。兹托李维汉、齐燕铭两同志先行至平接洽，有事请与磋商为盼。

毛泽东

三月十日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

(1949年3月13日)

一、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要把这个班带好，的确不容易。目前各中央局、分局都领导很大的地区，担负很繁重的任务。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当然，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里不过是一个比方。

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

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这一点过去大家不注意，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在这方面大有进步，友好团结关系大大增进了。今后仍然应该不断注意。

三、“互通情报”。就是说，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语言，原因是学习还不够。现在党内的语言比较一致了，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例如，在土地改革中，对什么是“中农”和什么是“富农”，就还有不同的了解。

四、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

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

五、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六、要“抓紧”。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

七、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

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八、“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九、“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

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十一、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十二、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1]？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

[1] 延安是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安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中心。毛泽东以此来比喻革命和反革命。

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我和政治局的同志觉得，要有以上这些方法，才能把党委的工作搞好。除了开好代表大会以外，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把党委的领导工作提高一步。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

(1949年3月13日)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而不应该像王明^[2]同志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因为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

[1]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共10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关于党委制”已改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收入本书。这里选入的是第三、四、五、六、九5个部分。

[2] 王明，即陈绍禹（1904—1974），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31年11月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1937年11月回国，随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1956年后一直滞留苏联，并写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那岂不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分割了吗？而且，我们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归我们，可是有那么一个国家，提出不买你的货，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点普遍性，就不能不超过一定的范围。比如，拿日本来说，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现在算归我们，将来美帝国主义撤走以后，它又该归斯大林管了，这岂不是笑话？当然，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的经验，自然会有人运用的。所以，不要做这种定义。斯大林做列宁主义的定义，是在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季诺维也夫^[1]等的斗争中产生的。那时候在俄国，有马克思、列宁的影响，还有季诺维也夫及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所以要那样提。马、恩、列、斯在中国的威信很高，中国不发生这种问题。

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

[1] 季诺维也夫（1883—1936），苏联“新反对派”首领。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参加1905年革命，190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等职。1925年组织“新反对派”，后又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1927年被清除出党。1936年被处决。1988年苏联最高法院撤销对他的判决，宣布他在法律、国家和人民面前无罪。

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不能比国家的大小，不能因为保加利亚小，苏联也只有两万万人口，而我们国家大，一下就搞了四万万多人口，就应该占先。在这里，数量不等于质量。如果硬要比较，那末马克思的祖国，那里今天还没有革命，那又应当怎么看呢？

有人说，斯大林的思想之称为学说，不称主义，是斯大林的谦虚。我看不是的，不能解释为谦虚，而是因为苏联已经有了一个列宁主义，而斯大林的思想是合乎这一主义的，并且把它贯彻到实际政策中去了。不然，有一个列宁主义，再有一个斯大林主义，那就有了两个主义。同样，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关于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历史的次序也是如此排列的。不能设想，没有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胜利而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帝国主义制度存在的时代，没有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直到苏联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斯大林还是这样谈问题，因为苏联在国内虽然胜利了，但国外来的干涉问题并未消除，现在仍然如此。估计形势，是我们必胜，社会主义必胜，这是整个的趋势和可能性。但要等到最后取胜了才算胜利，中国革命也是一样。而且胜利之后的巩固，没有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也是不行的。如果认为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也可以胜利，那是不正确的，违背马列主义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革命也能胜利。我说，东方的空气比较稀薄，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自然，我们受人帮助，也要时刻准备帮助别人。这就是国际主义。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现在对非党人士也要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

应当宣传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要在全国人民中、在全党中广泛宣传。但同时我们不应当骄傲，从将来建设新中国来说，道路还是很长的，而革命战争的胜利仅是很短的历程，还只是事情的开始。

“毕其功于一役”

“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至于说“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不能这样说的，王明同志这样说，那就错了。

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

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许多同志都讲了，王明同志的发言很不好。他昨天后半段的发言，比较有些进步。问题是他现在失掉了主动性，是被动的，其原因在于他没有自我批评，不愿意承认错误及其错误的基本点。他的“主动性”还停留在四中全会^[1]及十

[1] 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4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

二月会议^[1]上，而那些是错误的，已经受到了批判，那是一条完整的错误路线，“左”的右的都有。在中国产生这样一条错误路线，恐怕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社会现象在党内的反映。

至于王明是否有个人野心，这一点他是不承认的，我认为也没有十分必要一定要他承认。但他承认了个人主义，这就是说不以人民利益为第一，而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了。其实，个人而成了主义，这也就很可观了。个人野心，他觉得不好承认，实际上内战时期及抗战时期两次错误路线的总司令是他，虽然他并没有总书记、总司令的称号，名称只是什么委员等等，但那是没有关系的。实质是他企图按照他的面貌来改造党，这在内战时期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形态，在抗战时期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形态。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别的国家也发生过。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有这种思想，王明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讲完全一点是王明、博古^[2]路线，简单一点称王明路线也可以。抗战时期

[1] 指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自称代表国际路线，发言中根本否认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提出了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的错误意见没有能形成会议决议。

[2] 博古，即秦邦宪（1907—1946），江苏无锡人。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这期间，犯过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1941年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2月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谈判。4月8日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的错误路线，总司令就是王明，是他单人独枪担当的。立三路线的总司令是李立三，而不是向忠发，虽然向忠发是总书记。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王明路线在内战时期是“左”，在抗战时期是右，但它的阵容起了一些变化。王稼祥、洛甫^[1]在遵义会议就已觉悟了，六中全会后博古等也觉悟了，经过整风和路线学习，这些同志更觉悟了，而王明仍未觉悟。七大时，王明写过声明书，但两个月后他说那是被迫写的，想不承认。直到这次发言，他还未觉悟。他昨天发言的后半段说了些老实话，我们欢迎他这一点进步，看他以后怎样做。

党内曾经有些人想按照他们的口味来改造党，但没有达到目的；可是，要是他们达到了目的，那就坏了。这个问题的性质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其实，

[1] 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1931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领导红军继续长征。1937年11月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夏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政治部主任。1944年因伤病复发离职休养。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洛甫，即张闻天（1900—1976），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1931年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1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

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王明对党内“左”“中”“右”一齐打，打了“左”派（反立三路线）打“中”派（反周恩来、瞿秋白^[1]的“调和路线”^[2]），打了“中”派打“右”派，把老人打得差不多了。许多人讲篡党、篡军、篡政，是确有其事的，是从四中全会开始的，不是从五中全会^[3]开始的，一直到王明在共产国际，到他从苏联回国，到六中全会^[4]。六中全会，一滴酒精使微

[1]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主持中央工作。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30年9月同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党的中央领导之外。1935年2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6月18日在福建长汀就义。

[2] 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同年8月，周恩来、瞿秋白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派遣，从莫斯科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这样，就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但是会议认为李立三只是犯了“个别的策略上工作上组织上的错误”，表现了某些调和妥协的精神。这一点后来被王明等人上升为“调和主义”“调和路线”来反对。

[3] 指1934年1月中旬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4] 指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

生物缩小了。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来传达了所谓“国际路线”；一个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来也传达了国际路线，但他传达的和王明的“国际路线”不同。王稼祥带回来国际文件，成了一滴酒精，滴下去，微生物缩小了。经过整风，微生物更大为缩小了，破除了迷信。但是王明的头脑里，仍有微生物，还没有消毒。

我同意要王明写个东西。博古、洛甫等过去都写过的。写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定案，以后还有完全的自由，完全推翻或部分修改都可以，不是像过去那样强迫签字，定成铁案。是否要限制一点时间？我看要，像过去那样没有时间限制，恐怕不妥当。我看可限定一个月的时间，但这要王明自己说说意见。（王明说：一个月可以。）这中间搬往北平的时间不算进去。以后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凡属在党内犯了错误的，都要给他分配工作。不仅要欢迎他积极找我们谈，我们也要找他谈，向他做工作。我们党内有许多同志懂得要向傅作义^[1]做工作，要向民主人士做工作，但只要一个人一挂上共产党员的招牌，就不向他做工作了，这是不好的。对于有错误的同志，我们还是要做工作。

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代表会议制度

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代表会议制度。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代表会

[1] 傅作义，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1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议就是苏维埃。自然，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是俄国人民创造的，列宁加以发扬。在中国，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在人民中已经臭了，我们不采用它，而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制度。

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相配合的还有党的代表会议制度。这次二中全会，按其性质来说就是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不过，这种中央全会的形式更可以充分讨论问题，较之一两千人的大会解决问题更好些。

二中全会原稿

二中全会关于军旗的决议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旗，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中宣
加八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

十九、二十兵团按原计划集结^[1]

(1949年3月17日)

徐、罗：

(一) 同意仍按原计划十九兵团在榆次以西以南地区集结，二十兵团在太原东北东西黄水地区集结。

(二) 同意以瑞卿为太原军管会副主任。

军委

十七日二时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电报。

第四野战军主力应于四月一日前 完成出发准备^[1]

(1949年3月17日)

林、罗、刘：

(一) 华野中野两军决于四月十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个师举行攻击。(二) 东野^[2]所负攻击武汉及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军之任务业已确定，你们的两个军亦早于丑有出发，你们主力应于四月一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于四月一日至四月十五日的半个月內，全军出发完毕，争取于五月三十一日全军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完成兵力展开任务。请你们按此时间标准，规定全军出发准备工作及出发计划报告我们。(三) 关于行进路上粮草的准备及供应，你们应即与华北局及中原局协商确定，以免迟误。

军委

三月十七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东野，指东北野战军，1949年3月11日改称第四野战军。

林彪刘(一)野中野两军决於四月十五日及
 向着~~湖北~~湖南~~京~~鎮江上海之线及
 其次南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个师~~行政~~政攻。(二)
 东野所攻武汉及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军
 任务~~已~~确定你们的两个军亦早於~~四~~五月有
 出~~动~~你们主力应於四月一日前完成出发
 準備於四月一日至四月十五日的半月内~~出~~
~~动~~完畢於五月~~初~~全軍

到達南陽信陽~~固始~~之线及其以南
 地區完成兵力~~廣~~任~~務~~按此時
 間標準規~~定~~全軍出發準備工作~~及~~出發
 計畫報告我們~~軍~~三月十七日。

(三)關於~~在~~路上糧草
 的準備及~~應~~供應你們~~部~~
~~隊~~即與~~華~~北局
 及中原局協商確定以
 免~~差~~誤。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第四野战军主力应于四月一日前完成出发准备》的手稿。

待谈判接触数天后决定 是否攻占浦口浦镇^[1]

(1949年3月19日)

陈、饶、邓、粟、谭、张：

寅巧徐州电悉。(一) 是否攻占两浦^[2]，要待谈判接触数天才能决定。如谈判有成功希望，则不要攻占两浦，以利和平地解决接收南京问题。如谈判没有成功希望，则看军事上是否有必要攻占两浦。如攻占两浦为渡江作战所必须，则攻占之；如无此种必须，则可置之不理。(二) 决定四月一日为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并开始谈判之日期^[3]（此日期要待三月二十五日才公开宣布），大约在四月五日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和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两浦，指浦口、浦镇，均为镇名，位于江苏省南京市西北，长江北岸。

[3] 关于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举行和平谈判事宜，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26日决定：“（一）谈判开始时间：4月1日。（二）谈判地点：北平。（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4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加派聂荣臻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按照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以为双方谈判的基础。（四）将上列各项经广播电台即日通知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按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以利举行谈判。”

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你们大概可以在四月六日左右实行夺取北岸据点（不一定包括两浦）之作战，四月十日实行渡江。从四月一日起你们和我们的电台须昼夜密切联络，不使稍有间断。（三）除两浦是否攻占须看谈判情形及军事上是否必要才能决定外，不论谈判情形如何，对于攻占北岸据点及四月十日渡江均无妨碍。

军委

十九日二时

第四野战军先头两个军的任务^[1]

(1949年3月20日)

萧、陈、解、潘，刘、邓、李^[2]，并告林、罗、刘^[3]：

东野先头两个军的任务，是协同桐柏、江汉、鄂豫三军区力量钳制白崇禧^[4]部，使白部不能向东增援妨碍我中野、华野之渡江。因此决定：（一）萧陈解潘所部应即依照刘邓皓辰电^[5]改变部署，不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第一副司令员陈伯钧、参谋长解方和副参谋长潘朔端等的电报。

[2] 刘、邓、李，指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4]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指1949年3月19日辰时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和萧劲光、解方的电报。电报说，第四野战军两个军南下行程较预定时间为迟。在此情况下我们考虑：四野十二兵团如仍以一部出平汉路东侧，而以主力绕经枣阳、随县地区拉住桂系以掩护渡江军右侧背，这在时间与空间上都赶不及。为此，建议十二兵团应改以主力或一个军出平汉路东（并争取四月七日赶到宣化店、河口之线），以一部或一个军出西侧，如能运用郑南铁路运输一部兵力则较快。另以王宏坤指挥之桐柏、江汉部队先期以四野面目出现，以迷惑吸引白崇禧部为有利。

要绕道太远，而要直迫信阳，沿铁路分两路并行南下，直接威胁并打击白部，并力求迅速行进。（二）萧陈解潘受刘邓指挥，一切依刘邓意旨行动。

军委

二十日二时

复陈毅、谭震林电^[1]

(1949年3月20日)

我们不知道攻占两浦是否为渡江战斗所必要，请即查告。据我们想，似乎无此必要。如果无此必要，则除以一个兵团仍对两浦监视待命行动外，其他兵团可以提早于四月二日（南京代表到达北平之第二日）开始攻占北岸据点，至四月五日或六日完成此项任务。再以一周时间开辟港口并布置船只。如此，则全军可于四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开始渡江，这样对于谈判有利。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陈毅、谭震林建议推迟渡江作战时间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陈、谭电的主要内容。

致中原局电^[1]

(1949年3月21日)

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十六日到汉口，与白崇禧大约需有几天商量，约定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到驻马店，请你们迅即命令卢声涛科长速往驻马店迎候。刘仲容到时，立即派妥人陪同乘车经徐州、济南、天津至北平市政府叶剑英市长处，愈快愈好，不要去石家庄。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原局电的主要内容。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1]

(1949年3月23日)

【新华社石家庄二十三日电】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会议经过八天，业已圆满结束。全会到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缺席者二十人。毛泽东主席向全会作了工作报告。全会批准了一九四五年六月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全会并批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以为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在现在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指出：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到现在，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党在毛泽东同

[1]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在胡乔木起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新闻稿上，重新改写了第一段，加写了末段一节。中间文字亦有重要改动。24日，在排出的清样稿上，又做了少许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即为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新闻稿发表于1949年3月25日《人民日报》。

志的领导下团结了广大的劳动人民，执行了这个用乡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并且是完全成功的。但是，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从新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毫无疑问，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密切地联结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全会指出：我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领导城市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人民的斗争时，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一条战线上，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全会认为：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关键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第一是国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城市中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建设工作，工会工作和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治安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等，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个中心工作而服务。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用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并且发出警告说：如果我党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么，党和人民就将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要失败。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中国共产党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

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作为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共同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从而创造条件使中国有可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二中全会号召全党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确立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无原则的迁就主义的态度，又要反对妨碍党与党外民主人士团结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的态度。

鉴于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不久就要到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特别警戒全党同志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被人们的无原则的捧场所软化。全会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工作的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以便在打倒反革命势力之后，用更大的努力来建设一个新中国。全会认为：中国的经济遗产虽然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毛泽东
七月二日
七月二日
七月二日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日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曾长期地同国民党合作，共同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背叛了合作，发动了内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人，当家作主的日子。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面临着两个主要的任务：一个是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另一个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任务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只有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才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最终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安康。

为了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安康，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必须继承和发展党的优良传统，增强党的团结，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积极争取外援，学习外国的一切长处，补充我国建设事业的不足。我们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安康而努力奋斗。

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的手稿。

嘉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1]官兵

(1949年3月24日)

邓兆祥舰长，并转全体官兵：

热烈庆祝你们的英勇的起义。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但是这只能增加你们的起义的光辉，只能增加全中国爱国人民、爱国的海军人员和国民党陆军、空军人员的爱国分子的愤恨，使他们更加明了你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唯一道路。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者已经日暮途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祝你们努力！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1] 重庆号巡洋舰是国民党海军中最大的一艘巡洋舰。1949年2月25日，该舰官兵在上海吴淞口起义，加入中国人民海军。同年3月19日该舰被国民党空军炸沉于葫芦岛附近。



1949年，从硝烟中走向和平的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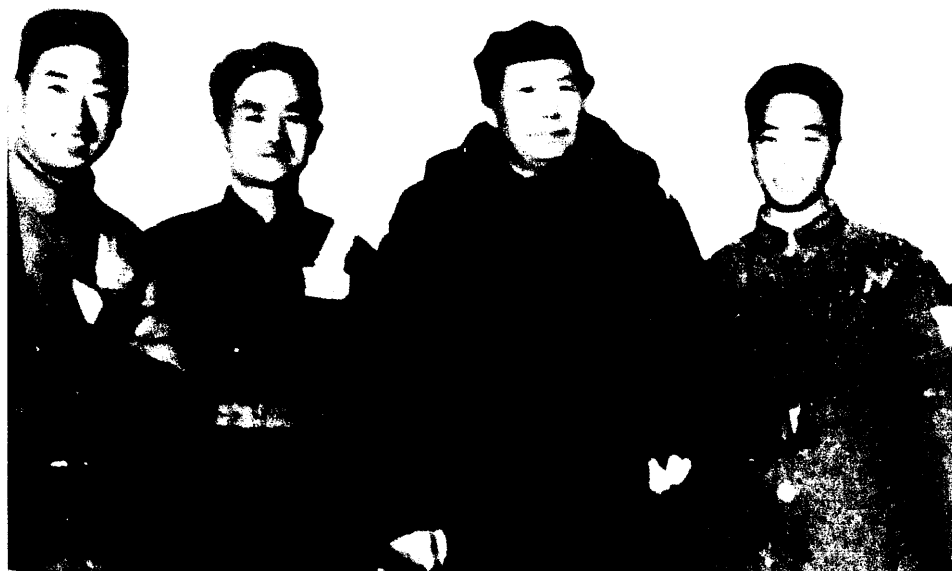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到达北平。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达北平西苑机场，受到社会各界代表的欢迎。图为毛泽东和叶剑英在西苑机场。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叶剑英在西苑机场。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到达北平时和徐肖冰、刘德源、石益合影。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前来迎接的民主党派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民主党派人士在西苑机场。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前来迎接的人民团体代表亲切握手。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民主党派人士在西苑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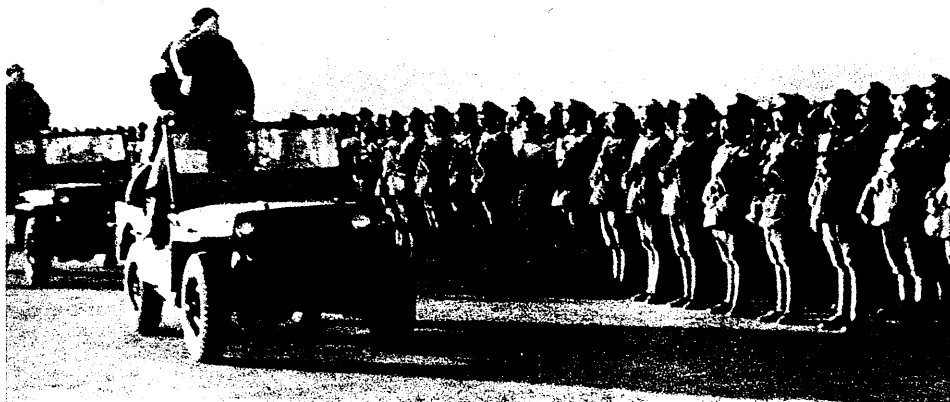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前来迎接的人民团体代表亲切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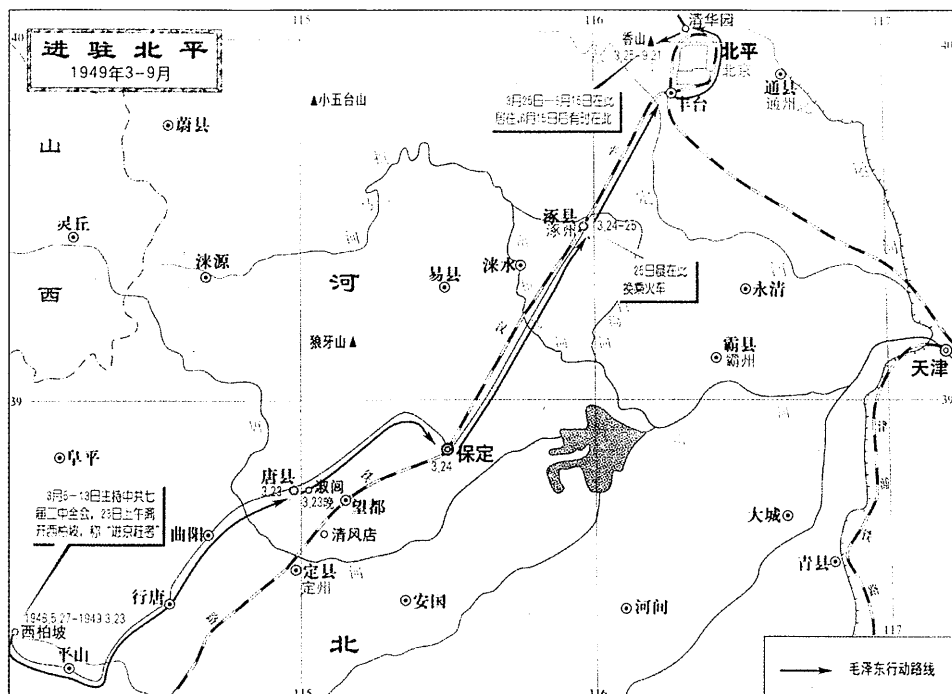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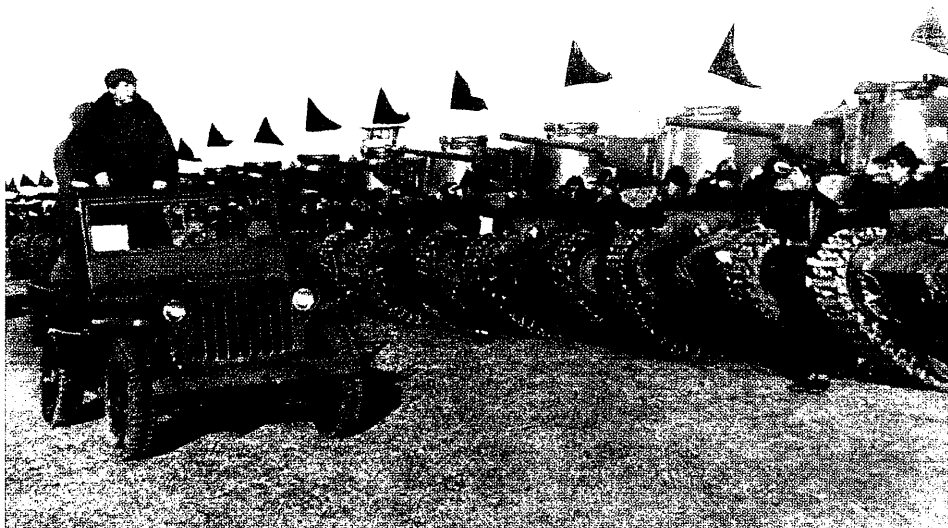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从西柏坡进驻北平路线图。



《人民力量的检阅》(油画)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检阅人民解放军装甲部队。



《东方破晓》（油画）

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电^[1]

(1949年3月27日)

宥申电悉。同意你们十五日发起渡江战斗及对北岸敌人的处置。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电的主要内容。

致林彪、罗荣桓电^[1]

(1949年3月28日)

为统一称号起见，你们的军委分会改称为前委（其全称为第四野战军前线委员会）。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1]

(1949年3月28日)

同意你们主力于四月十一日开始出动，但须争取于五月三十一日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于六月三十日以前到达沿江北岸并相机攻占汉口、汉阳及江北各敌人据点，完成渡江准备任务，待命于七月上旬渡江。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电^[1]

(1949年3月29日)

同意你们推迟至四月十五日渡江。已定四月一日为我们和国民党开始谈判时间，四月十日左右结束，谈判成败要到那时才能清楚。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9年3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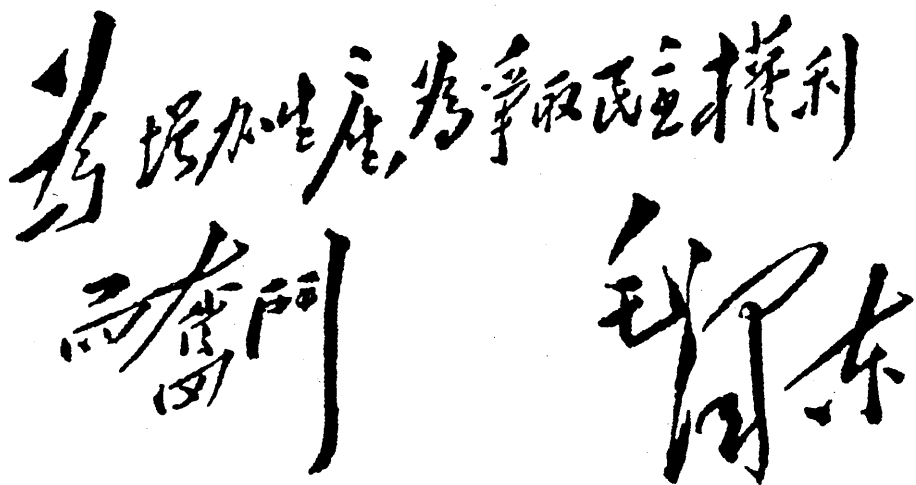
(一) 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今日到北平,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李、白对此计划已有初步认识,尚待我们深入工作。(二) 决定要白让出花园以北地区,我军到信阳、武胜关附近时,如守敌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让其退至花园及其以南,孝感、黄陂、黄安、阳逻、黄冈等地亦暂时不要去占,待东北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三) 麻城、浠水、黄梅、广济、太湖、安庆等处敌军分布情形如何,请刘、陈、邓即查告。这些地方的敌军一般应坚决歼灭之,扫清渡江障碍。惟麻城、浠水两处之敌,如不妨碍陈赓的进路,亦可以暂置不打,待后交涉要白让出。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及萧劲光、陈伯钧电的主要内容。

为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题词^[1]

(1949年3月)

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奋斗。



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
而奋斗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题词。

[1]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毛泽东接见了全体代表，并为大会题词。



1949年3月，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图为大会会场。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复傅作义^[1]电

(1949年4月2日)

傅作义将军：

四月一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

[1] 傅作义，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1月21日与人民解放军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率部接受和平改编。1949年4月1日，傅作义通电全国，表明自己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立场。

葉飛將軍：

~~✖~~

四月一日直電讀悉。南京剛說及到政府曾
 動及韓人戰的政策，這錯誤的。幾年來中國人民
 想這種反動政策，所以受災。這政府必須負責。
 想這政策，所以受災。這政府必須負責。
 只有事實表視，因而有利於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
 有利和平。這政府必須負責。不利何人，我
 們均表歡迎。~~包圍南京~~北平
 的和平解決，貴州軍事有勞績。發展於後
 站在人民方面，~~發展於後~~的建設事業。我們願
 意這政府的政策，是歡迎的。

毛澤東

九月九日四時

毛泽东复傅作义电的手稿。

致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电^[1]

(1949年4月2日)

南京代表团本日到北平，提到李、白意见，要求我军勿攻安庆，驻安庆桂军可以撤退等语。我们认为不要攻安庆，让安庆守军向武汉撤退，如何？速告。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的主要内容。2日，刘伯承、张际春复电表示：“我们确定不攻安庆，最好让该城守军提早撤退，更利于渡江作战。”

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1]

(1949年4月3日)

美、加、英、法、挪、丹、冰、荷、比、卢、葡、意等国政府将于四月四日签订的北大西洋公约，是一个以挑动新的世界侵略战争为目的的危害人类和平安全的条约。鉴于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东西各民族人民安危与共，并且事实上英美等国政府也正在力图将北大西洋公约的模式扩张到太平洋方面来，中国各民主党派，特对北大西洋公约及其他任何类似的侵略方案，表示坚决的反对。

中国各民主党派谴责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及其附庸背叛波茨坦协定和其他保障国际和平的协定、背叛联合国组织、背叛各国人民和平愿望的侵略政策。中国各民主党派对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势力反对新战争危险的奋斗，表示热烈的同情和忠诚的拥护。中国各民主党派坚信，这种奋斗将使策动战争的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们受到全世界和平人民的责备而陷于孤立，将使新的世界侵略战争的阴谋陷于破产。我们认为世界是人民的，不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的横行与猖獗，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连同他们本身在内，均将被人民所揭露，所抛弃。

中国各民主党派同时代表伟大的中国人民郑重宣告：如果帝国

[1] 这是毛泽东及中国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等联合发表的声明。

主义侵略集团竟敢挑动这个危害全世界人民的反动的战争，那么我们将团结全国人民，遵守孙中山先生的不朽遗嘱，采用必要的方法，与中国的盟友苏联和各国和平民主势力，携手并进，向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作坚决的斗争，打败侵略者，推翻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永久的和平。我们认为，如果战争爆发，帝国主义的诸侵略国一定是失败者，反帝国主义的诸被侵略国一定是胜利者。这个前途，已经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向全世界人民指明出来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 李济深

中国民主同盟负责常务委员 沈钧儒

章伯钧

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 黄炎培

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 马叙伦

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常委 谭平山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彭泽民

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 李章达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主席 蔡廷锴

中国致公党主席 陈其尤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

同意太原作战方案^[1]

(1949年4月3日)

徐、周、罗：

(一) 同意寅陷电所述太原作战方案^[2]。(二) 同时请你们注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如有接洽机会应利用之。

军委
卯江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和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电报。

[2] 为统一领导太原前线各项工作，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治委员组成太原前线司令部。1949年3月30日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总前委讨论太原作战方案，报告如下：第一步打外围据点，争取消灭敌人六至八个师，占领攻城有利阵地。第二步攻城，其具体部署：1. 以二十兵团一个军，由城东北突破丈子头，迅速西进，占领新城以南之北飞机场；另一个军主力（两个师）及西北第七军之一一个师，由兰村沿汾河西岸向南攻击，直插北机场以西之汾河铁桥，配合由丈子头西进之军，切断北机场以北之敌而歼灭之；另由西北第七军以一个师配合二十兵团，同时攻占牛驼村（城东北），继向北黄家坟敌进攻，并钳制该敌。2. 十九兵团以

一个军及晋中部队三个旅，由城西南汾河西攻击南屯义井，继向大小王村、大窰、南社村（均在城西）进击，控制该地区，配合二十兵团由汾河南进之军切断河西之敌而歼灭之；另十九兵团又一个军，攻击城西南汾河东之杨家堡、债老、军营、大营盘、狭村之敌；另十八兵团以一个师同时由山头向南攻击马庄与双塔寺间之阎家坟，配合十九兵团攻占狭村之军，切断双塔寺与大营盘以南之敌而歼灭之。3. 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之主力第一步暂不攻击，而以佯动配合南、北、西等区作战；待以上地区攻击得手和被切断之敌基本被消灭时，即以十八兵团及第七军由城东大东门方向，十九兵团由城南首义门方向，二十兵团由城北工厂区三面攻城，晋中部队留河西配合攻城。攻击时间定于4月15日开始，争取半个月攻下太原城，但仍作一个月之作战准备。以上方案彭总已同意。当否？请军委指示。”

对桂系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 采取具体步骤^[1]

(1949年4月4日)

萧、陈、唐、解、潘，并刘、李、张，中原局，邓、饶、陈^[2]：

(一) 我们已和白崇禧^[3]代表刘仲容^[4]商定，黄冈、阳逻、仓子埠^[5]、黄陂、花园^[6]、孝感、汉川、蔡甸^[7]、黄陵矶^[8]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大商巨绅不致逃跑，将来我军进占该线及武汉地区时用和平接收办法，免遭破坏。此点望萧陈通知所属，望中原局通知桐柏江汉鄂豫三区一体照办。其余宜昌至武穴线上长江北岸要地，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第一副司令员陈伯钧、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和副参谋长潘朔端等的电报。

[2]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陈，指陈毅，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4] 刘仲容，当时是李宗仁、白崇禧派往北平的私人代表。

[5] 仓子埠，今仓埠镇，位于湖北新洲县西部。

[6] 花园，镇名，位于湖北孝感市北部。

[7] 蔡甸，镇名，位于湖北汉阳县北部。

[8] 黄陵矶，镇名，今为湖北汉阳县县治。

进占，以利和平接收。萧陈并可设法与花园方面白部负责人作试探性的联络，并以情况电告。（二）李宗仁^[1]代表黄启汉^[2]昨江日由北平返南京，除传达上项意旨外，并传达我方允许安庆方面桂军向南京或向武汉撤退。请刘李张即作准其撤退之部署，并令前线派人与守军试行联络。（三）总之，我方对桂系即应根据联桂反蒋^[3]方针开始着手采取具体步骤，由敌对关系改变为交朋友关系，对张軫^[4]亦是如此。执行情形望告。

军委
卯支

[1] 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

[2] 黄启汉，当时是李宗仁派往北平的私人代表。

[3] 蒋，指蒋介石。

[4] 张軫，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1949年4月4日)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在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1]中，存在着三部分人。一部分人坚持地走第一条路。无论他们在口头上怎样说得好听，在行动上他们是继续备战，继续卖国，继续压迫和屠杀要求真和平的人民。他们是蒋介石的死党。一部分人愿意走第二条路，但是他们还不能作出有决定性的行动。第三部分是一些徘徊歧路、动向不明的人们。他们既不想得罪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又想得到人民民主阵营的谅解和容纳。但这是幻想，是不可能的。

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基本上是第一部分人和第三部分人的混合物，第二部分人为数甚少。这个政府到今天为止，仍然是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工具。

四月一日发生于南京的惨案，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这是李宗

[1] 1949年3月12日，李宗仁在孙科辞职后，任命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长。

仁何应钦政府保护蒋介石、保护蒋介石死党、保护美国侵略势力的必然结果。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和蒋介石死党一同荒谬地鼓吹所谓“平等的光荣的和平”，借以抵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特别是抵抗惩办战争罪犯的结果。李宗仁何应钦政府既然派出和谈代表团前来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以为谈判的基础，那末，如果这个政府是有最低限度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庆父不死，鲁难未已^[1]。战犯不除，国无宁日。这个真理，难道现在还不明白吗？

我们愿意正告南京政府：如果你们没有能力办这件事，那末，你们也应协助即将渡江南进的人民解放军去办这件事。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签一个协定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功自赎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者不利。不签这个协定，情况也差不多，可以用局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可

[1] 事见《左传·闵公元年》。庆父是春秋时鲁国的公子，曾经一再制造鲁国的内乱，先后杀死两个国君。当时的人有“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说法。后人常常把制造内乱的人比之为庆父。

能还有些战斗，但是不会有很多的战斗了。从新疆到台湾这样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国民党只有一百一十万左右作战部队了，没有很多的仗可打了。无论签订一个全面性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而签许多局部性的协定也好，对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死党，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一句话，对于一切至死不变的反动派，情况都是一样的，他们将决定地要灭亡。也许签订一个全面性协定对于南京方面和我们方面，都比较不签这个协定，来得稍微有利一些，所以我们还是争取签订这个协定。但是签订这个全面性协定，我们须得准备应付许多拖泥带水的事情。不签这个协定而去签订许多局部协定，对于我们要爽快得多。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准备签订这个协定。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如果也愿意这样做，那末，就得在这几天下决心，一切幻想和一切空话都应当抛弃了。我们并不强迫你们下这个决心。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进入北平的居住地。



1949年，毛泽东、朱德在香山双清别墅。

应即派人进城接洽和平解决太原问题^[1]

(1949年4月5日)

彭、徐、周、罗：

阎锡山^[2]已离太原，李宗仁^[3]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我们已告李宗仁代表（本日由平去宁^[4]），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许其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部队出城两星期至三星期后开始改编等语。你们应即派人进城，试行接洽，求得于十五日前谈妥。进行情形望告。

军委
卯微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当时正在太原前线的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电报。

[2]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3] 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

[4] 指李宗仁派往北平的私人代表刘仲容于4月5日由北平返宁（南京）。

关于如何对待桂系部队的问题^[1]

(1949年4月5日)

邓、饶、陈，刘、张、李，中原局，萧、陈^[2]，并告林、罗、刘^[3]：

(一) 李白^[4]代表刘仲华^[5]江日由北平到南京，支日去汉口向李白传达我方意旨。微日李白另一代表刘仲容^[6]去南京传达我方更加完全的意旨。张治中^[7]等六人和谈代表团与我方代表团谈判已四日，颇有进展。(二) 安庆守军限卯灰前撤退，安庆至黄冈线之守军亦限卯灰前撤退完毕，请刘张李即告前线我军将领，将上述二项分别派员径赴守军司令部通知对方，我们的人和对方的人见面时说，奉毛主席命令已与李白代表谈好守军撤退事宜，今后双方以谈判方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等的电报。

[2] 萧、陈，指萧劲光、陈伯钧，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一副司令员。

[3]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4] 李，指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5] 刘仲华，当时是李宗仁、白崇禧派往北平的私人代表。

[6] 刘仲容，当时是李宗仁、白崇禧派往北平的私人代表。

[7] 张治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率代表团到北平和中共代表团进行谈判。

法解决问题，问彼方是否已接到上级命令，如未接到此项命令，要求彼方速即去电询问，不能拖延时间。此项代表交谈，限于桂系人员，勿令蒋系人员知道。（三）黄安^[1]、麻城、浠水、武穴等地彼方守军同样撤退，由我军进驻。（四）黄冈、团风^[2]（不是阳逻^[3]）、仓子埠^[4]、黄陂、花园^[5]、孝感、汉川、蔡甸^[6]、黄陵矶^[7]一线及其以南地区，一个月内我军不去进占。宜昌至黄陵矶一线江岸及其以北地区，凡我军已占者一律不动；凡我军未占者一律于一个月内暂不进占，一个月后用谈判方法和平接收。此点请刘张李通知桐柏江汉鄂豫三军区照办。萧陈对桂系守军可酌派适当人员联络，但切勿使蒋系守军知道。对张轸^[8]亦可联络。（五）中原局应设法派人秘密至武汉方面与地方绅士及资本家联络，散布和平空气，稳定他们不要逃跑。华东局对江南各地如有门路，亦应如此办理。

军委

卯微

[1] 黄安，旧县名，即今湖北省红安县。

[2] 团风，镇名，位于湖北省黄冈县西北。

[3] 阳逻，镇名，位于湖北省新洲县西南。

[4] 仓子埠，今仓埠镇，位于湖北省新洲县西部。

[5] 花园，镇名，位于湖北省孝感市北部。

[6] 蔡甸，镇名，位于湖北省汉阳县北部。

[7] 黄陵矶，镇名，今为湖北省汉阳县县治。

[8] 张轸，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官。

给周恩来的信^[1]

(1949年4月5日)

陈赓兵团四月五日由麻城出发，经浠水、广济、黄梅，向宿松、望江前进，限四月十五日以前到达。请再告刘仲容不要忘记到南京后，叫李宗仁速即告白崇禧，将上述各地及安庆守军火速撤退，愈快愈好，至迟不得超过四月十日，否则守军将被歼灭。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信的主要内容。

复白崇禧电^[1]

(1949年4月5日)

(一) 支电敬悉。(二) 刘仲容先生本日由平飞南京，并转汉口，向李、白二先生转达敝方各项意见。(三) 我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谋部部长)，因为贵方代表不在，而许多事项又需及时通知贵方，以利合作，奉毛主席命直接和先生通讯，倘荷同意，深以为幸。(四) 支电所述立场系就贵方利益而言，但就人民利益而言，在贵方全部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并经双方协力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这些条件的时间内，要求人民解放军停止前进是不合理的，因此是不可能的。白先生历次公开言论，我们均不能同意。(五) 但是为着和李、白二先生建立合作关系之目的，敝方愿意立即实行下列各项处置：(甲) 安庆及其以西直至黄冈(不含)之贵方部队，请迅即撤退，并限四月十日以前撤退完毕。(乙) 黄冈、团风、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包括汉口在内，暂由贵部驻防，维持秩序。该线以北以东各地之贵部，望即向该线撤退。所有撤防各地，不得破坏。该线以西各地，暂维现状。(丙) 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听候双方代表团谈判解决。(丁) 请通知安庆及花园等处贵部负责人员，如遇敝方前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起草的给白崇禧的复电。

线将领派员出来联络，请予接洽，勿生误会。并希各该贵部派员至
敝军前线司令部取联络。(戊)以上各点敝方业已通知各该地军事首
长遵办，希望白先生亦通知贵部照办，并盼见复。

注意吸收自由资产阶级代表参加工作

(1949年4月7日)

邓、饶、陈^[1]：

(一) 长江水势一个月内（四月上旬至五月上旬）是否会有很大的变动，请即查告。

(二) 上海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纲伯、施复亮等已到北平，表示向我们靠拢。他们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认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这件事，你们现在就应开始注意。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如果允许他们参加工作，采取何种方式为宜，设立某种咨询机关例如参议会之类是否适宜，请考虑答复。

(三) 不但上海如此，整个京沪杭区域都应注意此点。

[1]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 黄炎培给陈毅同志的电报^[1]应给以回答。

中央
卯虞

鄧鏡波：長江水勢一個月內（四月初至五月上旬）是否會有很大的變動請即查告。（二）上海民主建國會主要負責人黃炎培章乃器戚本禹章三穆涇州施復亮茅凹劉北平表示對新民主主義建國前途極其樂觀他們是上海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我們認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沒有自由資產階級的幫助可能發生很大的困難很艱難對付獨裁專制及國民政府的強大的聯合努力很難使這些敵對勢力交於孤立這件事情你們現在該

應開始注意因此請你們考慮（三）~~在自由黨~~是否有必要在沒有佔領上海以前即吸收他們參加某些工作而在佔領上海以後則吸引更多的這類人物參加工作。如果允許他們參加工作採取何種方式為宜設立某種諮詢機關例如參事會議之數是否適宜請考慮答覆（三）不但上海如此整個京滬杭區域都應注意此等問題黃炎培給陳毅同志的電報應給以回答。
中央卯虞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注意吸收自由资产阶级代表参加工作》的手稿。

[1] 指黄炎培1949年3月28日给陈毅的电报，其中说：“弟今已抵平，特向兄遥致敬意，握手欢迎，为期不远，珍重珍重。”

为李宗仁电报写的按语

(1949年4月)

李宗仁此电尚有许多阿Q语调，对于自己吹擂，颇饶兴趣，所谓“国共合作”毫无界限，尤使人们感到心头有些作逆，但是在根本上说来，李宗仁在全国人民的督促之下，似乎增长了某些希望和平成功的诚意。是否如此，且看将来。

复李宗仁^[1]电

(1949年4月8日)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

卯阳电^[2]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1] 李宗仁，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辞去总统职务后任代总统。

[2] 指李宗仁1949年4月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李宗仁在电报中称：自“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在日益诡谲的世界风云下，“国共合作，尤为迫切”，“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1949年4月10日)

一、兹制定铁路军运暂行条例，自即日起公布施行。

二、凡属人民解放军所属之野战军及各级军区机关部队及本委员会铁道部所属之铁路总局、铁路管理局、车站必须切实执行本条例，不得违反。

三、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各军事机关，各铁路局以前颁布之军运条例及办法，凡与本条例抵触者一律作废。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十日

致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电^[1]

(1949年4月10日)

顷接白崇禧方面来电称：“关于安庆撤退事，暂有困难。因自该地发生战事以来，国防部曾令坚守待援，该地辖京沪区指挥，敝方不便擅令守军撤退。拟请贵方允许，暂留该地勿攻，敝方亦不出击，以待和谈解决。”

安庆既属国防部管辖，白崇禧自不便令撤，请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以待和谈解决。如安庆畏我派人接洽动摇其军心，你们亦不必派人去联络，彼此暂维现状为要。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总前委电的主要内容。

致总前委等电^[1]

(1949年4月10日)

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2]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况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总前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电的主要内容。

[2] 卯删，即4月15日。

攻击太原时间推迟至二十二日^[1]

(1949年4月11日)

徐、周、罗，并告彭^[2]：

(一) 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进行了十一天，颇有进展。如南京方面同意，可能于十五日或十六日签字，但破裂的可能仍然存在。(二) 请将攻击太原的时间推迟至二十二日。那时，如能签订和平协定，则太原即可用和平方法解决；如和谈破裂或签订后反悔不执行，则用战斗方法解决，对我亦无多大损失。

军委

十一日十八时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和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电报。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徐周罗，並告彭：我们和南京的谈判已进行了
十天頗有进展知南京方面同意可能於十五日或
十六日签字但破裂的可能仍然存在。如和谈
~~签订和平协定则太原问题可一起解决~~ (二) 請將
攻击太原的时间推迟至廿二日 那时如能签订和
平协定则太原即可用和平方法解决 (三) 如和谈
如和谈破裂或签订後反悔不执行则用我平方
法解决 (对我亦) 亦
军委十日十八时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攻击太原时间推迟至二十二日》的手稿。

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题词^[1]

(1949年4月11日)

同各界青年一起，领导他们加强学习，发展生产。

毛泽东

[1] 1949年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毛泽东为大会写的题词。

同志青年
继承传统
加强学习
发展生产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题词。



1949年4月，毛泽东在北平香山接见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1949年4月，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49年4月，毛泽东和出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一起。

复总前委等电^[1]

(1949年4月11日)

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9年4月13日)

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十三）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十三日至十七日，共五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的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向张治中表示，四月十七日必须决定问题。十八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十四日上午去，十五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四要员（李、于、居、童^[2]，不要张群^[3]）如愿来平，十五日至迟十六日必须到达，十七日必须举行签字式。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何、白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签，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邵、章^[4]三代表及四个顾问^[5]留在北平。今天晚上应举行各党派代表人物（十人）的会议一次。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国共代表团和平谈判进入正式阶段问题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李、于、居、童，指李宗仁、于右任、居正、童冠贤。

[3] 张群，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

[4] 张、邵、章，指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

[5] 指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的顾问屈武、刘仲华、李俊龙、金山。

关于我军渡江时间的考虑

(1949年4月14日)

总前委，并告二野、三野：

(一) 总前委卯文指示电^[1]甚好。请二野、三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

(二) 渡江时间仍按四月二十二日（卯养）实施，不要改变。但有可能再推迟几天，即推迟至四月二十五日（卯有），至迟四月二十七日（卯感）。是否如此，要待四月十八日左右才能确定。

(三) 昨（十三）日起谈判已至正式阶段，我方协定草案已交张治中代表团，并由双方代表团开了一次正式会议。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惟南京李、何、白、顾^[2]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此种干涉现已加紧）愿意接受，则

[1] 指总前委1949年4月12日关于推迟一周渡江诸问题给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各兵团党委的指示电。电报指出：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所以必须向师以上干部说明推迟渡江的理由及应做的各项准备工作。

[2] 李，指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何，指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顾，指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

尚无把握。我们现要李、何、于右任、居正、童冠贤^[1]等五人来北平共商。如彼等不来，则由张治中派人回南京征求意见。如南京根本拒绝不愿签字，则争取张治中代表团签字，然后由我军渡江，威迫南京批准。如南京因受美、蒋胁迫不敢批准，并逃往桂林，则将协定公布，号召一切国民党主和派分子（单南京立法院即有一百多个立法委员认为无论如何要和，并谓非共军渡江不能解决问题）拥护协定的执行。万一连张治中也不敢签字，则其曲在彼，我方可将协定草案公布，争取人民及国民党中主和分子及爱国分子的同情，对我军南进，甚为有利。而我军损失，不过推迟七天或十天至多十二天（卯感）的时间。

（四）漱石^[2]已到，此间情形他会经常通知总前委。刘晓^[3]亦到。饶、刘正与上海产业界民主人士共商上海经济问题，并研究平、津两市经验，待你们开始渡江时即返部。

军委
卯寒

[1]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居正（1876—1951），湖北广济（今武穴）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童冠贤（1894—1981），河北宣化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2]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3] 刘晓（1908—1988），湖南辰溪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准备攻占安庆至南通一线北岸敌人据点^[1]

(1949年4月14日)

总前委，粟、张，刘、张、李^[2]：

(一) 为着准备渡江的直接行动，为着给南京一个打击，促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起见，请你们准备于卯胥（四月二十日）攻占从安庆至南通一线除安庆及两浦（浦口、浦镇^[3]）两点以外的，一切你们所需要攻占的北岸（不是南岸）敌人据点及江心洲（包括扬中县）。接电后请速即部署，以便于卯胥一举攻占。而在卯胥以前则保持平静，一声不响。（二）请将除安庆、两浦以外一切北岸据点及中心据点的敌军兵力位置电告。

军委

十四日十三时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张震等的电报。

[2] 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3] 浦口、浦镇，均为镇名，位于江苏南京市西北、长江北岸。

發 華東, 粟裕, 中告。
 發後即退: AAAAC
 編案 吳印0389
 附註 印發 湖朱住 濶閱
 內容 告一軍攻佔子, 商一戰指吳

總前委, 粟裕, 劉傳志。為着準備渡江的直接行動, 為着給南京一個打擊, 俾使他們接受我們的條件起見, 請你們準備於卯午(10月14日)攻佔淳安, 慶至南通通一線除崇慶及兩浦(浦口, 浦鎮), 兩浦以外的一切你們所需要攻佔的北岸(不是南岸)的敵人據點及江心洲(包括揚中縣)。接電後請速即部署, 以便於卯午一舉攻佔。 (印發) 而在

卯午以前則保持平靜, 一聲不響。(一) 請將除崇慶兩浦以外一切北岸據點及中心(印發)據點的敵軍兵力(印發)位置電告。
 軍委 (印發) 十四日十三時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渡江战役总前委等电的手稿。

致总前委等电^[1]

(1949年4月15日)

(一) 和平谈判决以四月二十日(卯时)为限期,本(十五)日即向南京代表团宣布,彼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二) 和平协定草案最后修正稿本(十五)日交付南京代表团,彼方明(十六)日派黄绍竑飞宁请示,南京是否愿意签字尚难预料,有可能拒绝签字。(三) 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二十日(卯时)确实攻占除安庆、两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据点。勿误为要。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复粟裕、张震等电^[1]

(1949年4月15日)

为着充分准备二十二日大举渡江，同意你们迅即攻占永安州，其他各北岸及江心据点亦可早日攻占，不必等到二十号。请总委通知谭震林。

[1] 4月15日粟裕、张震电告中央军委：敌人正沿江加强工事，如二十日同时攻占桥头堡，包括扬中县，则二十军必需提前4天攻占永安州，才便于船只入江。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致总前委等电^[1]

(1949年4月16日)

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昨(十五)夜提交张治中代表团,今(十六)日上午黄绍竑飞南京请示。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胥^[2]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愿意于卯胥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三天,即由卯养改至卯有(二十五)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你们作此种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汤恩伯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种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请求。只有你们认为推迟至卯有(二十五日)实行战斗渡江并无妨碍,我方准备允许南京的请求。如何?请考虑电复。并将近日渡江准备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全军渡江等项见告为盼。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2] 卯胥,即4月20日。

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 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

(1949年4月16日)

总前委，粟、张，刘、张、李^[1]：

(一) 总前委删辰电^[2]悉。

(二) 对敌北岸及江心据点，凡能于一夜夺取又利于夺取后第二夜即南渡者，则于渡江前一夜夺取之；凡不能于一夜夺取，又于夺取后需要较多时间做准备工作方利于南渡者，则应提前夺取之，望按实情处理。

(三) 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昨（十五）夜提交张治中代表团，

[1] 粟张，指粟裕、张震，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张，指张际春（1900—1968），湖南宜章人，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指李达，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

[2] 指总前委1949年4月15日辰时给中共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张震、谭震林的电报。电报说：我们意见争取在谈判上有政治收获，即令军事方面稍有不便，亦是值得的。故主张4月20日行动，对江北岸和江中敌据点，凡能一夜夺取者，则一夜夺取之，不能一夜夺取者，应留置之，用二三天时间夺取。今后军事行动，以在开动后能持续进行为更有利。

今（十六）日上午黄绍竑^[1]飞南京请示。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胥^[2]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

（四）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

（五）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愿意于卯胥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三天，即由卯养改至卯有（二十五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你们作此种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汤恩伯^[3]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种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请求。只有你们认为推迟至卯有（二十五日）实行战斗渡江并无妨碍，我们方准备允许南京的请求。如何，请考虑电复。并将近日渡江准备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全军渡江等项见告为盼。

军委

十六日八时

[1] 黄绍竑，当时是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

[2] 卯胥，即4月20日。

[3] 汤恩伯（1900—1954），浙江武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乙附
 發 董 錫 圭 錫 圭 錫 圭
 總前委 梁 彭 劉 李 (一) 派 委 刪 長 德 惠 (二)
 對 敵 北 京 及 江 心 德 點 凡 能 於 北 奪 取 又 利 於 奪 取
 後 第 二 意 即 割 渡 此 則 於 渡 江 前 一 意 奪 取 之
 凡 不 能 於 一 意 奪 取 又 於 奪 取 後 需 較 多 時 間 做 準
 備 工 作 方 能 割 於 割 渡 此 則 意 即 從 前 奪 取 之
 望 按 實 情 稟 理 (三) 和 平 協 定 最 後 方 案 已 於 昨 (廿
) 夜 程 由 北 京 代 表 團 今 (廿) 日 上 午 乘 錫 錫 飛
 南 京 請 示 南 京 呈 報 向 德 簽 字 將 取 決 美 國
 政 府 及 荷 荷 不 能 的 性 質 如 果 他 們 察 意

則 祇 能 簽 字 否 則 沒 判 將 破 裂 (四) 你 們
 的 立 脚 點 應 放 在 談 判 破 裂 用 戰 斗 方 法
 渡 江 上 面 並 保 證 於 廿 二 日 (即 舊) 一 舉 渡 江
 成 功 (五) 現 請 你 們 考 慮 共 即 假 如 南 京 願 意
 於 即 簽 字 但 梁 求 大 簽 字 後 他 們 以 幾 天 時 間
 以 使 割 著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我 軍 是 否
 可 能 抵 達 三 天 後 即 由 即 簽 改 至 即 有 (廿 五)
 再 渡 江 這 種 假 設 是 否 於 我 軍 士 氣 及 渡
 江 任 務 之 完 成 上 有 生 傷 害 你 們 作 此 種 考
 慮 時 仍 在 假 定 南 京 願 意 簽 字 但
 湯 恩 伯 等 及 動 手 後 仍 不 敢 執 行 我 軍 仍 需
 戰 斗 方 法 渡 江 在 此 種 假 設 上 如 果 你 們 認 為
 用 方 法

不 再 推 遲 則 我 們 將 拒 絕 南 京 的 請 求
 即 行 執 行 至 即 有 (廿 五) 實 行 戰 斗 渡 江 並 無 妨
 礙 我 們 方 準 備 允 許 南 京 的 請 求 如 何
 請 考 慮 電 覆 劉 李 季 廿 六 日 八 時

並 請 近 日 渡 江 準 備 情 形
 渡 江 把 握 程 度 及 需 要 多 少
 時 間 廿 八 日 前 完 成 全 軍 渡 江 等
 項 現 告 為 盼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渡江战役总前委等电的手稿。

可在任何有利时间攻打太原^[1]

(1949年4月17日)

徐、周、罗：

四月十四日电^[2]悉。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

军委

十七日二时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和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电报。

[2] 1949年4月14日，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致电军委，电文如下：“1. 自赵承绶、曹近合与赵恭所派之杜某会面后，敌方并无回音，而封锁更严，我们再送信入城，亦不能进去。现据内线关系出来谈，敌方宣传北平国共和谈已得协议，汉口、京沪国共双方共管，太原敌军由孙楚率领开西安（由我方让出一条路），西北实业公司则有准备交代之说。又今日敌太原广播，其社论仍宣传其坚强意志，奋斗到底之方针。近日调整其部队，加强战备中。2. 我炮兵增加，均已进入阵地，侦察及各种准备工作已完成，仓库区敌仍固守阵地（城东）。我军作成六条坑道，其中有一条已为敌挖通破坏，估计敌可能发觉，现我正在设法防范。按目前条件，争取在外围切断歼敌几个师，而乘胜攻城，把握是较大的。3. 太原之敌，在我围歼外围敌几个师以后，则可能容易就范。如十六日南京谈判无大效果，可否提前攻击太原，时间如何？请示。”



1949年，毛泽东在北平。

必须争取渡江一举成功^[1]

(1949年4月17日)

总前委，并告粟、张，刘、张、李^[2]：

删戌电^[3]悉。谈判至十五日（卯删）已告一段落。十六日至二十日（卯胥）是给南京考虑决策时间。在此时间内，我军应将一切必须攻占的北岸及江心敌据点全部攻占。二十日以后我军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我们铣辰电^[4]问你们是否可以由二十二日渡江改为二十五日渡江，是假定南京同意签字，并且假定二十日确实签了字而要求我方给以几天部署时间而说的，并非一定要改至二十五日。南京是否同意于二十日签字，决定于美国及蒋介石的态度，因此把握不大。南京方面认为我军渡江有很大困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总前委的电报。

[2] 粟、张，指粟裕、张震，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3] 指1949年4月15日戌时总前委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南京至安庆段各点，除金河口、小黄洲、江心洲等因守敌兵力集中，须费时三天以上才能夺取外，其余均可于4月20日一夜或二天便全部夺取。敌江防西段较弱，故突破较易。东段敌较集中，必须准备连续恶战数日，方能突破立足。对4月20日行动，是正式渡江作战之开始，抑或仅做到夺取江北桥头堡后，当需停顿一下，均请能于18日先期再加指示。

[4] 即《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

难，他们不相信我军能够大举渡江。我们估计他们二十日以前可能不理我们，要看一下我军能否于二十日以后真能渡江。假如我军真能于二十二日（卯养）渡江成功，则协定仍可能于二十三、四、五等日签订。故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二十二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

军委

十七日三时

南京方面和平协定须于二十日前表态^[1]

(1949年4月17日)

【新华社北平十七日电】今日为和平谈判的第十七天。四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代表团与南京代表团经过频繁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拟定了国内和平协议草案。十三日，双方代表在故宫举行正式会议，中共代表团说明了中共的立场和协议草案的理由，南京代表团对协议草案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和意见。十五日，双方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中共代表团将最后修正草案交付南京代表团。协议全文为八条二十四款，不但采纳了南京代表团方面的意见，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亦从旁积极提供了意见。中共代表团于十五日的双方会议上宣布：谈判以四月二十日为限期，南京代表是否愿意于协定上签字，须于二十日以前表示态度，四月二十日为签字日期。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南京代表团派遣黄绍竑代表及屈武顾问飞南京，向南京政府请示，现正等候南京的答复。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稿。

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1]

(1949年4月18日)

总前委，粟、张、刘、张、李，谭震林^[2]（总委转）：

（一）总前委篠子篠未两电，粟张篠午电，刘张李篠戌电均已收到阅悉。（二）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胥）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至于粟张方面要求提前于十六日起攻占江北及江心据点，也是必须的，我们早已同意了。（三）总前委主张待渡江任务完成后，以陈谢三兵团^[3]出徽州^[4]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张震等的电报。

[2] 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谭震林，当时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

[3] 陈谢三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

[4] 徽州，旧府名，府治即今安徽歙县。

沿浙赣公路东进；以宋郭九兵团^[1]监视芜湖、南京，主力位于南京以南；以陈赓四兵团^[2]接替九兵团在芜湖的任务，并准备加入攻南京；王谭七兵团^[3]、杨苏五兵团^[4]的任务照原规定不变等项，我们认为目前可以照此预拟施行。待粟张方面渡江后所遇敌情变化明了以后，如须有所变更，再按情况临时改变。（四）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中央军委

四月十八日九时

[1] 宋郭九兵团，指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

[2] 陈赓四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

[3] 王谭七兵团，指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

[4] 杨苏五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

委
 總前委 葉林、劉性、譚震林(總參謀) (一) 總前委不
 徐木兩處 葉林簽字, 劉性簽字均已收到。應
 (二) 完全同意總前委的整個部署即二野三野各軍團於
 廿日(即)開始渡江, 廿二日(即)實行渡江, 一氣到底
 底完成渡江任務, 以後再考慮戰作停頓採取第二
 步行動。請你們即據此經計劃堅決地滿在地
 執行之。此種計劃不但為軍事上所必需而且為政治
 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變。案件方面要求程
 前於廿日起渡江, 江北及江心樞要, 也是必須的。我們
 早已同意了。(三) 總前委主任得渡江任務完
 成後
 陳謝洪劉出滿州治滿報公談東進, 參九兵團

監視黃湖南京主力信報以南, 以傳聲之類推替九
 兵團在黃湖的任務並準備加入攻南京主陣七兵團所
 揚蘇五兵團的任務照原規定不變事項我們認為
 可以照此執行。原代方面渡江以後所
 遇之敵情變化如 明瞭後如須有所
 變更再按情況臨時改變。(注) 我百萬大軍渡江
 南進保證全局勝利極大者望我二野三野
 全體將士同心同德在總前委領導下完
 成偉大任務。中軍委 (及二野三野兩軍)
 四月九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的手稿。



1949年4月20日, 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当日起, 人民解放军开始强渡长江天堑。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

(1949年4月21日)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2]。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经过双方代表团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和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他各项问题亦无不是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作了适宜的解决。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一月一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因为，既然承认惩办战争罪犯，用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反动军队，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以及其他各项基础条件，就没有理由拒绝根

据这些基础条件所拟定的而且是极为宽大的各项具体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 德

[1] 这个命令是毛泽东起草的。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以后，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这个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第三野战军，于1949年4月20日夜起，至21日，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了国民党22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接着，又分路向南挺进，于5月3日解放杭州，5月22日解放南昌，5

月27日攻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7月，开始进军福建。8月17日解放福州，10月17日解放厦门。林彪、罗荣桓等领导的第四野战军，于5月14日，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100余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长江。5月16、17两日，解放华中的重镇武昌、汉阳和汉口。接着，又南下湖南。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于8月4日宣布起义，湖南省和平解放。第四野战军在9、10月间进行衡（阳）宝（庆）战役，歼灭了国民党白崇禧军的主力以后，又向广东、广西进军。10月14日解放广州，11月22日解放桂林，12月4日解放南宁。和第二、第三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的同时，聂荣臻、徐向前等领导的华北各兵团，4月24日攻克太原。彭德怀、贺龙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在5月20日解放西安之后，同第十九、第二十兵团继续向西北国民党统治区进军，8月26日攻克兰州，9月5日解放西宁，9月23日解放银川，全部歼灭了国民党马步芳、马鸿逵军。9月下旬，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主席鲍尔汉宣布起义，新疆省和平解放。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同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的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于11月初开始向西南进军。11月15日解放贵阳，11月30日解放重庆。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宣布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12月下旬，进入西南的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成都战役，全部歼灭国民党胡宗南军，27日解放成都。到1949年12月底，人民解放军已经全部歼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

[2] 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谈判。经过半个月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4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4月20日，被南京政府所拒绝。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全文如下：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政府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破坏停战协定及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之下，向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此项战争，至今已达两年又九个半月之久。全国人民，因此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国家财力物力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国家主权亦遭受了新的损害。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立场，违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

联共及扶助农工等项正确的政策，以及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临终遗嘱，历来表示不满。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此次空前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由此而采取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外交等项错误的政策及措施，尤其表示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中业已完全丧失信任。而在此次国内战争中，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业已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所战败。基于上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曾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一日向中国共产党提议举行停止国内战争恢复和平状态的谈判。中国共产党曾于同年一月十四日发表声明，同意南京国民政府上项提议，并提议以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卖国条约，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八项条件为双方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此八项基础条件已为南京国民政府所同意。因此，中国共产党方面和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派遣自己的代表团，授以举行谈判和签订协定的全权。双方代表于北平集会，首先确认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于此次国内战争及其各项错误政策担负全部责任，并同意成立本协定。

第一条

第一款 为着分清是非，判明责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双方（以下简称双方）确认，对于发动及执行此次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第一项 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第二项 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凡属怙恶不悛，阻碍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不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或竟策动叛乱者，应予从严惩办。其率队叛乱者，应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予以讨平。

第二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冈村宁次大将宣告无罪释放，复于同年一月三十一日允许其他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送返日本等项处置，是错误的。此项日本战犯，一

俟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即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新的中央政府成立，即应从新处理。

第二条

第三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应予废除。

第四款 《中华民国宪法》废除后，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当遵循的根本法，应依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民主联合政府的决议处理之。

第三条

第五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法统，应予废除。

第六款 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及在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应立即建立人民的民主的法统，并废止一切反动法令。

第四条

第七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力量（一切陆军、海军、空军、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地方部队，一切军事机关、学校、工厂及后方勤务机构等），均应依照民主原则实行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应立即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负责此项改编工作。整编委员会委员为七人至九人，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四人至五人，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三人至四人，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之委员一人为主，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之委员一人副主任。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得依需要，设立区域性的整编委员会分会。此项分会双方人数的比例及主任副主任的分担，同于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海军及空军的改编，应各设一个整编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向南京国民政府现时所辖地区开进和接收的一切事宜，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规定之。人民解放军开进时，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不得抵抗。

第八款 双方同意每一区域的改编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项 第一阶段，为集中整理阶段。

第一点：凡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部队（陆军、海军、空军、宪兵、交通警察总队及地方部队等）均应集中整理。整理原则，应由整编委员会根据各区实况，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按照其原番号，原编制，原人数，命令其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

第二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其驻在的大小城市，交通

要道，河流海港及乡村，当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前，应负责维持当地秩序，防止任何破坏事件发生。

第三点：在上述地区，当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时，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应根据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的命令，实行和平移交，开赴指定地点。在开赴指定地点的行进中及到达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应严格遵守纪律，不得破坏地方秩序。

第四点：在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遵照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的命令离开原驻地时，原在当地驻守的地方警察或保安部队不得撤走，并应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和命令。

第五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开动与集中期间，其粮秣被服及其他军需供给，统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和地方政府负责解决。

第六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军事机关（从国防部直到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所属的机关、学校、工厂、仓库等），一切军事设备（军港、要塞、空军基地等）及一切军用物资，应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根据各区实况，命令其分区分期移交给人民解放军及其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

第二项 第二阶段，为分区改编阶段。

第一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陆军部队（步兵部队，骑兵部队，特种兵部队，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及地方部队），在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后，整编委员会应根据各区实况，制出分区改编计划，定期实施。改编原则，应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和正规编制，将经过集中整理的上述全部陆军部队编成人民解放军的正规部队。其士兵中老弱残废，经查验属实，确须退伍，并自愿退伍者，其官佐中自愿退役或转业者，均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负责处理，给以回家的便利和生活的安置，务使各得其所，不致生活无着，发生不良行为。

第二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海军空军，在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后，即按原番号，原编制，原人数，由海军空军整编委员会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加以改编。

第三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应严格遵守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忠实执行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制度，不得违犯。

第四点：在改编后，退伍官兵应尊重当地人民政府，遵守人民政府法令。地方人民政府及当地人民，亦应对退伍官兵给以照顾，不得歧视。

第九款 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力量，于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不得再行征募兵员。对其所有武器、弹药及一切装备，一切军事机关设备及一切军用物资，均须负责保护，不得有任何破坏、藏匿、转移或出卖的行为。

第十款 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任何武装力量，如有对改编计划抗不执行者，南京国民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以保证改编计划的彻底实施。

第五条

第十一款 双方同意，凡属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依仗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官僚资本企业（包括银行、工厂、矿山、船舶、公司、商店等）及财产，应没收为国家所有。

第十二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应负责监督第十一款所述官僚资本的企业和财产不许逃匿，或破坏，或转移户头，暗中出卖。其已经迁移者，应命其就地冻结，不许继续迁移，或逃往国外，或加以破坏。官僚资本的企业及财产在国外者，应宣布为国家所有。

第十三款 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和接收的地区，第十一款所指的官僚资本企业和财产，即应由当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或民主联合政府委任的机构实行没收。其中，如有私人股份，应加清理，经证实确为私人股份并非由官僚资本暗中转移者，应予承认，并许其有留股或退股之自由。

第十四款 凡官僚资本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以前及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而为不大的企业且与国计民生无受害者，不予没收。但其中若干人物，由于犯罪行为，例如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而为人民告发并审查属实者，仍应没收其企业及财产。

第十五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城市，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省、市、县政府应负责保护当地的人民民主力量及其活动，不得压抑或破坏。

第六条

第十六款 双方确认，全中国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应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后，一般地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第十七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

地方政府应负责保护农民群众的组织及其活动，不得压抑或破坏。

第七条

第十八款 双方同意，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所订立的一切外交条约、协定及其他公开的或秘密的外交文件及档案，均应由南京国民政府交给民主联合政府，并由民主联合政府予以审查。其中，凡对于中国人民及国家不利，尤其是有出卖国家权利的性质者，应分别情形，予以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第八条

第十九款 双方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院、部、会等项机构，应暂行使职权，但必须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处理，并协助人民解放军办理各地的接收和移交事项。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民主联合政府移交，并宣告自己的结束。

第二十款 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各级地方政府与其所属一切机构举行移交时，人民解放军、各地人民政府及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必须注意吸收其工作人员中一切爱国分子及有用人材，给以民主教育，并任用于适当的工作岗位，不使流离失所。

第二十一款 南京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省、市、县地方政府，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以前，应负责维持当地治安，保管及保护一切政府机关、国家企业（包括银行、工厂、矿山、铁路、邮电、飞机、船舶、公司、仓库及一切交通设备等）及各种属于国家的动产不动产，不许有任何破坏、损失、迁移、藏匿或出卖。其已经迁移或藏匿的图书档案，古物珍宝，金银外钞及一切产业资财，均应立即冻结，听候接收。其已经送往外国或原在外国者，应由南京国民政府负责收回或保管，准备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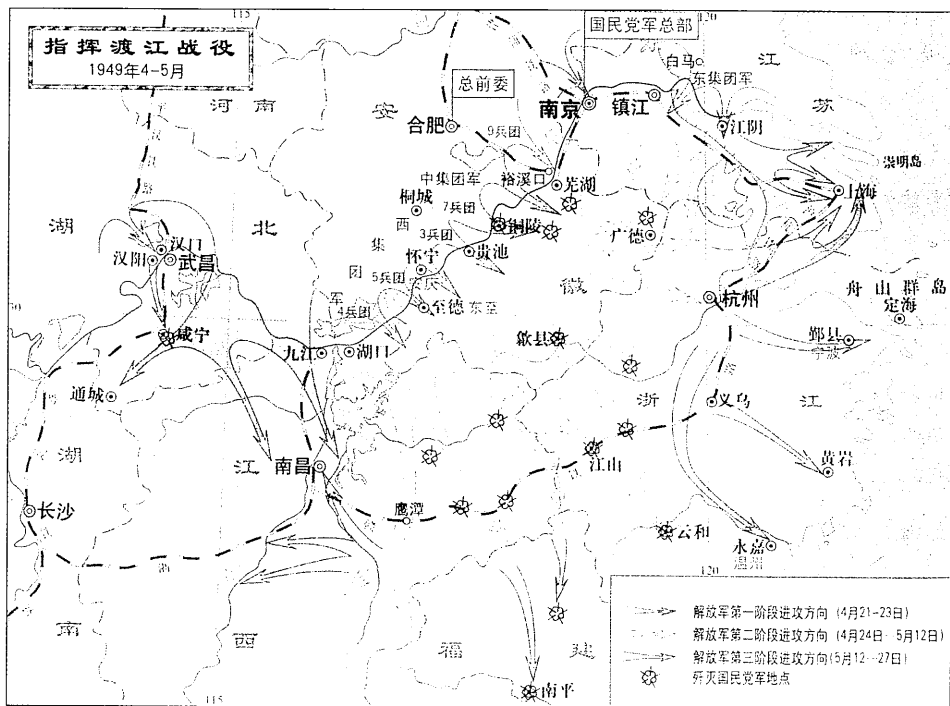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款 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即应经由当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及地方人民政府或联合政府委任的机构，接收地方的一切权力及国家产业财富。

第二十三款 在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签字于国内和平协定并由南京国民政府付诸实施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得派遣爱国分子若干人为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

会议；在取得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批准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即可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第二十四款 在南京国民政府业已派遣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提议：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应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若干爱国分子，以利合作。

双方代表团声明：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我们特负责签订本协定，希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完满地实现本协定而奋斗。本协定于签字后立即生效。



渡江战役示意图。

^{（新华社北平二十日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命令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彭德怀总司令、聂荣臻总司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总司令同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林彪、罗荣桓总司令同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林彪、罗荣桓总司令同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林彪、罗荣桓总司令同志、
 解放军同志们：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南京与南京国民党的代表
 在南京签订的停战协定、和平协定，已由南京
 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之所
 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国民党）
 顽固坚持美国帝国主义及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企图阻
 断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前进，阻碍国内和平方法解决
 国内问题。经过双方代表团多次谈判所签定的国内和
 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表示国民党在刚性的宽

^{（新华社北平二十日电）}
 大总统，对国民党军... 及国民政府... 又...
 出... 的... 解决。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及
 国民党军... 决心... 的... 到底...
 在今年... 和平谈判... 因此人民...
 军... 推进... 时机... 搭...
 重来... 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
 仁政府... 八个和平条件... 法...
 是... 的。因为... 罪... 及
 国民党及国民党军... 所... 级
 府的一切权力... 其他... 就
 没有理由拒绝... 条件...

的和平... 是... 各项具体... 在
 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 (一)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
 全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
 全国人民，保障人民生命财产。^{（中）}
- (二) 奋勇前进，一切愿意不战的国民党军
 队，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缴械为案，依法严办。
 特别注意缉拿... 首...^{（最注意）}
- (三) 对于国民党军... 地方性协定。
 四、... 以... 机会。

和平协定... 及... 的...
 愿意... 上

(一) 在... 之后，如果...
 ... 求... 上... 我们...
 ... 给... 以... 机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委员会 朱德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

毛泽东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手稿。

复粟裕、张震等电^[1]

(1949年4月21日)

你们所说的外舰可能是国民党伪装的，亦可能是真的，不管真假，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并应一律当作国民党兵舰去对付。

[1] 4月21日，粟裕、张震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20日午两艘外国军舰侵入扬州东南的三江营口岸第三野战军防区，一被击沉，一被击伤。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粟、张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致总前委等电^[1]

(1949年4月22日)

(一) 兹将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来函一件转给你们；(二) 英国人要求我军对于英舰两艘营救被击损之英舰(紫石英号)船员一事予以便利，我们意见在英舰不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条件下，可予以营救之便利；(三) 对于英国人要求该二舰于营救事务完毕后，仍须开往南京护侨一事不能同意，应令该二英舰向下游开去。但如该二英舰不听劝告，仍开南京，只要不向我军开炮及不妨碍我军渡江，你们也不要攻击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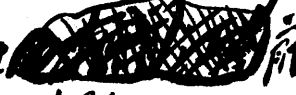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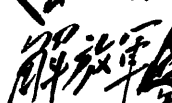


[1] 22日，从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给朱德总司令的信中获悉侵入长江人民解放军防地的均为英国军舰后，毛泽东于3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这是该电的主要内容。

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1]

(1949年4月22日)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时电】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消息。


 长江  二十时
 (新华社  前线二十二日) 英勇的人民
 解放军  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役
 于二十日  下午六时开始，地点在蕪湖安慶之間。
~~此次向繁昌、铜陵地区渡江，国民党反动派经营~~
 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
 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
 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分钟，三十万
 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
 区，现正向繁昌、铜陵、洪林进集中。人民解放军
 青阳、荻港、鲁港
 以能的神速
 式的战斗，
 坚决地执行
 毛主席总司令
 的命令。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消息《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的手稿。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1]

(1949年4月22日)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十二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不含），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二十四小时内即已渡过三十万人。二十一日下午五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三十五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二十三日可渡完。这一路现已占领贵池、殷家汇、东流、至德^[2]、彭泽之线的广大南岸阵地，正向南扩展中。和中路军所遇敌情一样，我西路军当面之敌亦纷纷溃退，毫无斗志，我军所遇之抵抗，甚为微弱。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当；另一方面，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订和平协定，有很大关系。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听见南京拒绝和平，都很泄气。战犯汤恩伯^[3]二十一日到芜湖督战，不起丝毫作用。汤恩伯认为南京、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稿，在194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2] 东流、至德，1959年合并为安徽东至县。

[3]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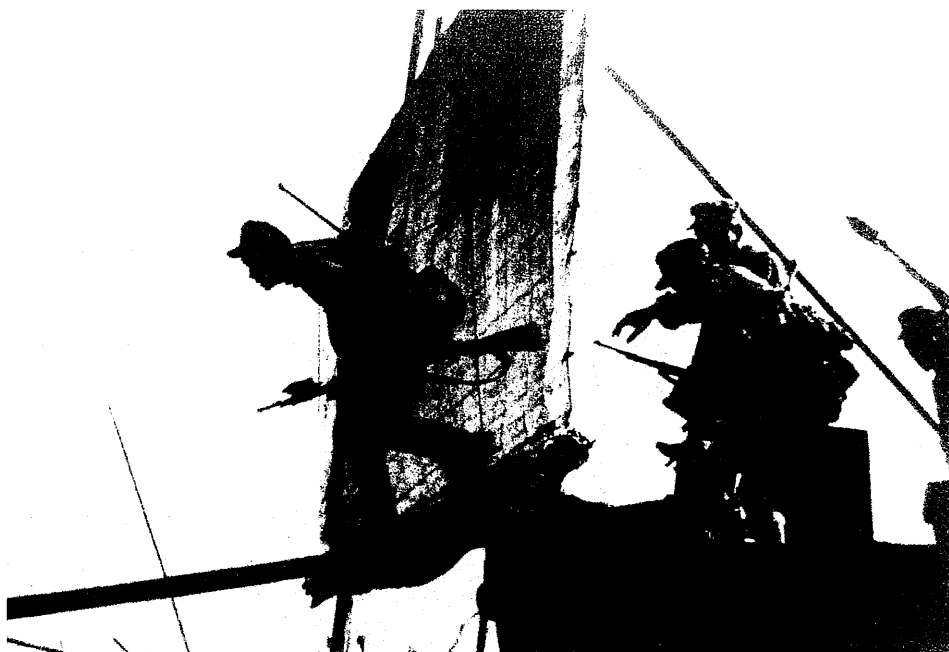
江阴段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于南京、九江一线。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军突破了。我东路三十五万大军与西路同日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时止，我东路各军已大部渡过南岸，余部二十三日可以渡完。此处敌军抵抗较为顽强，然在二十一日下午至二十二日下午的整天激战中，我已歼灭及击溃一切抵抗之敌，占领扬中、镇江、江阴诸县的广大地区，并控制江阴要塞，封锁长江。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线。

新华社二十一日 电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二十一日下午二时，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二十四日即有二十万人。二十日下午五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二十三日可渡完。一路军已占领繁昌、荻港地区，东路、中路军之渡江南岸阵地，正向南扩展中。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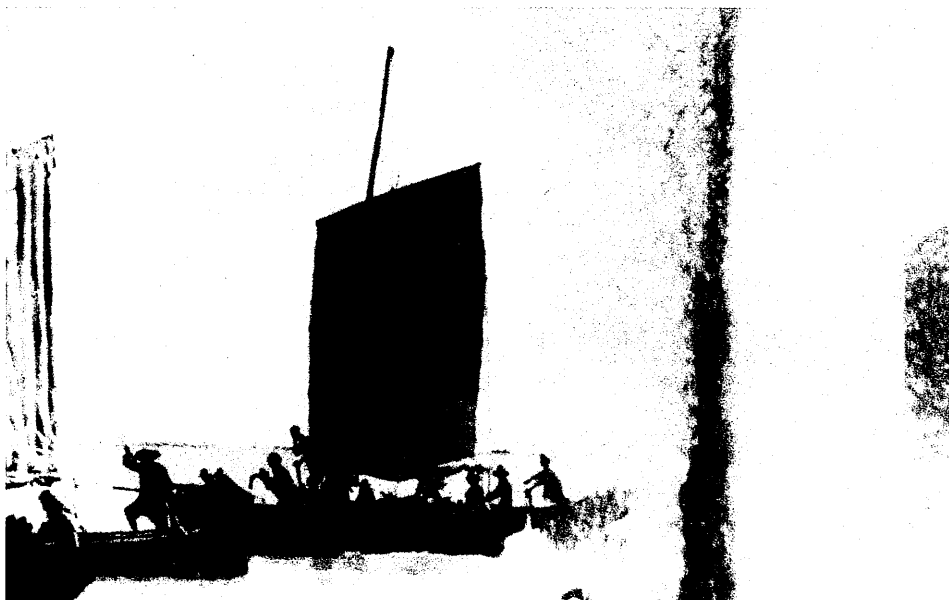
我西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二十四日即有二十万人。二十日下午五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二十三日可渡完。一路军已占领繁昌、荻港地区，东路、中路军之渡江南岸阵地，正向南扩展中。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线。

近南岸，二十三日可以渡完。此处敌军抵抗较为顽强，然在二十一日下午至二十二日下午的整天激战中，我已歼灭及击溃一切抵抗之敌，占领扬中、镇江、江阴诸县的广大地区，并控制江阴要塞，封锁长江。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线。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手稿。



1949年4月，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



1949年4月，百万雄师冒着敌人的炮火强渡长江。

人民解放军战胜 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的联合进攻^[1]

(1949年4月22日)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十四时电】在镇江江阴段的渡江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曾于二十日及二十一日战胜英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大队军舰的联合进攻，这件事值得全国人民极大注意。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二十日我军攻击北岸敌桥头据点及江中许多洲岛，准备大举渡江的时候，除和国民党陆军作战外，还要和国民党的海军作战。二十日上午，有两艘敌舰由东向西开来，向我泰兴县西北扬中县正北名叫口岸的北岸桥头阵地发炮，其目的是阻我向中心洲进攻及展开船只渡江。我军炮兵当即奋勇还击，敌舰一艘被毁，不久下沉。另一艘负伤，向西驶至镇江附近大部下沉。此时又有一艘敌舰从镇江方面向东开进，至口岸附近向我阵地发炮，我再还击，又将该舰击伤，该舰后向下游驶去。二十一日上午，又由东面来了两舰，一大一小。此时我即首先发炮，使其不敢迫近，又将该两舰击伤，狼狈向来路江阴方面逃去。由于这一次向敌舰作战胜利，方才将敌舰阻我渡江之计划打破，二十一日下午方得大举渡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述评新闻。4月30日，毛泽东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并且阐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江。当我军和上述五艘敌舰作战时，江中尚泊有几艘敌舰和上述五舰相距不远，亦参加战斗，唯畏我炮火，不甚积极。直到二十一日夜间，我军还以为上述各舰都是国民党的军舰。到了二十二日，从各方面收集情报，方才知悉上述诸舰中，竟有四艘是英国军舰。四艘英舰中，有三艘在战败后向江阴以东逃去，大概是逃往上海。另一艘英舰现搁浅于镇江附近不远的江中，要待我军占领镇江后才能将详细情形查清楚。在和上述诸舰作战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伤亡二百五十二人，阵地及武器被毁一部。英帝国主义的海军竟敢如此横行无忌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一起，向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挑衅，闯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发炮攻击，直接参加中国内战，致使人民解放军遭受巨大损失，英帝国主义政府必须担负全部责任。国民党反动派历来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屠杀同胞，现当日暮途穷之际，又复勾结英帝国主义的大队海军深入长江，图阻人民解放军渡江，此种卖国残民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1949年，毛泽东在北平。

致总前委等电^[1]

(1949年4月23日)

英舰事件，现已震动世界各地。英美报纸，均以头条新闻揭载。请粟、张加强江阴方面的炮火封锁，一则使国民党军舰不能东逃。二则使可能再来之英舰不能西犯，如敢来犯，则打击之。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对英舰事件的处置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复杨成武、唐延杰、李天焕等电^[1]

(1949年4月23日)

大同敌应由你们负责去解决，如果解决太原不需要你们全部兵力，可以派一个军先出发包围大同。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杨成武、唐延杰、李天焕并告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华北局电的主要内容。杨成武、唐延杰、李天焕，当时分别任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1]

(1949年4月24日)

【新华社北平二十四日六时电】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李宗仁、何应钦及南京的国民党军队于昨日上午逃出南京。李、何等乘飞机逃往上海。国民党南京守卫部队及宪兵，沿京杭公路逃跑。浦口的国民党军，于二十二日撤至南京，二十三日一同往京杭路上奔逃。芜湖及镇江一带的国民党军，亦向同一方向乱窜。人民解放军正向南京急进，如果昨夜没有入城，则可能于今日入城。南京人民正在等候着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军已离开南京，人民解放军尚未入城的时间，南京人民已于昨日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并于昨日下午六时发电致毛泽东主席，欢迎人民解放军。该电称，毛主席勋鉴：南京守军于二十三日撤退。南京人民为安全计，联合发起各界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推青苑为主任委员，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十三人。地方尚称安定。恳请电饬京陵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以慰民望。何日入城，并请电示，以便欢迎。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主任委员马青苑，副主任委员吴贻芳及委员等同叩梗酉。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消息。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已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在长江防线崩溃，仓皇西逃。人民解放军已于四月二十二日，攻克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已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在长江防线崩溃，仓皇西逃。人民解放军已于四月二十二日，攻克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已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在长江防线崩溃，仓皇西逃。人民解放军已于四月二十二日，攻克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已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在长江防线崩溃，仓皇西逃。人民解放军已于四月二十二日，攻克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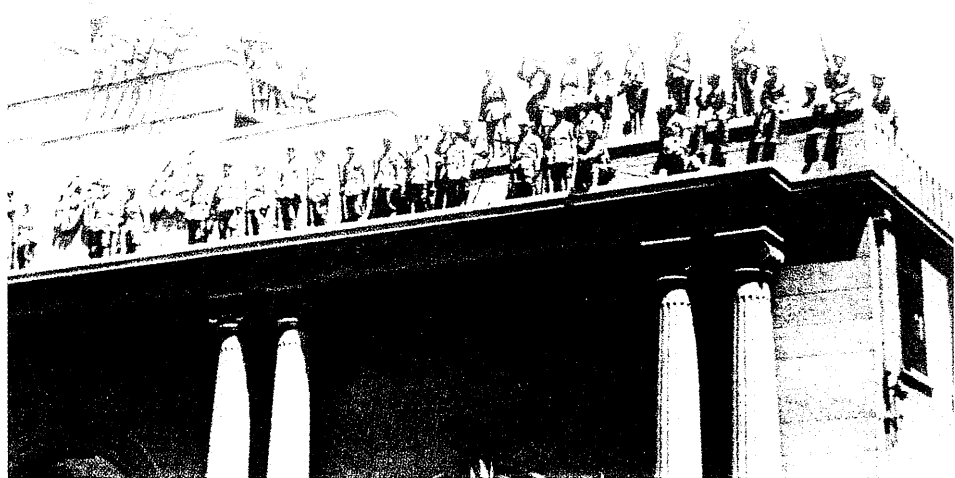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的手稿。



1949年，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看南京解放的捷报。



《饱览胜利的捷报 运筹中国的明天》(中国画)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红旗插上“中华民国总统府”，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灭亡。



《占领总统府》(油画)



《伟大的统帅指方向》(油画)

第十八第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1]

(1949年4月25日)

徐、周、罗，并告彭^[2]：

卯敬两电^[3]悉。(一)同意宣布梁化之、孙楚、王靖国、戴炳南^[4]四人为战犯，缉拿治罪。(二)二十兵团(全部)应尽可能迅速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和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电报的节录。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1949年4月24日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给中共中央军委的两份电报。电报说：“太原解放前受阎匪残害之惨，实属骇人听闻。而以梁化之、孙楚、王靖国、戴炳南为首，对我十数次之宽大劝告、警告与通牒，不仅只字不理，反而烧毁民房，工厂，破坏财物，施放毒气，挣扎至最后。为泄民愤以警告敌人，我们拟公开宣布该四人为战犯，并令部队严予缉拿，并拟于该四犯就擒后，有计划地公布其罪状，发动人民控诉，然后召开庆祝太原解放与公审战犯大会，予以公审正法。”电报还说：“1. 太原作战已结束。三个兵团之整训时间、行动任务及指挥关系，请军委确定见示。2. 我们拟于28日召开总前委会，总结太原作战，讨论部队整训及行动准备工作。”

[4] 梁化之，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特警处处长。孙楚，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王靖国，当时任国民党太原防守司令兼第十兵团司令官。戴炳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军军长。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离太原去南京后，将防守太原的指挥权交给孙楚、王靖国和梁化之等人。

开平绥线^[1]夺取大同，尔后即控制于该线整训。（三）十八及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区处。

军委

卯有

[1] 平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1949年4月25日)

国民党反动派业已拒绝接受和平条件，坚持其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恶的战争立场。全国人民希望人民解放军迅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实现全国人民所渴望的真正的统一。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深望各界人民予以协助。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

(一) 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各界人民，不分阶级、信仰和职业，均望保持秩序，采取和人民解放军合作的态度。人民解放军则采取和各界人民合作的态度。如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破坏分子，乘机捣乱、抢劫或破坏者，定予严办。

(二) 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希望各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店照常营业。

(三) 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所

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

（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机关供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

（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速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

（六）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凡自动投诚报到，并将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须受相当的处分。

（七）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但是废除这种制度，必须是有准备和有步骤的。一般地说来，应当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并且需要人民解放军到达和工作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方才谈得到认真地解决土地问题。农民群众应当组织起来，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行各项初步的改革工作。同

时，努力耕种，使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不致降低，然后逐步加以提高，借以改善农民生活，并供给城市人民以商品粮食。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

（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一切外国侨民各安生业，保持秩序。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令，不得进行间谍活动，不得有反对中国民族独立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行为，不得包庇中国战争罪犯、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罪犯。否则，当受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

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希望我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 德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布告 持其~~国~~
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拒绝接受和平条件，~~空~~居民族反民
的罪恶战争~~三~~。全国人民希望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
反动派。我们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消灭~~
~~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一切~~在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逮捕一切抗拒不援的战争罪犯，~~解放~~全国人民，保障
中国领土主权的统一与完整，实现全国人民的渴
望的~~真正~~真正的人民的统一。人民解放军所到
之处，深望各界人民予以援助。兹特宣布约法八章，
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

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手稿（部分）。

复彭德怀等电^[1]

(1949年4月25日)

杨成武兵团需留华北暂不入陕，该兵团如损伤不大可迅开平绥线夺取大同，尔后即控制于该线，准备将来配合西北我军解决绥、宁问题。同意你于五月初回陕，在回陕前请对十八、十九两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尔后该两兵团即由你直接指挥。

[1] 这是毛泽东复彭德怀并告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电的主要内容。

给胡乔木的信^[1]

(1947年4月2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应连播两三日。

尔后，凡解放一个大城市例如上海、汉口，应重新对该市重播一次。

[1] 这是毛泽东致胡乔木信的主要内容。

在李涛送审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1949年4月26日)

(一) 请朱、周、任阅，如同意，即照此确定。(二) 请周交罗迈征求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的意见。因军队是国家的主要部分，似有征求他们意见之必要。

书报上的错误必须更正^[1]

(1949年4月)

—

北平解放报^[2]编辑同志：

兹付上更正表一件，请予登载为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五日

本报四月二十五日登载毛泽东《五四运动》一文，有几处文字上的错误，更正如下：

(一) “二十年的五四运动”，“年”字下脱“前”字。

(二) “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及民主革命获得了一支生力军”，“及”字是多余的。

(三) “它从封建主义社会看来，要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看”

[1] 毛泽东在文稿的撰写、印行上，一向严谨精细，一丝不苟，发现差错，毫不含糊，公开予以更正。他曾亲笔写过一些更正，这里选录其中两件。

[2] 北平解放报，是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1949年3月创刊，同年8月1日停刊。

字是多余的。

(四)“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实现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两个“实现”，前面的“实现”二字是多余的。

(五)“而在乎口讲（仅仅口讲）什么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东西”，“而”字下脱“不”字。

二

四月二十五日广播的人民解放军布告，有两个错字：（一）第三条“当承认其所有权”，“当”字误为“均”字。（二）第七条“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村”字误为“民”字。以上两点务请各广播电台各报纸予以更正。各人民解放军政治机关印发这个布告时，务请更正为盼。

新华社

四月二十六日

要做好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的^[1]

(1949年4月27日)

总前委，粟、张，并告刘、张、李^[2]：

(一) 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收上海，以便在上海敌军假如迅速退走，上海人民要求你们进驻的时候，不致毫无准备，仓卒进去，陷于被动。(二) 美国驻上海军舰为避免引起纠纷，有于二十六日下午撤退至长江口外之传说，是否如此待证。(三) 如果美舰撤退，杭州又受威胁，国民党在沪军队有迅速撤走可能。加以上海资产阶级不赞成在上海打仗，故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四) 为着多有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退出上海、我军仓卒进入上海，请粟张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的，以便在国民党迅速退出上海时，我军亦不至毫无准备地仓卒进去。(五) 准备情形，望筹划电告。(六) 何时进驻上海，须得我们批准。

军委

二十七日六时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应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1]

(1949年4月28日)

林、罗、刘、张、李、萧、陈，并告中原局：

(一) 和谈破裂，桂系亦从来没有在具体行动上表示和我们妥协过，现在我们亦无和桂系进行妥协之必要。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消灭桂系及其他任何反动派。但是，我四野主力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到达汉口附近，接收汉口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因此，白崇禧^[2]和中央联络的电台暂时仍不割断，萧陈前线亦应遵守前定界线不要超越，以免刺激汉口敌军惊慌，撤走得太早。在此意图下，如果滬口^[3]铁桥不十分重要，不十分难于修复，最好暂时不去抢占。但是如果滬口铁桥十分重要，被敌破坏后十分难于修复，则可以早日去抢占。但是抢占滬口后，白崇禧即可能放弃汉口汉阳两城，萧陈及中原局应准备早日接收汉口、汉阳。此事究以如何处置为适宜，本日已与林彪同志当面谈过，由林彪同志负责考虑答复，请萧陈及中原局向林再提供意见。(二) 浠广^[4]不在划定范围之内，该处敌军应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政治委员罗荣桓等的电报。

[2]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3] 滬口，镇名，位于湖北黄陂县南部。

[4] 浠，指湖北浠水。广，指广济，旧县名，1987年改设湖北武穴市。

予消灭，不使决堤灌水。（三）从电到日起，萧陈归林罗直接指挥，解除刘邓张李^[1]对萧陈的全般指挥关系，但在工作配合上刘邓张李仍得指挥萧陈。（四）无论怎样，萧陈及中原局应当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以免敌人退走，仓卒接收，毫无准备。

军委
卯俭

[1] 刘，指刘伯承。邓，指邓小平，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张李，指张际春、李达。

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49年4月28日)

德怀^[1]同志：

假如西野^[2]方面暂时不打大仗，你可否于回陕前来中央一谈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的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3]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如何，盼复。

毛泽东

卯俭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西野，指西北野战军，1949年2月改称第一野战军。

[3] 张治中，原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1949年1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率代表团到北平和中共代表团进行谈判。4月15日，双方拟定“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之后，张治中等决定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

关于稳住汤恩伯及外交对策问题

(1949年4月28日)

总前委，粟、张^[1]，并告刘、张、李^[2]：

(一) 为使汤恩伯^[3]在上海稳住一时期，以利我军先取杭州，然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我们认为，你们暂时不要去占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让上述各点由汤恩伯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直接的威胁。

(二) 美国军舰及一营陆战队，已于二十六日由上海撤至吴淞口外，美国只留下一艘载有医疗设备的军舰（医舰）在上海。英国的军舰伦敦号及永恒号亦和美舰一起退往吴淞口外，只留下驱逐舰黑天鹅号在上海（该舰被打伤，有伤兵留沪就医）。法国原有一艘军舰在上海，是否退出不明。英、美采取此种态度于我有利。

(三) 我方对英、美侨民（及一切外国侨民）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

[1] 粟、张，指粟裕、张震，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 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3]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此事请邓、饶、陈、刘^[1]加以注意。

（四）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关于侵入司徒雷登住宅^[2]一事，美国可能向我南京当局提出一个口头的或书面的抗议。但是只要我方不继续发生此类事件，美国是不会将此事扩大的。

（五）英军舰紫石英号事件^[3]，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英国连抗议也没有提。因此我们除借此作宣传教育人民外，实际上我们亦不必扩大这件事。

中央军委

俭丑

[1]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陈，指陈毅，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

[2] 1949年4月25日，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士兵擅自进入美国原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宅。

[3] 1949年4月20日至21日，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252人。紫石英号被人民解放军击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他3艘英舰逃走。

复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信

(1949年4月28日)

四月二十日来信收到。叫我给你们的刊物写点文章，我是高兴的；可惜我近日颇忙，不能应命，请予原谅。

复粟裕、张震等电^[1]

(1949年4月29日)

我军既已占领苏州，似宜在苏州停止，让昆山、太仓、嘉兴暂时留在敌手；我军应在常熟集中重兵，密切监视上海情况，防敌经海路逃跑。一经发现敌有从海上逃跑象征，立即攻占吴淞，控制浦江出口。但须事先严戒部队，到吴淞后避免和外国军舰发生冲突。不得中央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发炮，至要至要。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粟裕、张震并告在南京的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

(1949年4月)

钟山风雨起苍黄，^[2]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3]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4]。
宜将剩勇追穷寇，^[5]

[1]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即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1000余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并于4月23日占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

[2] 钟山风雨起苍黄，钟山即紫金山，在南京市东面。苍黄，同仓皇。本句是说南京突然遭到了革命暴风雨的袭击。苍黄兼有变色的意思。这是修辞上的所谓“双关”。

[3] 虎踞龙盘，形容地势优异。三国时诸葛亮看到吴国都城建业（今南京市南）的地势曾说：“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参见《太平御览》引《吴录》）石头即石头山，在今南京市西。

[4] 慨而慷，感慨而激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

[5] 宜将剩勇追穷寇，剩勇，余勇。穷寇，走投无路的敌人。《后汉书·皇甫嵩传》：“兵法（指《司马兵法》），穷寇勿追。”这里改变了这种说法，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把敌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掉，不要留下后患。

不可沽名学霸王。^[1]

天若有情天亦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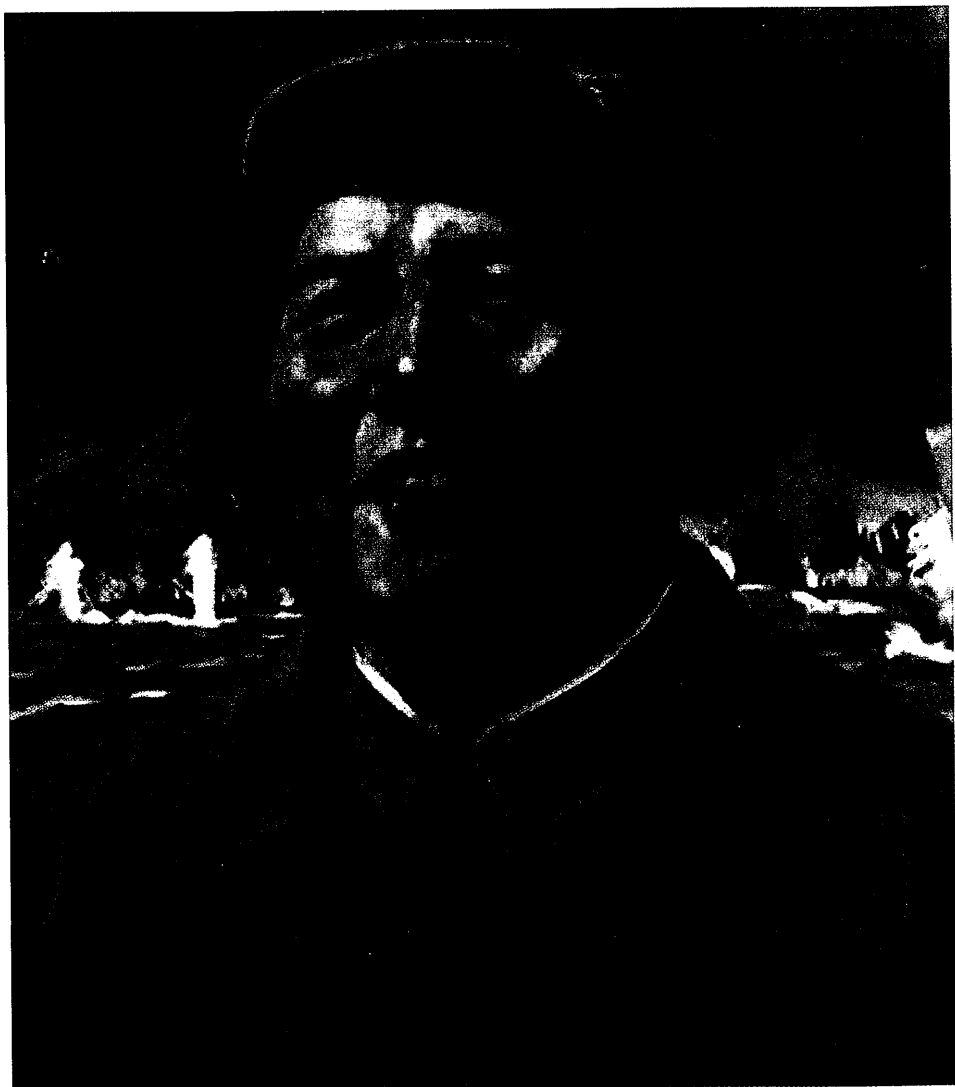
人间正道是沧桑。^[2]

[1] 不可沽名学霸王，沽名，故意做作或用某种手段猎取名誉。秦朝末年，项羽（曾自封西楚霸王）和刘邦（后来的汉高祖）同时起兵反秦。刘邦先据秦都咸阳拒项羽。项羽歼灭了秦兵主力，拥40万大军入咸阳。他当时为了避免“不义”之名，没有利用优势兵力消灭刘邦，后来反为刘邦所消灭。这里是说应从项羽的失败得到教训，不可为了“和平”的虚名，给敌人以卷土重来的机会。

[2]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上句借用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诗句，原诗说的是汉武帝时制作的极贵重的宝物金铜仙人像，在三国时被魏明帝由长安迁往洛阳的传说。原句的意思是，对于这样的人间恨事，天若有情，也要因悲伤而衰老。这里是说，天若有情，见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残酷，也要因痛苦而变衰老；身受反动派压迫的人民，自然要彻底推翻反动统治，完成翻天覆地的革命事业。人间正道，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沧桑，沧海（大海）变为桑田，这里比喻革命性的发展变化。古代神话：女仙麻姑对另一仙人王方平说，他们相见以来，东海已经三次变为桑田（见葛洪《神仙传》）。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義旗
師過大江雲接龍。龍虎爭天
翻地，風浪慨而慷。宜將剩勇
追窮寇，不可沽名學漢王。
天未弔民，天亦與人。人間
正道是滄桑。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毛泽东赋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狮过大江》(油画)



《虎踞龙盘今胜昔》（诗意画）



《宜将剩勇追穷寇》(诗意画)



《人间正道是沧桑》（油画）

作年一九九 在浩是道正間人
確家不圖的括必戰東濟九
陸榮



《人间正道是沧桑》（诗意画）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1]

(1949年4月29日)

饮茶粤海未能忘，^[2]

索句渝州叶正黄。^[3]

三十一年还旧国，^[4]

[1] 和柳亚子先生，和，酬和。柳亚子于1949年3月28日作《感事呈毛主席》一诗（见本篇附录），这是毛泽东的答诗。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1948年1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

[2] 饮茶粤海未能忘，粤海指广州。1926年5月，柳亚子（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同毛泽东初次晤面。“饮茶”句即指当时毛泽东同柳亚子的交往。按柳亚子在1941年《寄毛主席延安》诗中，曾有“粤海难忘共品茶”之句。

[3] 索句渝州叶正黄，渝州，即四川的重庆。毛泽东于1945年8月至10月曾到重庆，和国民党进行了40多天的和平谈判。当时柳亚子曾索取诗稿，作者即手书《沁园春·雪》相赠。

[4] 三十一年还旧国，旧国，过去的国都。作者1918年和1919年曾两次到过北京，到1949年北京（当时称北平）解放后再来，前后相距约31年。毛泽东自注：“三十一年：一九一九年离开北京，一九四九年还到北京。旧国：国之都城，不是State也不是Country。”

落花时节读华章。^[1]
牢骚太盛防肠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2]。
莫道昆明池^[3]水浅，
观鱼胜过富春江。^[4]

[1] 落花时节读华章，化用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落花时节又逢君”句。华章，美丽的诗篇，指柳亚子的诗。

[2] 放眼量，放大眼界去衡量，不必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以致“牢骚太盛”。

[3] 昆明池，北京西郊颐和园内的昆明湖。当时柳亚子住在颐和园内。

[4] 观鱼胜过富春江，观鱼，用《庄子·秋水》中庄子和惠施在安徽濠水桥上看水中游鱼的故事。富春江在浙江省桐庐和富阳两县境内，东汉时隐士严光（字子陵）曾在那里游钓，至今桐庐还有钓台遗址，但已离水面很高。这句诗的意思说，在颐和园的昆明湖观赏游鱼的快乐比在富春江的钓台更好。这是对柳亚子原诗“分湖便是子陵滩”而言。



《观鱼胜过富春江》(诗意画)

七律·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
说项依刘^[1]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2]
无车弹铗怨冯驩。^[3]
头颅早悔平生贱，
肝胆宁忘一寸丹！

[1] 说项依刘，劝说项羽接受刘邦的领导。柳诗作时正值中共中央争取南京国民党政府接受和平解决方案，希望民主人士共同努力。柳在此处表示他虽也是国民党元老，自觉无能为力。一说，用的是杨敬之到处讲项斯的好话和王粲去荆州依附刘表的故事。唐杨敬之《赠项斯》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乃之荆州依刘表。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悦，不甚重也。”柳表示说人好话、依附他人，他很难做到。

[2] 夺席谈经非五鹿，后汉戴凭驳倒许多讲经的学者，夺取了他们的讲席（见《后汉书·儒林·戴凭传》）。又说，前汉显贵受宠的五鹿充宗讲《易经》，曾被朱云驳倒（参见《汉书·朱云传》）。这里借指自己有夺席谈经的学问，决不是五鹿充宗那样依附权势、徒具虚名的人。

[3] 无车弹铗怨冯驩，战国时齐人冯驩投靠孟尝君田文。田文门下食客分三等：上等坐车，中等吃鱼，下等吃粗饭。冯驩列下等，他弹剑唱：“长铗归来乎，食无鱼。”田文把他列为中等，他又弹剑唱：“长铗归来乎，出无舆。”（参见《史记·孟尝君列传》）铗，剑，或说剑把。冯驩，《战国策·齐策四》作冯援。

安得南征驰捷报，
分湖便是子陵滩。^[1] [原注]

原注：分湖为吴越间巨浸，元季杨铁崖^[2]曾游其地，因以得名。余家世居分湖之北，名大胜村。第宅为倭寇所毁。先德旧畴，^[3]思之凄绝！

[1] 分湖便是子陵滩，分湖在柳亚子家乡的吴江县。子陵滩，即七里滩，起自浙江建德梅城，迄于桐庐钓台，因东汉初严子陵隐居曾在此游钓而得名。这里柳指自己要回乡去隐居。

[2] 杨铁崖，名维禎，字廉夫，元末明初诸暨（今浙江诸暨）人，当时的著名诗人。

[3] 先德旧畴，先辈旧产。

飲茶粵海未敢忘索句渝州
桑心黃土十有區萬國善真
時笑談華道宗蹟太盛河
病對風物去意放眼量英
道昆明池水涉象急務過
宮喜江奇岳析姓湖山日
心也影秋森正志潭東
初九年四月廿九日

毛泽东手书《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的^[1]

(1949年4月30日)

粟、张，并总前委：

艳晨电^[2]悉。(一) 歼灭诸敌甚慰。(二) 部署甚妥，如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完成此项部署并完成对于攻占上海的政治准备工作与军事准备工作，则你们可以立于主动地位。(三) 总前委除直接领导南京工作外，请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的，以便在一星期以后假如汤恩伯^[3]从海上逃跑时，你们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军委

卯三十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和参谋长张震并总前委的电报。

[2] 指1949年4月29日晨粟裕、张震给各兵团、各军并总前委、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逃向杭州被我逼入山区之敌已大部被歼，仅五十四军残部在逃。第三野战军第九和第十兵团负责肃清残敌。电报对在肃清残敌后，第九、第十、第七和第八兵团的作战部署作了具体规定，并指出要做好接受城市的准备工作。

[3]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高级领导机关对下级应加强文电指示

(1949年4月30日)

华东局，总前委，并告粟、张，刘、张、李，并告各局、各委：

(一) 艳酉^[1]电悉。处置甚好。

(二) 南京电报局不得中央同意，擅自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是何人处理的，望即查明电复。

(三) 我们认为，南京、上海两处暂时均不要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南京方面应重新开放，让外国记者发电，并且不要检查。待他们发一个时期，看其情况如何，再由中央决定或全部停止外国记者发电，或准许好记者发电，停止坏记者发电。

(四) 关于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指示，在你们高级领导机关方面来说，主要地是依靠写电报，发通令，而不是依靠开干部会，不是依靠口讲。一个负责人半小时可以写一个电报，一小时可以写一个通令，一天、两天、三天或四天工夫可以经过电台传达到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有文字为凭，有范围可守，又迅速，又使下级有所遵循。此种方法，毛主席已多次向饶漱石^[2]同志提议过。而在你们方面，则对于若干项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方法问题，仍然不是靠文字，而是靠口头去向下面作指示。口头指示也是

[1] 艳酉，即29日酉时。

[2]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要的，也是有用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则无文字可凭；二则范围不见得很明确；三则到会的少数人听到了，没有到会的多数人没有听到，有挂一漏万的缺点（只是说的只有口头报告，没有文字决议的干部会）。此次外交政策几天时间内出了很多乱子，就是因为你们过去对于这个问题对下面没有任何文电指示。对有些问题有了指示，但如果没有让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的领导同志同时普遍看到，或者指示中对一项问题不强调，不突出，不鲜明，不确定范围，则各地仍然不明白，或者不甚明白。现在鉴于南京方面闹出的乱子，如果你们还不采取打电报、发通令的方法，立即告诉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那就在上海，在杭州，在苏州，在镇江，在无锡，在芜湖，以及在其他地方，又要重复出乱子。这种出乱子的责任，主要地不是在下面，而是在领导方面，事前告诫处理得不适当，或者没有去告诫和处理。过去你们对于山东及苏北的城市政策和工业政策，长期不发电报，不发通令，以致下面无所适从，各干各的，受了损失，也是一项教训。

中央军委

卯三十

复粟裕、张震等电^[1]

(1949年4月30日)

据外国通讯社反映，二十七日上海敌军从海上运走约一万人，二十八日已停运。如果你们能以一个军从常熟进占浏河，威胁吴淞，则敌人不敢再从海上逃走。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致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电^[1]

(1949年4月30日)

(一) 凡在新区，嗣后对外宣传对内教育均以四月二十五日毛、朱所发人民解放军布告为标准，各局、各军均不要单独另发一般性的布告。以前各军所发约法七章或八章均取消不再发。(二) 毛、朱四月二十五日布告除电台广播、报纸发表、单张印发张贴于一切新区城市及乡村俾众周知外，军内、党内均应印发作为教材迅速传达学会，一律照此执行。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电的主要内容。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 为英国军舰暴行^[1]发表的声明^[2]

(1949年4月30日)

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3]。四月二十六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

[1] 1949年4月20日至21日，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252人。紫石英号也被人民解放军击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他3艘英舰逃走。英国当局曾由其远东舰队司令布朗特经过紫石英号舰长同人民解放军代表进行多次谈判，要求将紫石英号放行。当谈判还在进行之际，紫石英号军舰于7月30日夜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镇江下驶，强行靠近该轮与之并行，借以逃跑。当人民解放军警告其停驶时，紫石英号军舰竟开炮射击，并撞沉木船多只，逃出长江。

[2]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在这个声明里，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并且表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3] 1949年4月26日，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在下院发言，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驶入人民解放军防区的英舰说成是“暴行”，并且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的报复”。

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二百五十二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1]。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艾德礼说：人民解放军“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艾德礼是在撒谎，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允许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人民解放军不希望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帮助渡江，或做任何别的什么事情。相反，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直到现在还没有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

[1] 1949年4月26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在议会中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使命，因为它们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同时，他在谈到英国方面代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交涉的情况时，又造谣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

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艾德礼埋怨中国共产党因为没有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不愿意同外国政府的旧外交人员（国民党承认的领事）发生关系，这种埋怨是没有理由的。过去数年内，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对我们的，难道艾德礼先生也忘记了？被击沉不久的重庆号巡洋舰^[1]是什么国家赠给国民党的，艾德礼先生难道也不知道吗？

[1] 重庆号巡洋舰，是英国政府于1948年5月19日赠给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是国民党政府海军中最大的巡洋舰。1949年2月25日，这艘军舰的官兵在上海吴淞口举行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中国人民海军。同年3月19日，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出动重轰炸机多架，将其炸沉于中国东北辽东湾的葫芦岛附近。

给北京大学纪念五四 筹备委员会的信

(1949年4月30日)

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诸先生：

四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

庆祝北大的进步！

毛泽东

四月三十日

北京大学

纪念五卅的筹备委员会



毛泽东

北平大学堂五卅的筹备委员会
五卅纪念委员会的同志们：
你们为五卅的纪念而
因为你们的缘故，我们所以
能够的开会，这是非常
庆祝北大的进步。你们

毛泽东致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信的手稿。



1949年，毛泽东和毛岸英在香山。



1949年，毛泽东和毛岸英在香山双清别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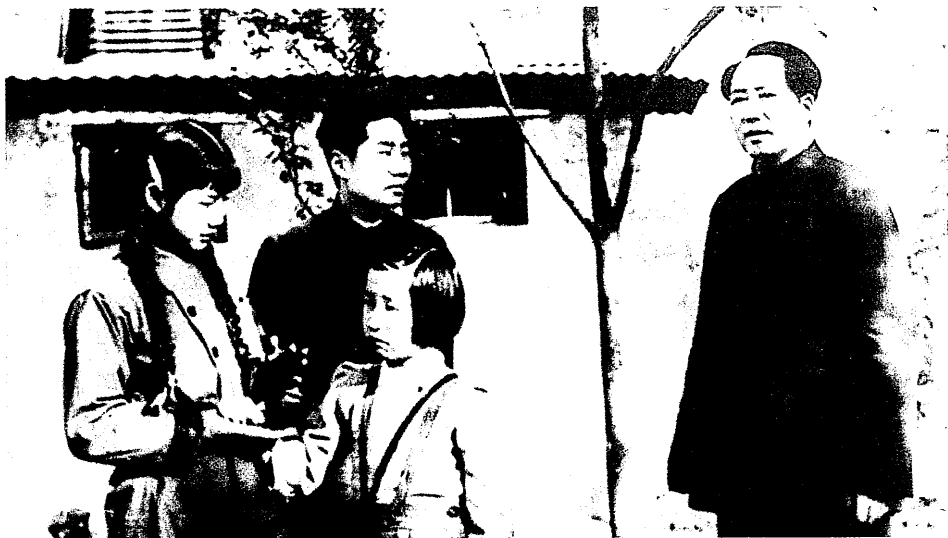
1949年，毛泽东和江青、李讷、李云露、王博文在香山。



1949年，毛泽东一家在香山合影。



1949年，毛泽东和江青、毛岸英、刘思齐、李讷在香山。



1949年，毛泽东和毛岸英、刘思齐、李讷在香山。



1949年，毛泽东和江青在香山。



《谈笑有鸿儒》(中国画)

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 以分置于皖南赣东浙西三区为适宜^[1]

(1949年5月1日)

总前委，刘、张、李，并告粟、张^[2]：

(一) 杭州、上海之敌所剩无几，东野^[3]不日即可歼灭。(二) 中野的任务在于歼灭皖南赣东浙西三区之敌，因三区之敌亦不甚多，故中野三个兵团似不需要集中使用，而以分置于三区为适宜，以便在敌军歼灭之后即可分别开辟三区的工作。是否可以如此，请考虑电告。

军委
辰东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总前委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的电报。

[2] 粟、张，指粟裕、张震，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东野，应为华野，即华东野战军，1949年2月改称第三野战军。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號召台灣同胞
響應五一口號
堅持反蔣反美爭取解放

香港民主人士致電毛主席
擁護中共五一時局主張
毛主席覆電強調共商具體步驟

從中國說到

1949年，中共中央提出五一口号后，得到中国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和坚决拥护。图为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发表的通电。



1949年5月，毛泽东在北平双清别墅接见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代表。

为《人民晚报》题写报头^[1]

(1949年5月1日)

人民晚报

人民晚报

毛泽东为《人民晚报》题写的报头。

[1] 《人民晚报》是华北《人民日报》唯一的子报，1949年5月1日创刊，同年7月31日终刊，共出版91期。毛泽东亲自题写了报头。

复徐向前等电^[1]

(1949年5月3日)

- (一) 同意你过一时期去海边适当地点作较长时期之休养。
- (二) 同意解除你在十八兵团的工作并在病愈后改做别项工作。
- (三) 同意以周士第为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为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徐向前并告周士第、罗瑞卿、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华北局、西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致总前委等电^[1]

(1949年5月3日)

总前委转来第八兵团政治委员袁仲贤、司令员陈士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四月三十日电，报告三十五军未经请示擅自处理有关外交事件等，请你们转发华野、中野，各军、各师以资警惕。从三十五军在南京数天内所犯无政府无纪律错误行为看来，你们过去在准备渡江时期，对于外交政策及其他许多事项（例如军队在城市中看戏、看电影、洗澡、坐电车、坐公共汽车等事必须和各界人民同样买票，不许特殊，以及未得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慰劳等）似乎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没有规定，你们应速规定，通令各军一体遵行。如果过去已有规定，三十五军故意违犯，则除检查该军工作做出结论通令各军外，应向各军重申前令，引起注意，不许再有违犯。如果各军对于像外交问题这样重大事件，可以不请示，不报告，由各军各地擅自随意处理，则影响所及，至为危险。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总前委、华东局，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致斯大林电^[1]

(1949年5月3日)

现在我们有两大任务：军事任务与经济任务。解决军事任务，即最后消灭敌人，我们能够完成，因为我们有经验和有必需的力量。但解决第二个任务——并不比第一个任务次要，为前途着眼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很需要你们的帮助。不解决这一经济建设的任务，我们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果实，便不能完成革命。因此，请您满足我们的请求派遣苏联专家给我们。

[1] 这是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的主要内容。

推迟占领杭州上海的时间^[1]

(1949年5月3日)

总前委，华东局并粟、张^[2]：

(一) 总前委陷辰电^[3]悉。(二) 谭王吉^[4]已逼近杭州，不知来得及停止否。杭州城内除周晷^[5]率少数人为后卫尚未退走外，军队、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总前委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等的电报。

[2] 粟、张，指粟裕、张震，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指1949年4月30日辰时总前委给中共中央军委和粟裕、张震的电报。电报说，根据南京经验，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就仓卒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都未作好，加以上海、杭州干部尚在长江北岸，部队本身困难亦多，政策及入城守则尚未深入教育，连续行军作战尚未整理，大批俘虏尚未处置，如不经过10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发生许多问题。因此，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杭州亦以迟一点进为好。为此建议：1. 七兵团应照粟张命令逼近杭州，先以有力部队截断敌之退路，尔后派人与守敌谈判投降，拖延一点时间，以便自己作入城准备。2. 推迟进占浏河时间。3. 华东局、三野前委及七兵团加紧进入上海、杭州的准备，限期完成，以免仓卒被动。

[4] 谭王吉，指谭震林、王建安、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和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5] 周晷，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浙江警备司令部司令。

警察及省政府均已向宁波撤退，城内治安由临时组织的民警维持。在此种情形下，谭王吉似可以不即去占领杭州，暂时由原来已经成立的治安委员会（以救济委员会名义出现）、地方绅士吕公望等维持，以待我方干部之到达。是否可以如此，请粟张决定。（三）上海在辰灰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十天时间作准备工作。在辰灰以后，则应作两方面的计划：甲、即去占领上海。这是假定汤恩伯^[1]在十天内由海上退走，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你们的准备主要地应放在这点上。否则，你们将陷入被动。过去，你们在三个月准备渡江期间，没有抽出一个月时间令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没有作很快占领诸城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吃了亏。现在只好在十天内补足此种缺点。乙、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二十天或一个月再去占领。只要汤恩伯不走，就应如此。占领浏河^[2]的时间亦可推迟。我们前已电告你们，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请粟张注意。

军委
辰江二时

[1]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2] 浏河，镇名，位于江苏太仓县东北。

为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题词^[1]

(1949年5月4日)

团结各界青年，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工作。

毛泽东

[1] 1949年5月4日至10日，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毛泽东为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写的题词。

團結各界青年
參加新民主主義
的建設工作
毛澤東

毛泽东为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题词。

夏曆己丑年三月十四日 第三日發刊

赴唐慰問受傷工友

天津職工代表團

【本報訊】天津職工代表團，於昨日（十三日）下午，由津赴唐，慰問在唐山地震中受傷之職工。代表團由天津各界代表組成，此行旨在慰問災區職工，並視察災情。代表團在唐山受到各界熱烈歡迎，並參觀了災區之各項設施。

人民日報

第二九七號

中華民國廿八年四月十一日 星期一

發起組織市工聯

【本報訊】本市各界，為救濟災區，特發起組織市工聯。此項組織之發起，旨在團結全市職工，共同為救災籌款。發起人包括各界知名人士，並呼籲廣大職工踴躍參加。

慶祝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

【本報訊】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昨日（十日）下午，在重慶隆重開幕。大會由團中央主持，各界青年代表踴躍參加。開幕式在熱烈氣氛中進行，並選出大會主席團。

三大野戰軍待命南渡

從東北到長江糧食民工絡繹於途

【本報訊】三大野戰軍，已奉命待命南渡。從東北到長江，糧食民工絡繹於途，顯示我軍之強大戰鬥力。此舉旨在配合我黨之各項政策，為解放全中國而戰。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電賀全國青年團代表大會

大會昨開預備會議今日正式開幕

【本報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昨日（十日）下午，電賀全國青年團代表大會。電文對大會之召開表示熱烈祝賀，並對全體代表表示慰勉。大會定於今日正式開幕。

1949年5月，《人民日報》关于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报道。



1949年5月，毛泽东、朱德在北京接见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1949年5月，毛泽东来到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间。

在柳亚子《羿楼纪念册》上作题记^[1]

(1949年5月5日)

“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纪念。

[1] 1949年5月5日，刚进北平的毛泽东把柳亚子接到双清别墅叙谈。两位现代诗坛的巨匠，兴致勃勃地谈到古今不少诗人诗作，分手时，毛泽东应柳亚子之请，在他的《羿楼纪念册》上写了这个题记。



1949年5月5日，毛泽东和老朋友、民主人士柳亚子在北平重逢。



诗友

一九六一年一月毛泽东在太平香山双青别墅会见柳亚子先生

癸丑年夏月日杨宏儒画于北京



《诗友》(中国画)

占领吴淞嘉兴等地应注意的问题

(1949年5月6日)

粟、张^[1] (转谭、王、吉^[2])，并告陈、饶，刘、邓^[3]：

(一) 陈饶微电悉。

(二) 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灰以后、辰删^[4]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走（据上海吴文义^[5]几次报告，汤恩伯^[6]正在运走物资），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请粟张以具体部署电告。

(三) 为着占领吴淞，对于昆山、太仓、宝山三城，恐不能不去占领。但嘉定城及昆山城以东之陆家浜、安亭等处，如果可以不

[1] 粟、张，指粟裕、张震，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 谭，指谭启龙，1914年生，江西永新人，当时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政治委员。王、吉，指王建安、吉洛（即姬鹏飞），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陈、饶，指陈毅、饶漱石，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辰删，即5月15日。

[5] 吴文义，即吴克坚，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地下党组织）委员。

[6]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占，则暂时不要去占。

（四）在占领嘉兴以后，应继续占领嘉善、金山、平湖、乍浦、金山卫诸点，但青浦、松江、奉贤等地，暂时不要去占。

（五）此外，谭王吉集团在杭州地区休息数日后，应派一个军至两个军迅速向东，占领杭州、宁波一线及该线以南之奉化、嵊县、新昌、诸暨、义乌等县，然后展开工作。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或者减少他们的捣乱行为。

（六）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你们的准备工作愈快愈好。

（七）请粟、张预先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

(八) 请刘张李^[1]注意保护南京的孙中山陵墓，对守陵人员给以照顾。

军委
辰鱼

[1] 刘，指刘伯承。张李，指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特稿) 宋任穷告陈毅、刘鄃：(一)你院发电(二)内
 请宋任穷即行部署于辰辰以后辰辰以前对司
 先行侦察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
 浦(三)封锁上海敌人逃跑使上海物资不
 致大批运上海逃走(按上海天气炎热报告漏
 恩伯正在运走物资)是日使用陈呼方法解决
 (四)成(五)为(六)请宋任穷以具体部署告(七)
 上海(八)为着位须安插于崑山太湖崑山三城
 恐不特不在此领但嘉善城及崑山城以东之

陈洪亭等如果可以不佔则(九)暂时不要
 去佔(十)佔領(十一)以後在港佔領
 領嘉善金山平湖金山衛金山但龍藏松江
 幸賢等地(十二)暂时不要去佔(十三)此外王
 老集團在杭州地佔領(十四)佔領一線及錢塘
 至两个軍迅速向东佔領(十五)佔領嘉善高茅等
 以南之嘉善(十六)新買諸暨嘉善茅等
 後(十七)佔領(十八)工作(十九)佔領(二十)佔領
 崑山(二十一)不要(二十二)佔領(二十三)佔領
 在佔領(二十四)佔領(二十五)佔領(二十六)佔領
 本家的房屋(二十七)財(二十八)財(二十九)財(三十)財
 資者(三十一)資者(三十二)資者(三十三)資者
 擾亂行為(三十四)擾亂行為(三十五)擾亂行為
 (三十六)佔領吳淞嘉

與並不放棄(三十七)佔領(三十八)佔領(三十九)佔領
 時佔領上海仍須依照我方(四十)上海(四十一)準備工作
 完成佔領(四十二)佔領(四十三)佔領(四十四)佔領
 充分完成準備工作(四十五)佔領(四十六)佔領(四十七)佔領
 佔領(四十八)佔領(四十九)佔領(五十)佔領
 佔領(五十一)佔領(五十二)佔領(五十三)佔領
 佔領(五十四)佔領(五十五)佔領(五十六)佔領
 佔領(五十七)佔領(五十八)佔領(五十九)佔領
 佔領(六十)佔領(六十一)佔領(六十二)佔領
 佔領(六十三)佔領(六十四)佔領(六十五)佔領
 佔領(六十六)佔領(六十七)佔領(六十八)佔領
 佔領(六十九)佔領(七十)佔領(七十一)佔領
 佔領(七十二)佔領(七十三)佔領(七十四)佔領
 佔領(七十五)佔領(七十六)佔領(七十七)佔領
 佔領(七十八)佔領(七十九)佔領(八十)佔領
 佔領(八十一)佔領(八十二)佔領(八十三)佔領
 佔領(八十四)佔領(八十五)佔領(八十六)佔領
 佔領(八十七)佔領(八十八)佔領(八十九)佔領
 佔領(九十)佔領(九十一)佔領(九十二)佔領
 佔領(九十三)佔領(九十四)佔領(九十五)佔領
 佔領(九十六)佔領(九十七)佔領(九十八)佔領
 佔領(九十九)佔領(一百)佔領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占领吴淞嘉兴等地应注意的问题》的手稿。

望刘金轩部向汉中方面行动 切断胡宗南逃路^[1]

(1949年5月8日)

中原局，并告彭、张、赵，西北局：

(一) 我第一野战军(三十五万人)六月间开始举行夺取潼关、西安、宝鸡、汉中、天水及陇南地区之战役，希望我陕南刘金轩^[2]部沿汉水向汉中方面行动，最好能直取汉中区域，切断胡宗南向川北的逃路。(二) 在上述战役期间及战役结束后一个时期内，刘金轩部受彭张赵指挥，请令刘金轩部与彭张赵联络并接受彭张赵命令。(三) 在上述战役完毕之后，西安等处之敌已被歼灭或驱逐，陕南、陕北之联系已经打通，陕南区党政军领导关系应予改变为受西北局、西北政府及西北军区的领导，此种改变之时间大约在七月或八月。在歼灭胡宗南的战役中，陕南区应起配合作用。(四) 刘金轩部的现状、位置及向汉中进取有何困难条件及顺利条件，请你们迅予查明，电告我们及彭张赵。(五) 此电请转发刘金轩及陕南区党委。

中央军委

辰齐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中原局的电报。

[2] 刘金轩，当时任陕南军区司令员。

复粟裕、张震电^[1]

(1949年5月8日)

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逃路封闭是很必要的。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第四野战军应提早渡江 及十三个军的使用问题^[1]

(1949年5月9日)

林、萧：

(一) 你们主力已越过陇海线，快要到湖北境内了。根据长江北岸地区的粮食状况，大军久驻困难必多。又据白崇禧^[2]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3]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早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方法。根据华野、中野从渡江（四月二十一日）至占领杭州、上饶一线并歼敌十二万人只需要两个星期的经验，你们从渡江至占领吉安、攸县、湘乡一线，大约有四个星期左右即够。如果你们主力能从六月十号左右开始渡江，则七月十号或略迟一点即可达上述一线，你们兵力展开在广大地区之后，粮食问题就不感困难了。(二) 你们十三个军的使用问题，现在就宜大体确定。我们意见，湖北一个军，江西两个军，湖南三个军，共六个军可以固定下来。其余七个军及曾生纵队，应全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第一参谋长萧克的电报。

[2]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3] 衡州，即湖南衡阳。

部推进至以郴州为中心的区域，并准备在该区域与白崇禧打一仗（应估计白崇禧部约二十五万人左右，可能在该区域和我军作战）。如果这七个军七月中旬前后能到攸县、湘乡之线，则八月中旬或下旬即可集中于郴州区域休整一个月，九月中旬或下旬以后即可向两广前进。（三）据曾生称，奉你们之命率一个国民党师，辰灰从北平出发，要巳灰才能集中开封，需要一个月时间与广纵合编，要午灰左右才能由陇海线南进。请你们指示曾生，该部应争取于八月底九月初到达郴州地区，方能不失时机和主力一道向两广前进。（四）以上各点提供你们考虑。

军委

辰佳

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问题

(1949年5月10日)

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

辰齐^[1]电悉。

(一) 黄华^[2]可以与司徒雷登^[3]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

(二) 见面时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4]。

(三) 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

[1] 辰齐，即5月8日。

[2] 黄华，1913年生，河北磁县人，当时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

[3] 司徒雷登，1946年7月开始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留在南京观望。

[4] 指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发言人李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声明严厉谴责紫石英号等英国军舰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炮击人民解放军的暴行，同时表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

（四）与司徒雷登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

（六）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七）对于傅泾波^[1]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中央
辰灰

[1] 傅泾波，当时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



1949年5月，毛泽东在香山。

复总前委等电^[1]

(1949年5月10日)

同意你们对南昌的处置，即如果南昌敌逃走，可由陈赓率兵直入城维持秩序，俟林罗部队过江后即行移交。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总前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林彪、罗荣桓、萧克，中原局电的主要内容。

致栗裕、张震等电^[1]

(1949年5月10日)

请告现在杭州养病的何柱国^[2]将军，他给毛、朱、周、彭的电报收到了，叫他安心养病。你们对何应予以保护。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栗裕、张震转在杭州的谭启龙、王建安、吉洛电的主要内容。

[2] 何柱国，曾任国民党军东北行营参谋长，后双目失明，此时正在杭州治疗眼疾。

致东北局等电^[1]

(1949年5月14日)

毛主席向他指出，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但抗联同志在过去的工作中亦和党内其他各地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一样，是难免有缺点和错误的，应该着重检讨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借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以便今后更好地为党工作。上述估计，适用于周保中同志及其他一切一贯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抗联同志。我们认为应根据上述估计对周保中同志予以积极的帮助，启发他去掉某些包袱和片面性，这个同志会有更大的进步。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通报毛泽东、朱德和周保中谈话精神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并告林彪、罗荣桓、谭政，中原局电的主要内容。

为张瑞岐题词^[1]

(1949年5月16日)

赠张瑞岐同志：班长天下第一。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

毛泽东于香山

[1] 张瑞岐，清涧双庙河公社下张家山大队人，转战陕北时，任毛泽东警卫班班长。1949年5月16日，张瑞岐返回陕北时，毛泽东为其题词：“赠张瑞岐同志：班长天下第一。1949年5月16日 毛泽东于香山”。张瑞岐返乡后在农村生活，过得很艰苦。他又想在地方参加工作，于是，他设法把毛泽东的题词作了改动，改成如下内容：“回到陕北继续工作，永远忠于人民的事业。1949年5月16日 毛泽东于香山”。

复林彪、萧克等电^[1]

(1949年5月16日)

铣十三时电^[2]悉。四十三军渡江后不必急于向九江、南昌前进，等候接收及工作的各项干部大体到齐，然后前进较为适宜。九江、南昌既有桂系两个军驻守，我军又不马上前进，该两处秩序似不至大乱。因此，请刘、张、李令陈赓注意。只要南昌有敌军驻守，陈兵团亦不要进占南昌，只在南昌敌人确已撤退，该兵团才去占领，维持秩序。在南昌敌军未撤的情况下，陈兵团亦不要过于迫近和威胁南昌。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萧克并告华东局，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2] 林彪、萧克5月16日13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请示四十三军渡江以后，是直接向九江、南昌前进，还是暂时停止蕪春以南等候接收南昌的干部到后再进南昌、九江。

致林彪、罗荣桓、萧克等电^[1]

(1949年5月17日)

据刘伯承、邓小平等十六日电，南浔线上之桂敌已开始沿浔水及赣江西岸向南撤退。刘、邓已令陈赓兵团两个军的主力出丰城、高安之线，准备在赣江两岸兜截南撤之敌，配合十二兵团之作战。南浔线上之敌既已向南向西撤退，陈赓部已出赣西截敌，我们昨电叫你们令四十三军等齐干部然后前进，已不适用。你们应令四十三军不等干部到齐，即向南浔路前进，协同陈赓兵团歼灭逃敌。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萧克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华东局、中原局电的主要内容。

对何应钦四月三十日部署之对策^[1]

(1949年5月17日)

林、萧，并告中原局：

根据何应钦^[2]卯三十日部署（此部署估计是事先取得白崇禧^[3]同意的），分为左中右三路：甲、左路鄂西方面受我攻击时，以一部由长江北岸向大巴山撤退，主力由长江南岸退守鄂西，以四川为后方，确保川、黔门户等语。你们可以三个军由宜沙^[4]渡江，以两个军向宝庆^[5]推进，留一个军在常德、益阳一带，而以江汉军区及王宏坤^[6]部主力位于宜沙地区，以防鄂西敌军出扰。乙、中路粤汉线^[7]方面敌在洞庭湖、汨罗江以北，长沙、衡阳以东地区筑工阻我，最后固守大庾岭及湘桂边界，确保两广安全等语。在此方面你们可使用八个军，除留一个军位于武汉、岳州^[8]线，一个军位于岳州、株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第一参谋长萧克的电报。

[2]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

[3]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4] 宜沙，指湖北宜昌和沙市。

[5] 宝庆，即湖南邵阳。

[6] 王宏坤，当时任桐柏军区司令员。

[7] 粤汉线，指广州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8] 岳州，即湖南岳阳。

州线，一个军位于株洲、衡州^[1]线外，可以五个军向郴州推进，协同西路两个军歼击白崇禧于湘粤桂边境，并准备向两广前进。丙、敌在其右路江西方面，据称以最有力部队协同南昌指挥所作战，其目的是确保赣江东西两侧地区，屏障粤汉路之安全等语。似此在南浔路^[2]上，敌似不准备和我军打硬仗，你们可以预定经营江西的两个军向该区前进。此两个军可择各军中战斗力较弱者，而不要使用战力较强，如遇作战，可要求陈赓兵团^[3]协助之。位于武汉至衡阳线上之三个军，选择两个较弱者、一个较强即可。以上意见提供你们考虑，如此部署我军主力可以集中使用，向湘粤桂边境推进之七个军不致分散，利于寻歼白部主力。但有一点值得研究，即近闻白部第四十八军（桂系主力之一）、第四十六军（两年前莱芜战役全歼后补充者，战力弱，其一四七师^[4]被二野最近歼于皖南）位于南浔线，此两军将来可能向大庾岭撤退。你们可以考虑派一个军，沿赣江尾该敌向大庾岭方向前进，该军即位于大庾、南雄、始兴地区，协同粤赣湘边区游击纵队（区党委书记兼纵队司令员林平）在该区活动，尔后协同主力取广州。如桂系主力确已分散（粤汉路上似只有第七军有顽强战斗力，其余都是很弱的或较弱的），这种部署是可以考虑的。如此，则应使用三个军出江西，其中两个军固定其任务为经营江西，一个军准备尾敌出南、始。经湖南向湘粤桂边境寻歼白部主力者为六个军，而不是七个军。此外六月份你们即可能占领岳州、常德、长沙、株洲、萍乡、九江、南昌、吉安、袁州，

[1] 衡州，即湖南衡阳。

[2] 南浔路，指南昌至九江（旧称浔阳）的铁路，即今向九线。

[3] 陈赓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

[4] 似应为一七四师。

甚至可能占衡州、宝庆，你们须迅速集中尚未到齐的干部，陈正人^[1]等仍以经武汉去江西为适宜。

军委

辰篠

[1] 陈正人，当时任东北军区吉林军事部政治委员，此时准备赴江西任职。



1949年5月，毛泽东在香山。

电慰国民党起义伞兵^[1]

(1949年5月18日)

刘农骏团长、姜健副团长和全体官兵们：

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

[1] 前国民党军伞兵第三团起义官兵，在4月18日曾经发电报给毛泽东和朱德致敬。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复国民党起义伞兵的慰勉电。

致起义海军官兵电^[1]

(1949年5月18日)

林遵将军、邵仑舰长，李宝英舰长、吴建安舰长、张家宝舰长、宋继宏舰长、易元方舰长、郭秉衡舰长、韩廷枫舰长、陈务笃舰长、杜澄深队长、张汝樵队长和第二舰队的全体官兵们：

庆祝你们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你们率领二十五艘舰艇，毅然脱离反动阵营，参加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来，这是值得全国人民热烈欢迎的行动。在巡洋舰重庆号于二月间起义并被国民党反动派于三月间炸毁以后，四月间又有你们的大规模起义，可见中国爱国人民建设自己的海军和海防的伟大意志，不是任何反动残余所能阻止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军技术，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光明前途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

[1] 1949年4月，原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等率全体官兵举行起义。毛泽东、朱德致电勉慰。

复郭沫若、许德珩等二十九人电^[1]

(1949年5月18日)

先生等致力国际和平民主事业载誉归来，极为欣慰。请在沈阳稍候，俟马寅老^[2]等到后同车返平，俾北平人民得作盛大欢迎，以壮世界和平阵容，并慰贤劳。

[1] 这是毛泽东复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归来到达沈阳的中国代表团郭沫若、许德珩、李德全等二十九人电的主要内容。

[2] 马寅老，指马寅初，当时为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致总前委等电^[1]

(1949年5月19日)

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准备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以于辰有^[2]前后开始攻城？攻城时，似应照粟、张意见，先歼苏州河南及南市之敌，再歼苏州河北及吴淞之敌。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电的主要内容。

[2] 辰有，即5月25日。

第四野战军三个军在江西的作战部署^[1]

(1949年5月19日)

林、萧，并刘、陈、邓、饶^[2]：

四野派出江西的三个军，提议作如下部署：（一）一个军位于九江、南昌、袁州^[3]、吉安区域，该军四个师即以上述四城为中心，分布于四城及附近地区，在消灭敌人战斗结束之后即担任四城卫戍及铁路守备，并逐步向邻近各县开展工作，逐步占领各县。二野在九江部队仅有一个营，刘邓已令该营俟你们部队到后，即行移交，故你们应即派一部兵力去接收九江。此外，萍乡及安源煤矿历来和长沙、武汉联系密切，而和南昌联系不密切，故萍、安接收及卫戍似以由长沙方面派人派队去办较为方便，将来萍、安地方行政仍归江西，产业管理则归湘鄂系统，是否可以如此，请你们酌定。（二）第二个军位于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之线（以上诸县均不含）以南之赣南地区，以赣州为中心，分布赣南各县开展工作，并占领各县。（三）第三个军不担任江西工作，只走江西过路，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第一参谋长萧克等的电报。

[2] 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陈，指陈毅，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3] 袁州，即江西宜春。

该军第一步进至临江^[1]、袁州区域待命，依情况或经大庾岭出韶州，或经上犹、崇义出郴州，或经萍乡、攸县出郴州，待该军到达临江、袁州线后再作决定。（四）二野、四野的分界线为鄱阳湖，进贤、临川、崇仁、宜黄、南城、黎川线上诸县属二野。在作战时期，二野、四野在该线以西配合作战，作战结束后，二野在该线以西部队暂在该线以西地区就地休整待命，非有军委命令不要撤回该线以东，但不担任地方工作。

军委

辰皓酉

[1] 临江，镇名，位于江西清江县西部。

总攻上海的时间和步骤^[1]

(1949年5月20日)

粟、张，并告总前委及中指^[2]：

(一) 据邓饶陈^[3]电，接收上海的准备作业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二) 为使侦察及兵力配备臻于完善起见，总攻时间似以择在辰有至辰世之间为宜，亦可推迟至巳东左右，如何适当，由你们决定。(三) 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四) 攻击兵力必须充分，如觉兵力不足，须调齐兵力然后攻击。(五) 攻击前必须作战役和战术上的充分准备。

军委
辰芻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和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中指，似指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指挥部。

[3]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陈，指陈毅，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对外国军舰轮船 进入黄浦江的处理办法

(1949年5月20日)

粟、张，并告总前委，刘、张、李^[1]：

皓未、号午两电^[2]均悉。

(一) 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

(二) 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

(三) 中国及外国轮船为敌军装载军队及物资出入黄浦江者，亦应攻击之。

(四) 中国及外国轮船在上海停泊未动者，或得我方同意开行

[1] 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2] 指1949年5月19日未时和20日午时粟裕、张震给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的电报。19日电说，18日下午有美舰三艘带国民党轮船六艘及风船等开出吴淞，今后何种船只可以炮击，请指示。20日电报告在高桥以西至林家宅沿江之线有敌舰五艘，其中两艘挂外国旗，三艘无旗，向我阵地猛烈炮击，以掩护敌军对我阵地的出击。因五舰靠在一起，怕打错，已严令不准打。为此给我阵地坚守增加极大困难，请示如何处理。

者，准其停泊或开行，并予以保护。

（五）为了对付外国军舰的干涉，你们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实力准备，即要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力量歼灭或驱逐之，如感兵力或炮火不足，应速从他处抽调补足。

（六）号午电说有二舰挂外国旗，请查明系挂何国旗，以便公布。嗣后，凡关外舰事件，应将详情查明具报。

军委

号亥

致林彪、萧克、谭政、陶铸电^[1]

(1949年5月20日)

请转发你们各军、师引起注意，正确地处理四野与南方游击部队会师问题，是为至要。

[1] 5月20日，收到第二野战军前委5月15日关于第三兵团过江部队与皖南游击队会师时发生误会的情况报告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萧克、谭政、陶铸电，转去这一报告。这是电报的主要内容。谭政、陶铸，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副主任。

致华中局等电^[1]

(1949年5月21日)

请你们充分注意抓紧对于新占各城市的政策指导，不要过了很久才去检查和指导。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中局，林彪、罗荣桓、谭政电的主要内容。

给柳亚子^[1]的信

(1949年5月21日)

亚子先生：

各信并大作均收敬悉，甚谢！惠我琼瑶，岂有讨厌之理。江青携小女去东北治病去了，黄女士^[2]的信已代收，我的秘书并已和黄女士通电话，料可获得居处。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江苏虚衔，亦似以不挂为宜，挂了于己于人不见得有好处。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得太冷否？某同志妄评大著，查有实据，我亦不以为然。希望先生出以宽大政策，今后和他们相处可能好些。在主政者方面则应进行教导，以期“醉尉夜行”^[3]之事不再发生。附带奉告一个消息，近获某公诗云“射虎将军右北平，只今乘醉夜难行，芦沟未落登埤月，易水还流击

[1] 柳亚子，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2] 即黄波拉。1949年年初她为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仓促离开上海，到达北平后食宿等发生困难。为此柳亚子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她以帮助。毛泽东即派秘书对她一家作了安排。

[3] “醉尉夜行”的故事，出自《史记·李将军列传》。原文为：“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筑声”，英雄所见，略有不同，亦所遭者异耳。孙先生衣冠冢^[1]看守诸人已有安顿，生事当不致太困难，此事感谢先生的指教。率复不尽，敬颂兴居佳胜！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一日

李子出，各报大作均以激其情绪
 点我渡强，言词威之理。江青携小
 女去东北治病去了，黄女士的信已代收，寄
 的必为差误，黄女士通电话，料与藏身吾党。
 周史波事尚未共此友商量，惟在组台时
 以三心二意，程前设立。第一个人不生禁戒
 先生属才七项工作，甚恐精力不逮于江
 翁若欲，似亦以不批为**重**，持了于已以
 不及以育好受。此两事影射于渡冷所
 好在夏天不觉得大冷否，某可感
 大若，查李金校，亦不以不然，病能生

出以竟大效果，**江青**他们如系可改好些。
 在波史旁而别在波史旁，以不致受时相
 之事不再发生。附带有一个消息：江青
 某公诗云：舟行相事态，北平只个解
 批到，董济未落空，坤月男尔已法解
 筑声，英雄所见，略有不同，亦所遭者异耳。
 孙先生衣冠冢看守诸人已有安顿，生事当不致太困难，此事感谢先生的指教。率复不尽，敬颂兴居佳胜！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致柳亚子信的手稿。

[1] 指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的孙中山衣冠冢。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杭州市委重组文件 致华中局等电

(1949年5月21日)

华中局，林、罗、谭、陶^[1]：

兹将杭州市委重组的文件转发你们，请采取此项经验解决华中各城市的组织问题。

中央
辰马

[1] 林、罗、谭、陶，指林彪、罗荣桓、谭政、陶铸，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副主任。

林楓等呈請林楓

中央林業學院，杭州林業學院，組組科
林楓等請採此項林業學院各城市組組科
組組科

中區NO. 58	華東局	4展NO. 7180
附註	已批.A.B.C.D.E.F. 中組政研系	
等級	A	城工 1949.5.1
關於成立新杭州市委決定		

華東局：

關於結束前杭州市委工作與成立新杭州市委的決定如下請批示。

(一)省委第二次會議听了林楓同志關於前杭州市委工作報告，一致認為前杭州市委在上海黨的領導下完成了黨給予的光榮任務，保持了黨的革命旗幟與黨的組織並在工廠、學校、機關部門中建立了黨的基礎。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中局等电的手稿。

致香港分局电^[1]

(1949年5月23日)

人民解放军秋季或冬季可能攻占两广，请你们通知所属各区，在夏秋两季有步骤地加强工作，特别是加强广州及其他城市的工作，着重工厂及学校的工作，各游击区必须加强自己的活动，准备迎接解放军主力的到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香港分局电的主要内容。

致华中局、西北局电^[1]

(1949年5月23日)

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望抓紧指导，不可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转发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组织与本地党组织会师问题的经验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中局、西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给华东局并告华中局、 西北局等电上加写的一段话

(1949年5月23日)

据平、津经验，接管时对于企业物资（工厂出品及企业已交政府的仓库存货）不要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要当作企业的货品（本来是企业的货品），卖出钱来，归企业使用，否则企业失掉这批资本之后继续开工十分困难，势必又要政府投资给企业才能开工。此事望通令各城市注意。

关于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

(1949年5月23日)

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并告林、罗，彭、贺^[1]：

(一) 粟张养午电^[2]悉。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二) 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3]。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三) 四野现有两个军渡江，尚有六个军已至陇海、长江之间，

[1] 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和第一政治委员。彭、贺，指彭德怀、贺龙，当时分别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西北军区司令员。

[2] 指粟裕、张震1949年5月22日午时关于请示入闽部队何时出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

[3] 康，指西康省，1955年撤销，当时辖区为今四川省西部、西藏自治区东部。

约于六月上旬可渡江，另有四个军正由新乡、安阳地区出发，约六月中旬可以渡江。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1]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一野（四个兵团三十五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四）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如果二野能于八月一日左右开动或更早一点开动，则上述任务是可能完成的。但此项任务在二野内部暂时不要下达，因为中央对此尚是一种拟议，最后决定要待上海、福州占领之后。

（五）胡宗南^[2]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3]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请林、罗即令曾泽生军^[4]早日出动南下。该军是否已从热河^[5]出发，盼林、罗查告。

[1]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3]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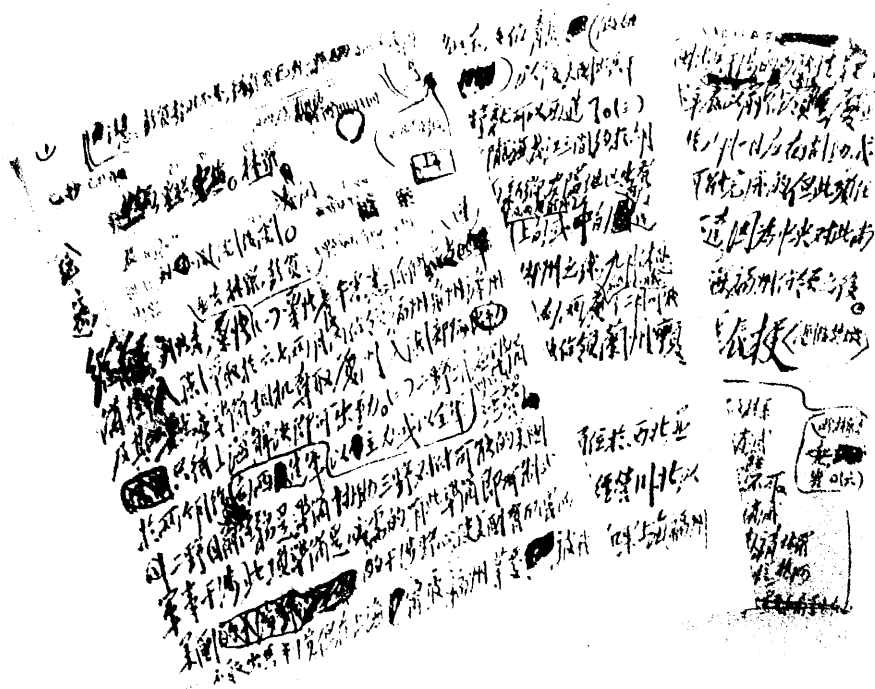
[4] 曾泽生军，指曾泽生任军长的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

[5] 热河，即热河省。

(六) 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军委

辰梗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的手稿。

为《长江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5月23日)

长江日报

长江日报

毛泽东为《长江日报》题写的报头。

[1] 《长江日报》于1949年5月23日创刊，由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办，报头由毛泽东题写。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成立后，为华中局（中南局）机关报兼武汉市委和湖北省委的机关报。

对张轸部按起义待遇加以改编^[1]

(1949年5月25日)

华中局，并告萧、陈^[2]：

(一) 萧陈二十二日电、林萧^[3]二十三日电均悉。(二) 张轸部^[4]应照曾泽生、吴化文^[5]那样，以起义部队待遇。(三) 目前如金口^[6]、嘉鱼一带适宜，即可就地整训听候改编；如金口、嘉鱼一带无粮，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令其开至江汉军区就粮，并便利争取及改编。(四) 张轸和我们接洽已久，其部队是河南保安部队编成的，是否还有一部分湖北地方武装在内不明，此种部队集中归我改编是对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电报。

[2] 萧、陈，指萧劲光、陈伯钧，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一副司令员。

[3] 林萧，指林彪、萧克，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和第一参谋长。

[4] 张轸部，指原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兵团司令官张轸。该部于1949年5月15日在湖北武昌以南的贺胜桥、金口一带起义。

[5] 曾泽生，原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兼第六十军军长。1948年10月于长春率部起义，1949年1月该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任军长。吴化文，原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1948年9月于济南率部起义，同年10月该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吴化文任军长。

[6] 金口，镇名，位于湖北武昌县西部。

我有利的，故应对张轸及其部属采取欢迎态度。此点请通知湖北地方。（五）张部目前短期暂用原来名义，由你们召集李先念、王宏坤、王树声^[1]诸同志会商，由十纵、十二纵抽出一、二个师与张轸合编为一个军，张轸为军长，以我们一人为副军长，按照改造曾泽生、吴化文等部的方法加以改造。（六）张部粮食、经费照我军待遇。（七）以上各点由华中局考虑决定实行。（八）请萧陈告知张轸，他给中央电报已收到，他的行动我们认为满意，希望他告诫部属坚决站在人民方面，将所部改造为人民解放军。并问张轸他与程潜^[2]是否有电台联系，或有其他通讯方法叫程潜率部起义，配合我军行动。

军委
辰有

[1] 李先念、王宏坤、王树声，当时分别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副司令员和第二副司令员。

[2] 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

歼灭桂系主力的作战部署^[1]

(1949年5月25日)

林、萧、赵、聂，并刘、张、李，总前委：

(一) 林萧赵聂二十四日电^[2]即转刘张李知照，请刘张李迅即电知陈赓兵团^[3]暂时不渡赣江，在丰城、临江^[4]、新干、峡江之线收集船只，完成渡江准备，待桂军七师深入宜春一带后，突然向敌后方挺进，断敌退路，与四野部队配合歼敌或抓住敌人。(二) 伯承陈赓两电台均应与林彪电台通报。(三) 二野应准备以四个军或三个军由陈赓统率，归林罗^[5]指挥，第一步在宜春一带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主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一参谋长萧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和副参谋长聂鹤亭等的电报。

[2] 指1949年5月24日林彪、萧克、赵尔陆、聂鹤亭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敌知我四野渡江部队共只两个军，拟对我军采取积极动作。我军应极力吸引敌军于长沙东北与岳州、南昌之间一带，争取在我军主力到达后，突然断其退路，力求部分歼敌于长沙以东、南昌以西地区。据此，建议陈赓兵团目前暂不渡赣江，待敌已深入时，突然向敌后方挺进，与我四野部队配合歼灭敌人或抓住敌人。

[3] 陈赓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

[4] 临江，镇名，位于江西清江县西部。

[5] 林，指林彪。罗，指罗荣桓，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力，第二步待命入湘抄击白崇禧^[1]后路，尔后即待命入川。

军委
辰有

[1]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致萧劲光、陈伯钧等电^[1]

(1949年5月25日)

(一) 四十七军一五三师入武昌纪律甚好，应予奖励。(二) 请林、罗考虑待你们主力及炮兵渡江的时候，在武汉三镇举行一次军容整齐的盛大游行，例如北平入城式那样，借以振奋人心。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萧劲光、陈伯钧、韩先楚、唐天际、解方、潘朔端并林彪、萧克电的主要内容。萧劲光、陈伯钧、韩先楚、唐天际、解方、潘朔端，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副参谋长。

致各野战军电^[1]

(1949年5月25日)

敌近日业已按此命令在某些地区执行。此种情况对于我军聚歼敌军有生力量之要求，甚为有利。望各野战军注意集中兵力，妥为部署，力求聚歼当面匪军，而后追击前进，是为至要。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通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何应钦5月14日要求国民党军停止退却准备抵抗的命令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各野战军电的主要内容。

同意第一野战军暂时停止前进^[1]

(1949年5月26日)

彭、张、赵：

你们攻占凤翔等地，歼敌一部后，暂时停止前进的处置是对的。目前胡马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十八十九两兵团，尚须三、四星期以后，才能到达西府^[2]区域。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仅在一种情况下，即胡军向汉中退却，胡马两军又确实不能联合（即马部确实不威胁我侧翼），你们才可以不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即向汉中方向追击胡军。你们是否亦是这样计算的，彭是否已到野司，盼告。

军委
辰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的电报。

[2] 西府，指陕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古称凤翔府。

彭德怀 你们改向凤翔等地进攻，
 停止前进的意图是对的，目前胡匪两路
 在长武、宝麟一线受阻，
 进攻，而我十八、十九两兵团，尚须^{等待}就绪，
 才敢到这一带区域，依你们现有力量，可以
 打胡匪，但不能同时打高，而高同时打马，必
 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到到或至十六兵团
 到到，方能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

耐心等待，
 十八、十九两兵团，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
 兵团到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胡匪基地，
 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匪不走，仗总打不的，
 仅在一情况下，即胡军向汉中方向移动，
 两军又确实不能联合（即西部不解放，我侧翼）
 你们可以不等十八、十九两兵团，到到，向汉中
 方向追击胡军。军委长符

你们原不是这样计算的，
 彭是原计划，
 这样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同意第一野战军暂时停止前进》的手稿。

通报平津接收企业的经验

(1949年5月26日)

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南京市委：

据平、津经验，我占城市初期，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经营，则接收人员存“五日京兆”之心，无心经营，浪费物资，对企业生产损失甚大。因此，接收初期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即应尽可能选择那些可以付托他们经营的人们，嘱咐他们不但要接好，而且要管好，使生产不受损失，此点务请注意。此外，不可把企业物资（存厂的或已交给国民党政府、政府尚未付价的都在内）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如果把企业物资（纱布、被服及其他制造品）当作战利品消耗掉，则政府势必要向企业付价，企业才能继续开工，否则企业即将停工，无力继续生产。此点亦是平、津的经验，前已告华东局，现再重说一遍，请你们转知所属注意。

中央
辰宥

转属中局，西北局，南满局。平津接收企业
 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員不
 不願經營，待接收之後再派人經
 營則接收五周來之中心財產損失甚
 大，因此接收初期派去接收企業的人員
 人即應盡可能選擇那些可靠的人員
 的人員，否則他們不但接收而且
 要管好使不致受損失，此點務請注意。此外

不可把企業物資(存廠的或已交給國民政府
 政府的都在內)當作戰利品沒收分配
 消耗掉，如果把企業物資(紡布被服)及
 其他製造品)當作戰利品消耗掉則政府勢必
 要向企業付價，企業才能繼續開工，否則企業
 即將停止生產。此點亦是平津的經
 驗，前已告華東局，現再重說一遍，請
 注意。中央長官
 轉知所屬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报平津接收企业的经验》的手稿。

运筹对策防备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

(1949年5月28日)

彭、贺，刘、邓，陈、饶、粟，林、罗^[1]：

(一) 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征。例如美国正在和英、法等十二国会商统一对华政策，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留在南京的各国大使准备撤走，英国在香港增兵，广州国民党亦有某些高兴表示等事，可以看出这种象征。将来是否会演成干涉的事实，目前还不能断定。但我们应当运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

(二) 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这方面，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站在我们方面，极为重要。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

(三) 关于预防美帝协同国民党向我后方袭扰，除已令杨成武兵

[1] 彭、贺，指彭德怀、贺龙，当时分别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西北军区司令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饶、粟，指陈毅、饶漱石、粟裕，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和第一政治委员。

团¹¹及钟赤兵炮纵¹²在秦皇岛、塘沽布防外，特作如下部署：甲、杨得志兵团¹³和十八兵团一道继续向凤翔方向前进，准备在各兵团会合后，歼灭胡、马¹⁴在陕甘边境上的主力。如此战能达目的，而华北情况又有需要，则准备将杨得志兵团留在宝鸡、凤翔区域待机，同时尽可能赶快修复洛阳、宝鸡段铁路，以利运输。乙、林罗留一个军位于河南，平时担任剿匪，有事增援开华北。丙、陈饶粟以一个军附必要数目的炮兵开青岛附近，待命夺取青岛，尔后即任青岛守卫。南京、镇江、苏州区域已有两个军，浙江区域已有三个军，甚好。吴淞、上海区域应有七个军，特别注意加强吴淞、江阴两区的炮台设备。以上各军，除担任城市守备及乡村剿匪任务者外，均应迅即部署整训。攻取福建的兵力，不要超过两个军。丁、二野全军除一部待命渡赣江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于袁水流域外，其余在六、七两月内，位于现地主要进行整训，附带帮助剿匪，待两个月后，看情况再定行动方针。

(四) 以上各项，你们有何意见，望告。

军委
辰俭

[1] 杨成武兵团，指杨成武任司令员的直属中共中央军委指挥的第二十兵团。

[2] 钟赤兵炮纵，原为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当时是万毅任司令员、钟赤兵任政治委员的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

[3] 杨得志兵团，指杨得志任司令员的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

[4]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马，指马步芳、马鸿逵。马步芳（1903—1975），甘肃河州（今临夏）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马鸿逵（1892—1970），甘肃河州（今临夏）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复林彪等电^[1]

(1949年5月28日)

同意邓子恢兼任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第四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以利工作。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并告华中局、华东局、一野、二野电的主要内容。

占领粤桂川滇黔五省所面临的 两个问题须立即去办^[1]

(1949年5月28日)

(一) 不但华东方面急需大量人民票^[2]，这是应当迅速支付的；华中方面要求增加人民票的电报估计不久也会来，这是应当预作准备的；而且必须准备今年九月以后占领粤桂川滇黔五省所需要的人民票，也需立即开始筹办。(二) 九月份以后占领粤桂川滇黔五省所需要的干部以三万名计算，也须马上做出计划，通知各区遵办。

[1] 邓小平、饶漱石、陈毅、曾山23日致电中央及中财部请求拨300亿元人民票应急。毛泽东将此电报批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请他们商酌相关问题，这是批示中关于占领粤桂川滇黔五省的两大问题。曾山，当时任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副市长。

[2] 人民票，这里是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致罗荣桓、黄克诚电^[1]

(1949年5月28日)

华中局已同意中央意见，你们应当休养数月。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罗荣桓、黄克诚电的主要内容。

十三兵团进击宋希濂部的两个方案^[1]

(1949年5月29日)

林、萧、赵：

关于十三兵团向宋希濂^[2]部进击及渡江的时机值得考虑，对此问题有两种方案：一种是不待东路集中南浔线，中路集中鄂南，十三兵团即向宋部进击并渡江占领常德。其好处是出白崇禧^[3]意料之外，突然攻其一路（白崇禧似料我军要待三路到齐然后攻击，而我军目前尚未到齐），可能将宋希濂部大部歼灭；其坏处是我军占常德后，敌中东两路之侧后已受威胁，可能迅速退至衡州^[4]。另一方案，十三兵团暂不向宋部攻击，待我中东两路到齐，或待中路（鄂南）到齐，然后三路或两路同时攻击。其好处是可能将三路或两路之敌同时歼灭，然后齐头并进向南追击；其坏处是白崇禧看到我军三路都到齐了，可能三路同时撤退，使我失去歼灭敌人的机会。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同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林彪和萧克的电报中曾指出，宋希濂部“战力较弱，你们以三个军攻击是足够的”。应“力求歼灭该敌主力，尽可能不使该敌主力退入鄂西及湘西山区”。

[2] 宋希濂，当时任国民党军湘鄂边绥靖区司令官。

[3]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4] 衡州，即湖南衡阳。

上两案究以何者为宜，请考虑见复。

军委

二十九日二十二时

祝上海解放^[1]

(1949年5月29日)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欢呼。这是因为，第一，上海是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第二，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上海的命运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在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冒险家们曾经把上海看成是自己的乐园，在上海制造了种种盗窃、屠杀、侮辱和愚弄中国人民的罪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个走狗，中国封建主义的最后一个暴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蒋介石，就是由上海的流氓组织起家，因为造成了上海工人的大流血得到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喝采，建立起他的以上海买办经济为基础的二十二年的黑暗统治，并且直到最后，还以屠杀和破坏来向上海人民告别的。在另一方面，上海又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以野蛮的白色恐

[1] 这是新华社的社论。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

上海的解放当然要加速完成中国内外关系的一系列根本变化，这些根本变化当然要使新中国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光明。在上海、南京、杭州、九江、南昌、汉口、西安等枢纽城市解放以后，中国的反革命已经被打碎成为零星的小股，逃入边远的地区，而这些仓卒筑成的反革命巢穴也决不能维持多久。中国在短期间虽然还必须负着战争的最后阶段的负担，但是生产建设已经成为一天比一天重要的课题。上海和其他中国大城市在以前曾经不能够顺利地发展生产，并且常常成为生产的障碍物，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革命的敌人恐吓中国人民说：你们不敢占领上海，因为你们无法管理它，除非你们向我们屈服。这些大言不惭的人们并且设定种种的图案来安慰自己和互相安慰。但是现在不是他们在赌博场中继续赢钱的时候了。他们在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再三失败，如果他们不相信中国人民能够把上海管理得好，那么他们只能再增加一次失败。上海是一个生产的城市和革命的城市，在反革命统治被捣毁以后，这个特征将要显出伟大的威力。上海的几十万工人，几十万其他劳动人民，几十万知识分子，和有爱国心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是第一次不受压迫地联合在一起。上海和全国的其他城市，和全国的乡村，现在也是第一次不受压迫地联结在一起。尽管因为战争，因为敌人施行了长期的破坏，并将以隐蔽的方法继续破坏，还因为缺少成熟的经验，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各种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的困难，我们决不可轻视这些困难，谁要是轻视这些困难，因而不采取认真想法克服这些困难的步骤，我们就会要犯极大的错误；但是

这些困难在上海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在全国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没有不可以依靠自己而克服的。

上海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所以上海的解放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世界性的胜利。对于解放了的上海和解放了的中国，世界上的不同人物表示了不同的反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有益的，因为这使中国人民可以很容易地认识他们的面孔。中国人民对于国际事务早已宣布了鲜明的立场，其最近一次便是四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的声明。李涛将军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之上，首先是各外国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将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个声明是公平合理的。毫无疑问，中国人民是支持这个声明的立场的。中国人民愿意在上海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和任何外国人民友好合作，但是若干外国的政府不但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和国民党反动派站在一起反对中国人民，那么，人们之认为这些政府是采取了一种对于中国人民的不友善态度，当然没有什么奇怪。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它们就应当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图为人民解放军在上海街头露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的宣传车。

复第二野战军前委电^[1]

(1949年5月30日)

一、行动方针须依辰俭电待两个月后，在确无外国武装干涉条件下才能最后确定。目前你们主要注意力仍须放在现领任务之执行上面，以免分散注意，使现领任务执行不好。

二、兵员、牲口不足之数，除华东局能解决者外，原则上不补，到四川以后自行解决。估计黔、川没有严重的作战，减员不会很大，占领长江上游后可以就地筹补，从长解决。

三、出动兵力须视情况决定，如无外国干涉，自可全军出动。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进军西南需解决的几个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第二野战军前委并告总前委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认真对待“左”倾错误的通知^[1]

(1949年5月31日)

兹将中央给东北局辰世电及其附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山东分局，平、津、济、沪、宁、汉诸市委，各野战军前委的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 致东北局电^[1]

(1949年5月31日)

东北局：

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至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现特将邹大鹏来信电告你们，望东北局召集会议，要洛甫同志参加并发表意见，然后将东北局讨论的结果电告中央。最近少奇同志到天津巡视，发现我们在天津的负责同志完全不理资本家，有些干部则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贸易公司在原料及市场方面统制，不给资本家的生产以应有的照顾；税收机关对私人生产亦未给以应有的照顾；在劳资关系上工人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左的行动，未用坚决的办法去纠正；强令资本家开工，但资本家在开工后的各种实际困难未帮助资本家去克服；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电报。此外，中央也将此电转发给华北局、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山东分局、平津济沪宁汉诸市委、各野战军前委。

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有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因为我们顾虑到在党内存在的上述偏向，故我们尚未批准印发《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方针提纲》这个文件，我们认为在这个文件上必须加上批驳上述偏向的一段文字之后，才好印发。

中央
辰世

为人民铁道报题写报头^[1]

(1949年5月)

人民铁道

The image shows the title '人民铁道' (People's Railway) written in a bold, expressive cursive calligraphic style. The characters are black and set against a white background. The '人' (person) is on the left, '民' (people) is in the middle, and '铁道' (railway) is on the right. The strokes are thick and fluid, with some overlapping and varying line thickness,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毛泽东为人民铁道报题写的报头。

[1] 人民铁道报于1949年5月1日在北京创刊。创刊之前，毛泽东应人民铁道报的请求题写报头，写了三张“人民铁道”，并在其中一个的右上角画了圈，然后捎话给铁道部和报社的同志：“你们让我写报头，我写了三个。你们看哪个好？我在一个上画了圈，你们看是不是可以用？”报社选择了毛泽东画圈的作为报头，一直沿用至今。

给张澜^[1]的信

(1949年6月1日)

表方先生：

艳电^[2]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3]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董必武

六月一日

[1] 张澜 (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人。1941年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被推为主席。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又长期担任主席直至逝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1949年5月29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胜利进军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

[3] 指罗隆基 (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主席等复电张澜欢迎来平

毛主席等复电张澜先生勋鉴，

人民解放战争爆发以来，短短一月，

不仅在野战队伍中相继解放，连上海亦

解放。再举到渡海，人民武装未解，人民解

得如此光荣胜利，确实确公赞赏。上海

著名大都市，国内及国际人才聚集于此，

商业之新繁荣，尤为新民主国家所利。值

此，困难重重，如何建设，如何建设，想早在新

民主主义中，溥先生确实曾先生兄弟来平

张澜印批

表方先生，他电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解放就

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

致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朱德、周恩来、董必武 六月一日

毛主席等复电张澜欢迎来平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

【新华社北平一日电】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中来电祝贺战争胜利及毛泽东主席等复电如下：

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先生、董必武先生勋鉴：人民解放军渡江以来，时仅一月，南京及苏浙鄂赣陕五省会相继解放，近则上海亦全部解放。蒋军到处崩溃，人民咸庆亦。人民解放军得到如此光荣胜利，确为诸公庆贺。上海为东亚著名大都市，国内及国际人才多集于此。今后工商业之新发展，尤为新民主国家所利。然值战后，困难较多，如何安定，如何建设，想早在新民主主义中，溥先生确实曾先生兄弟来平。张澜叩他(二十九日)。

表方先生，他电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解放就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 六月一日。

毛泽东修改的新华社消息《毛主席等复电张澜欢迎来平》的手稿及铅印稿。

在中共中央对第四野战军前委关于 进入江南新区指示的批复上加写的话

(1949年6月1日)

文中“努力发展生产”一句应改为“尽可能维持现有生产水平不使降低”，因目前的农村生产还谈不到发展。

第四野战军休整和作战的部署^[1]

(1949年6月2日)

林、萧、赵、聂：

三十日十六时电悉。(一) 同意你们各军到齐休整一短时期，然后三路或两路同时动作(惟十三兵团应先数日攻歼江北之敌)。此种计划可以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线，再作一个月休整，而在路上只作某些必要的小休息。为使白崇禧^[2]各部处于我军猛打猛追，骤不及防，遭我各个歼灭，如像刘邓^[3]由江边一气打到闽北那样，你们各军到达攻击准备位置之后，只要粮食状况许可，至少应休整半个月，恢复疲劳，统一意志，然后按计划攻击前进。(二) 程潜、李默庵、陈明仁^[4]有和我们合作反蒋反桂之可能性。李默庵到香港已和我方接了头，现今香港方面认真进行此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一参谋长萧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和副参谋长聂鹤亭的电报。

[2]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李默庵，当时任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陈明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

项工作。请你们亦利用张轸^[1]推动程潜站在我们方面，惟发动不可太早，应使白崇禧安心作战，待解决白部后，再发动归入我方。（三）四十二军决定留在河南甚好，重炮部队可留武汉镇守，湖北有桐柏、江汉、大别山诸部，保卫地方已够用，原定留在湖北的一个军可以南进。

军委
已冬

[1] 张轸，原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官，1949年5月15日在湖北武昌以南之贺胜桥、金口一带起义。

毛泽东
 半月恢复疲劳统一意志后按计划攻
 去前途(一)程潜李延虎陈明仁和我们合
 作及蒋反桂之可能性
 接了头 现正令香港
 作请你们利用地形
 站在我们方面惟
 安心作战待解决白
 方0军至已冬

汉口中央决定留在河
 武汉镇守() 湘有未
 保障() 地已用 京定留
 建。

已抄 林彪 稿 案
 發後即送回
 等類() ()
 批發
 1 NO 46
 附註 先發。在() ()
 內容 同意四月到作休整期休息 類

林有續辭：叶日始。对德志同意。各军到齐休
 整。短时期。三路或两路。同时动作。(惟叶
 兵团先取回政并江北之敌) () 此種
 计划() 可以齐頭並進。一氣打倒。廣州。柳州
 永州(零陵)之线。再作() 一个月休整。而存站。只
 作某些必要的小休息。为使白崇禧各部。不致于我軍極
 打。極線不及防。我各军。所派。如係。劉鄴。边
 直。一氣打到。到北。到桂。你们各军。到() 造成。重
 直。準備。位置。之後() 只零。釋。食。非。况。行。河。至少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第四野战军休整和作战的部署》的手稿。

入川入闽行动时间等问题^[1]

(1949年6月2日)

华东局，总前委，并告刘、张、李^[2]：

辰艳电^[3]悉。(一)同意二野入川，积极准备，在情况许可下，争取八月初出动。(二)小平须准备去四川。(三)干部问题请照中央昨电布置。(四)同意以叶飞三个军入闽，行动时间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五)攻青岛之一个军及一部炮兵可于已灰左右出动。

军委
已冬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总前委的电报。

[2] 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3] 指1949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总前委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今后美英试探性的进攻行为可能接踵而至，中央对此作有备无患的谨慎处置，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拟以八兵团一个军附炮兵一个团开青岛，约在六月上旬出动。叶飞第十兵团三个军拟休整一个月，于七月初开动，以便迅速夺取福建全省。二野入川势在必行，且宜早行，必须积极准备于八月初出动。最大的困难是干部问题，二野手中无一地方干部，中央有无此项准备，请告。小平同志是否需要入川，须请早示，以便考虑华东局的组织问题。”

中央局强前委，並去刘李，長整憲。(一)
同意二野入川，經程潛，在情况許可下，兩
八月出動。(二)小平須準備去四川。(三)韓
洪陸請照中央佈置。(四)同意以葉飛三
个軍入川，行動時間如能提早，則下向更好。
(五)攻青島之一个軍及一部砲兵可於巴灰左右
出動。軍委已定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入川入闽行动时间等问题》的手稿。

各外国不应再与国民党逃亡政府 发生关系^[1]

(1949年6月3日)

美国有利用国民党逃亡政府尚存在时期提出对日和约之可能，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指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再与该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该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司徒雷登返美问题给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复电时加写的一段话。

诱敌深入俟兵力集中再打

(1949年6月9日)

德怀^[1]同志：

齐电^[2]悉。(一)就现有兵力与马胡^[3]全力作战，似觉无全胜把握，不如诱敌深入，俟兵力集中再打较为适宜。(二)如你们认为有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机会，我们亦同意先打一仗。(三)请将诱敌深入，待本月底或下月初兵力集中时再打有何困难及不利之点，分析电告。

毛泽东

佳戌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指1949年6月8日10时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根据敌情，我们拟适当引敌深入，以二军位置岐山、扶风、眉县地区，节节阻击胡匪。三、四两军集结乾县附近，构筑纵深防御工事，吸引马步芳、马鸿逵部攻击。一军集结扶风地区。六军十日可集结礼泉及其以北。准备四个军歼击马部，待马部疲劳，攻击受阻，粮草发生困难时，全力举行反攻，包围歼灭之。”

[3] 马，指马继援、马敦静，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陇东兵团指挥官兼第八十二军军长和宁夏兵团司令官。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给任弼时^[1]的信

(1949年6月9日)

弼时同志：

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

敬祝健康！

毛泽东
六月九日

[1] 任弼时，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因病正在休养。

弼时同志：

送上子女一序，以资观
院。敬祝健康！

毛泽东

八月九日

毛泽东致任弼时信的手稿。



1949年，毛泽东在北平。

中共中央关于留用旧职员工人 工薪问题致华中局等电^[1]

(1949年6月10日)

华中局谭、陶^[2]，并告华东局，南京市委，西北局，山东分局：

谭陶辰敬^[3]电及华中局辰俭^[4]复电均阅悉。关于留用旧职员工人的工薪问题，据平津经验，工厂企业的职工在开始一短时期一般应实行原职原薪，其有部分不合理者，可在实行中逐渐调整之，领干薪者裁撤之，不必急于去制订新的工资标准，也不能在新的工资标准未订出以前，长期采取借支办法。临时借支的办法，时间不能拖长，解放后两三个月工薪还是借支，职工是不满意的，且必影响到职工生产的积极性，济南与淮南煤矿的经验也证明此点。至于对政府机关留用的旧职员，借支和原职原薪都只能在接管初期临时采用，接管工作结束后，可分别量材录用，既未必任原职，更不应拿原薪，原职原薪的办法用在这里一般是不适当的。我们认为这一经

[1] 这是毛泽东、刘少奇修改的给华南局的电报，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文中用黑体字排印的是刘少奇加写的文字。

[2] 谭、陶，即谭政、陶涛，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副主任。

[3] 辰敬，即5月24日。

[4] 辰俭，即5月28日。

验是比较成熟的，特介绍给你们斟酌采用。

中央
已灰

给胡乔木的指示^[1]

(1949年6月10日)

七一至七七全国各地举行纪念周。七一着重党的宣传，规模不要太大。七七举行军民示威游行，开大会，上海、南京、武汉、杭州、南昌、九江等城举行盛大的军队检阅及大示威，纪念抗日，反对美国扶日，要求早日成立日本和约，消灭国民党残余。请拟一内部指示，一单口号（可考虑分为两单，一是七一，一是七七）。

[1] 这是毛泽东将东北局关于纪念七一的报告批交胡乔木时的指示。

复彭德怀电^[1]

(1949年6月11日)

同意你的作战方针。作战时请注意先歼灭宁马^[2]一个军，然后再歼其一个军，各个击破，一次不要打多了。

[1] 10日，彭德怀电告毛泽东，认为如放弃在泾渭间作战，待6月底或7月兵力集中时再打胡、马，对我有诸多不利。如在泾渭间作战，虽我现有兵力不占优势，但胡军士气很低，胡、马互信差，麟游山天然分割胡、马联系，有利我钳胡打马。我十八、十九兵团正向西安前进，数日后我即稍占优势。这是11日毛泽东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宁马，指宁夏的马鸿逵。

致周恩来电^[1]

(1949年6月13日)

保安、延安时期，曾接济他家属一笔钱，后来因路断停止。请周考虑，俟福建解放后，由北平或请张鼎丞^[2]接济他家一些钱。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将傅连璋5月27日来信批交周恩来处理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傅连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

[2] 张鼎丞，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这时准备率华东南下工作团去福建。

致华东局等电^[1]

(1949年6月14日)

驻福州附近的国民党军第十七集团军侯镜如部参谋处长来港接洽。据称，十七集团军辖有七十三军、七十四军、一〇六军，已疏通到可无问题之地步。但因势单力薄，难于主动起义，希望和我们前线取得联系配合。

此事请你们通知叶飞、谭震林及福建省委引起极大注意，不要放弃一切可能性争取侯镜如各军反正。除由香港方面努力策动外，请你们即速研究与侯镜如取得联系的办法。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华东局，粟裕、张震、周骏鸣电的主要内容。周骏鸣，当时任华东军区副参谋长。

复粟裕、张震、周骏鸣等电^[1]

(1949年6月14日)

同意十兵团入闽行动日期延至六月二十五日，如果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延至七月上旬亦可。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粟裕、张震、周骏鸣并告华东局电的主要内容。

充分注意敌人中间突破的战法^[1]

(1949年6月15日)

彭、张、赵：

各电均悉。你们放弃三角地带，引敌深入准备反攻的部署是适当的，但请充分注意马^[2]匪有利用我军分置泾渭两路，中间薄弱，采取中间突破进取西安，使我两路不能联系之可能。如敌采此战法，你们是否有固守西安的可能和决心，或者放弃西安引敌入西安然后歼击，何者为宜。又如马匪占领西安，我一二两军是否能集中歼灭胡^[3]匪，首先打开一面的可能。均请电告。

军委

已删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的电报。同月11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注意先歼宁马一个军，然后再歼其一个军，各个击破，一次不要打多了。”

[2] 马，指马继援、马敦静，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陇东兵团指挥官兼第八十二军军长和宁夏兵团司令官。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1949年6月15日)

诸位代表先生：

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向全国人民提议召开的。这个提议，迅速地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响应。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

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

全国人民拥护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一次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现在，业已三年了。这一次战争是由国民党反动派在获得外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之下发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了一九四六年一月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了这一次反人民的国内战争。可是，仅仅三年时间，即已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所打败。不久以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阴谋被揭穿以后，人民解放军即已奋勇前进，横渡长江。国民党反动派的都城南京，已被夺取。上海、杭州、南昌、武汉、西安，已被解放。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各路野战军，正在向南方和西北各省，举行着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三个年头中，人民解放军共已消灭反动的国民党军五百五十九万人。截至现时为止，残余的国民党军，包括它的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在内，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了。肃清这一部分残余敌军，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已为期不远了。

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整个世界，除了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的胜利，没有不欢欣鼓舞的。中国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和世界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其意义是同一的。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齐看见了这样的事实：帝国主义者指挥中国反动派用反革命战争残酷地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用革命战争胜利地打倒了反动派。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唤起人们的注意，这即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只要还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做。再则，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全部崩溃的时代，帝国主义者业已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不论他们还要如何继续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总是有办法取得最后胜利的。

同时，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

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诸位代表先生：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这个希望的，并且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能满足这个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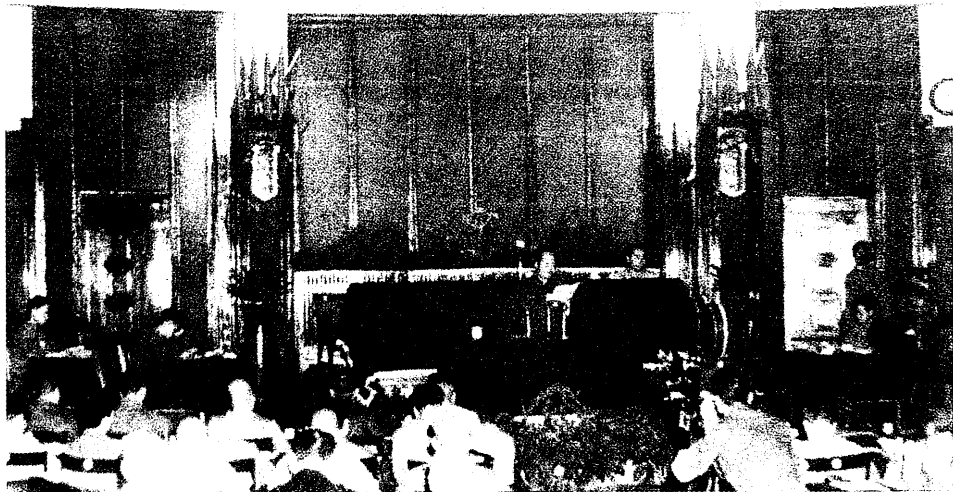
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毛泽东在北平中南海主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图为毛泽东在开幕会上讲话。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图为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



1949年6月，毛泽东等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合影。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

(1949年6月15日)

兹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如下：

第一 军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

制法：

一、旗面为红地，长方形，横直为五比四。旗杆套用白色，宽为旗面横长的十六分之一。旗杆为红黄二色相间之旋纹，上制黄色矛头。

二、由旗面的中心点向上下划一垂直中线，向左右划一水平中线，将旗面分为四个面积相等的长方格。

三、五角星及“八一”两字均为金黄色，位于上方近旗杆之长方格内。

四、将该长方格上下划十六等分，左右划二十等分，在上下八比八、左右六比十四处，定一点为圆心，以四等分长度为半径作一圆，用直线将该圆周的十五等分点联成一五角星，星的上角顶点在圆

心垂直正上方。

五、“八一”用汉字，每笔均系等边长条体。旗杆在左时，该二字置于五角星的右下方，并由左向右横写。旗杆在右时，则该二字应位于五角星的左下方，并由右向左横写。

六、“八”字每笔长三等分，宽一等分，置于一小长方格内。该小长方格的上边距水平中线向上七等分，下边距水平中线向上四等分，左边（如旗杆在右侧为右边）为由五角星之右上角尖（或左上角尖）向下所作之垂直线，右边（或左边）距垂直中线向左（或右）四点五等分。“八”字两笔的外侧六个直角尖端应紧接该小长方格的相当各边，内侧两个直角尖端相距约半等分。“一”字长为四等分，宽为一等分，该字下边距水平中线向上五等分，右边（或左边）即在垂直中线上。

各级军旗尺寸如下：

一、人民解放军总部 横一七〇公分，直一三六公分。

二、野战军（一级军区同）及兵团（二级军区同）横一六五公分，直一三二公分。

三、军（三级军区同）横一六〇公分，直一二八公分。

四、师（军分区同）横一五五公分，直一二四公分。

五、团（县指挥部或武装部同）横一五〇公分，直一二〇公分。

第二 军徽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为镶有金黄色边之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两字。

军徽用作帽花时，其制法及尺寸如下：

一、五角红星的圆周半径为十五公厘（略作二公厘高之凸形）
每个角均为三十六度，外镶一点五公厘宽之金黄色边。

二、“八一”为宋体汉字，适当地直置于红星内。

军徽用于臂章、奖状、文书、车、船、飞机及建筑等物时，则按照上述尺寸比例放大或缩小。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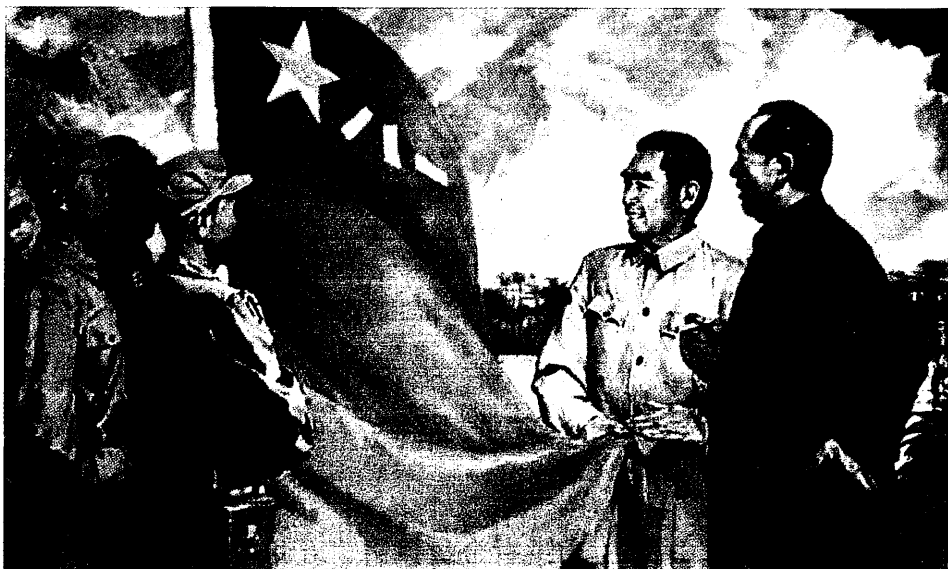
副主席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第一面军旗》（油画）

给张轸将军及前国民党军 十九兵团的复电^[1]

(1949年6月16日)

张轸将军及前国民党军十九兵团全体官兵们：

五月二十三日通电读悉。我们对于贵部在华中前线的举义，表示欢迎。希望贵部官兵团结一致，努力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制度，改进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行列。国民党军的残余力量现已为数甚少，欲图抵抗，势将迅速被消灭。我们号召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中凡属有爱国心的将领如贵将军一流人物，愿意率部脱离反革命营垒，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者，我们均表欢迎。他们过去的罪责，将因他们的有益于人民事业的行为而获得宽恕。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

[1] 原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兼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率部起义后，于1949年5月23日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坚决脱离反动阵营，投入人民怀抱，拥护中国共产党一切主张和政策，并向人民领袖致敬。这是毛泽东、朱德于6月16日给张轸部的复电。

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1]

(1949年6月16日)

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庆祝光明日报出版。

毛泽东

[1] 《光明日报》创刊于1949年6月16日。1949年6月，毛泽东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

團結起來
光明在望
慶祝光明日報出版
毛澤東

毛泽东为《光明日报》创刊的题词。

粮食困难行动时间可酌情推迟^[1]

(1949年6月17日)

林、邓、萧、赵：

十二日电^[2]悉。粮食困难恐不但鄂南、赣北如此，湘南、赣南可能有同样情形。大军前进必须依靠铁路、公路运输，行动时间如需推迟至七月上旬，可由你们酌情酌定。并须估计到大军深入湘赣后，因等候后方运粮，行动速度可能颇慢。如何克服粮食困难，请你们用大力筹划。

军委

已篠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2] 指1949年6月12日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粮食问题现成为影响行动的根本问题。赣西北、鄂南粮食已成为严重的困难，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依靠河南、湖北两地运粮到前方去。四野主力于6月初停止于长江与襄河以北就粮和休整，以待粮食的筹集，准备在6月底或7月初再发动作战。

第二野战军西进似以九月为宜^[1]

(1949年6月17日)

华东局，并告粟、张、周及刘、邓、李^[2]：

(一) 同意已删电意见，将华东军区及三野指挥机构设在南京，并以粟裕兼南京军管会主任及市委书记，唐亮为副主任、副书记，使二野能逐步抽出人来做准备西行的工作。(二) 二野西进时机似以九月为较适宜，一则准备时间较充裕；二则沿途那时才能有粮食；三则四野主力（七个军）九月可到郴州、赣州线，十一月可能占广州，迫使广州伪政府迁至重庆，然后二野夺取重庆较为有利。

中央军委
已籛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报。

[2] 刘、邓、李，指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来东局，并告粟烈周，及刘邓李同意已
删电意，并兼管区及三野指挥机构设在
南京，以粟裕兼南京军区司令及市委第一书记，二野
逐步抽出人来作准备西进的工作。(一)二野西进
时机似以九月为较适宜，则准备时间较充裕，测
试运粮时才有粮食，三则四野^部（七军）九月
可到~~柳州~~柳州赣州线，十月可到梧州，以便柳州沿
政府迁至重庆，然后二野夺取重庆较为有利。快转
(已转)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第二野战军西进似以九月为宜》的手稿。

在薛愚^[1]的来信上批示

(1949年6月19日)

北大医学院与军委有房屋争执，请聂^[2]令朱早观^[3]查明处理，以结果告我。如无大碍，宜让与北大。

[1] 薛愚 (1894—1988)，药物化学家和药学教育家，湖北襄阳人，当时任北大医学院药学系主任。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

[3] 朱早观，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钳制马继援等部消灭胡宗南的作战部署^[1]

(1949年6月20日)

彭、张、赵：

(一) 根据马继援^[2]拟向泾阳、三原进攻的情报判断，马匪不知我十九兵团将到三原，故有先击破我许兵团，灭除侧翼威胁的计划。当马继援向泾阳攻击时，胡^[3]匪如何动作请你们注意侦察，我们判断，胡匪不外两途：一是以全力担任钳制我渭南各军，保证马匪右侧之安全；二是马、胡同时向我泾北、渭南举行攻势。不论胡匪采取何种计划，均给我军以首先歼灭胡匪的机会。希望你们针对先打胡匪的方针，迅速集中王周两兵团^[4]主力，于马匪向泾阳攻击之际，突然发起对胡军的攻击，以歼灭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为目标。(二) 当你们举行对胡匪三个军作战时，马继援全部及马敦静^[5]一部因受我许兵团威胁是不能增援的，但你们应以一部由咸阳向马敦静佯动，使马敦静完全不能增援。(三) 在你们歼灭胡匪三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的电报。

[2] 马继援，当时任国民党军陇东兵团指挥官兼第八十二军军长。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4] 王周两兵团，指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和第十八兵团，兵团司令员分别为王震和周士第。

[5] 马敦静，当时任国民党军宁夏兵团司令官。

个军的作战获得胜利后，只要我军损伤不大，尚有追击的能力，就应以王周两兵团主力迅速向凤、宝、千、陇^[1]方向前进，以期歼灭胡匪余部及甘肃王治岐军^[2]并占领凤、宝、千、陇，以利尔后配合许杨^[3]向两马作战。（四）两马兵力在胡匪主力（三个军）在户县以西地区被歼后，必不敢恋战，必将缩回长武、彬县、平凉地区固守待战，因为我杨兵团要本月底才能在三原集中，至快要下月上旬才能协同许兵团作战，故于王周两部本月底攻击胡匪主力于户西地区时，单独使用许兵团绕出彬县、永寿地区，切断两马退路，包围两马以利下一步作战似乎有困难，甚至不可能。故我们主张王周主力于歼灭胡匪三个军后，应一直向西歼其余部，占领凤、宝、千、陇，完成对平凉作战的战略开展，对两马则让其退回平凉，然后我以王、周、许、杨十二个军全力向平凉两马攻击，似较有利。（五）以上意见是否适宜，请你们考虑电复。

军委
已寄

[1] 凤、宝、千、陇，指陕西凤翔、宝鸡、千阳和陇县。

[2] 王治岐军，指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属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

[3] 许，指许光达。杨，指杨得志，当时任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

致华东局等电^[1]

(1949年6月21日)

在你们面前目前几个月内有四件大工作：（一）经营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赣新占城乡广大地区；（二）占领福建及厦门；（三）帮助二野西进；（四）准备占领台湾。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华东局，粟裕、张震、周骏鸣电的主要内容。

复吴奇伟将军等电^[1]

(1949年6月22日)

【新华社北平二十二日电】毛主席、朱总司令本日复吴奇伟将军一电。该电称：

吴奇伟、李洁之、曾天洁、萧文、魏鉴贤、董举初、魏汉新、张苏奎诸先生：

接读诸先生五月十四日宣言，决心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极为欣慰。希望你们遵守人民解放军制度，改造部队，与人民解放军整个力量协同一致，为解放广东全省而奋斗。同时，告诉广东的一切国民党军，凡愿脱离反动派，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者，我们将一律不究既往，表示欢迎。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1] 1949年5月原国民党将领吴奇伟、曾天洁等在粤东闽西率部起义，并于5月14日发表宣言，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向华南进军。毛泽东、朱德复电对此表示欢迎。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消息。

新华社二十日北平电 > 毛主席 朱总司令
 日覆 吴奇伟将军等电 读后
 吴奇伟、魏道明、曾天谋、萧文、魏德明、
 魏道明、魏道明、曾天谋、萧文、魏德明、
 的声明，决心脱离国民党，加入人民解放军，
 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极为欢迎。希望
 人民解放军整个战线一致，为解放广东
 而奋斗。同时，我们热烈欢迎广东一切
 国民党凡愿脱离国民党加入人民解放军者
 一律不究既往，表示欢迎。
 毛泽东
 朱德
 二十日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复吴奇伟将军等电》的手稿。

对付敌军分向渭南泾北进攻的对策^[1]

(1949年6月22日)

彭、张、赵：

已养电悉。假如胡马^[2]各敌照你们来电所述，分向渭南、泾北进攻，则你们的作战计划是正确的，但请注意：（一）以许兵团^[3]由泾北转至渭南，难于保持秘密，似不如令杨兵团^[4]改开西安集中，留许兵团就地钳制马匪，或退至三原诱马深入较为适宜。又一个军不足钳制马匪，至少要有两个军。（二）须估计到胡马各匪可能不战而退的情况，假如这样，则部署须准备及时改变。以上请酌情处理。

军委
养申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的电报。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马，指马继援、马敦静，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陇东兵团指挥官兼第八十二军军长和宁夏兵团司令官。

[3] 许兵团，指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兵团司令员许光达。

[4] 杨兵团，指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得志。



1949年，毛泽东在北平。

复上海市委等电^[1]

(1949年6月23日)

(一) 同意你们已巧电^[2]为惩办布雷谣言制造者的各项处置。
(二) 帝国主义者正在采用利诱和威迫的两种手法，正在采取争取合法地位（以便从内部进行破坏）和继续援助国民党的两面政策，只有坚决而又适宜的斗争，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巩固自己和战胜敌人。
(三) 上海和武汉等地息息相关，你们在上海等地采取的各项措施，应随时通知林、邓^[3]，林、邓方面在武汉等地所取措施亦应随时通知上海。
(四) 对紫石英号的方针，必须英方承认不得人民解放军同意擅自侵入中国内河是错误的这一点（不着重谁先开枪，因为这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重要的是擅自侵入内河，只要是擅自侵入，我军就必须打它和扣留它；也不要着重正当渡江的时机，重要的是擅自侵入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内河，不管什么时机，都是不能许可的），才能释放，否则决不能释放。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上海市委并告南京市委及华中局电的主要内容。

[2] 指中共上海市委6月18日致中央电。电报中说，上海英美报纸和新闻单位散布国民党退出上海时在长江口布设了水雷的谣言，恐吓群众，上海市军管会将责令英商《字林西报》等英美报纸公开承认错误，并给以严重警告。

[3] 林、邓，指林彪、邓子恢。

复华中局电^[1]

(1949年6月24日)

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你们即可以按照你们所设计的三个步骤去部署城乡工作，这样做并不违背二中全会而正是二中全会总方针的正确执行。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华中局并告华东局、二野及西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复华南分局等电^[1]

(1949年6月24日)

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请你们争取时间迅速地巩固这些胜利，扩大军队及地区，以迎接第四野战军的到来，并准备于十一月、十二月或明年一月间占领广州。你们应在东江、韩江及闽西三区放手招收大量青年学生，开办数千人的学校训练干部。同时按照可能性，抽调一千至二三千老的和较老的工作干部加以训练，为准备接管广州及其他大城市之用。同时应令香港训练干部，亦可招收一批广州学生来东江训练。总之，接管全省的工作干部主要地应由你们负责准备。加强广州地下市委工作的领导，积极发展党员，准备里应外合的条件。对桂林、昆明两城的地下党组织，亦应令当地加强注意力。

[1] 这是毛泽东在收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2日关于广东东江、韩江两地区战绩情况报告后，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香港工委电的主要内容。

给胡乔木^[1]的信

(1949年6月24日)

乔木：

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似不宜用新华社社论形式，而用你的名字为宜），拟一单纪念七七的口号（纪念七七，庆祝胜利，宣传新政协及联合政府，要求早日订立对日和约，消灭反动派残余力量，镇压反动派的破坏和捣乱，发展生产和文教）——此两件请于六月最近两天拟好，以便于六月二十八日发出，六月二十九日各地见报。写一篇七七纪念论文（带总结性），此件须于七月二日写好，三四两日修改好，五日广播，七日各地见报。起草一个各党派的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此件亦须于七月二日写好，以便交换意见。以上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请你好好排列时间，并注意偷空睡足觉。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

《英美的外交——特务外交》^[2]一文甚有用，请令全文播发，提起警惕性。

毛泽东

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时

[1] 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新华通讯社社长。

[2] 此文载于1949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祝涅克索八十寿辰的贺电

(1949年6月24日)

敬祝丹麦革命文豪及世界民主和平事业的伟大战士涅克索同志的八十寿辰。

钳制两马歼灭胡宗南四五个军^[1]

(1949年6月26日)

彭、张、赵：

根据近日情报，马^[2]匪各部业已准备向彬长^[3]撤退，胡^[4]匪各部势必同时向宝凤^[5]撤退，决不会再前进了，也不会保守不退。在此种情况下，你们应当集中王周两兵团^[6]全力及许兵团^[7]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兵团^[8]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的电报。

[2] 马，指马继援、马敦静，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陇东兵团指挥官兼第八十二军军长和宁夏兵团司令官。

[3] 彬长，指陕西彬县和长武。

[4]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5] 宝凤，指陕西宝鸡和凤翔。

[6] 王周两兵团，指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和第十八兵团，兵团司令员分别为王震和周士第。

[7] 许兵团，指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兵团司令员许光达。

[8] 杨兵团，指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得志。

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以上意见是否适当，请酌情处理为盼。

军委
已宥

致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电^[1]

(1949年6月26日)

我们向你们提议召开会议讨论下列两篇文章：（一）《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匪徒》，（二）《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2]这两篇文章是新华社于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的社论，各地报纸谅必均已登载。希望你们不要一看了事，要召开会议针对社论所指出的问题，检讨自己的工作，并做出简明决议，指示全党实行。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必须提起高度的警惕性，并拿出具体解决的办法，千万不可采取轻忽态度，是为至盼。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并请转发各市委，各省委，各区党委，军队的军、师、团委，地方的地委、县委，各级政府部门、财经部门、文教部门内的党组，职工会、青年团、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内的党组以及宣传系统中（通讯社及报纸）的同志们电的主要内容。

[2] 这两篇文章中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捣乱和破坏活动，不少地方的国家工矿企业接连发生火灾和被毁事件，要求提高警惕，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

对进军西北和川北的部署

(1949年6月27日)

德怀^[1]同志：

二十六日电^[2]悉。(一)如青宁两敌^[3]只作小撤退，位于乾、永、彬、常宁、南坊、通润^[4]地区，而不是向彬、长、泾、凉^[5]作大撤退，则先打两马^[6]后打胡王^[7]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指1949年6月2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十九兵团7月4日可在三原附近集结完毕，拟于7月8日开始向敌进攻。拟以十八兵团钳制王治岐军，十九兵团及一、二两兵团首先围歼马继援、马敦静部主力，然后以1个兵团相机向平凉追击，3个兵团向胡王匪进攻，如马匪继续西撤平凉、长武线防守时，拟以十九兵团位置乾县、礼泉、永寿监视马匪，集中一、二兵团及十八兵团围歼胡匪及王治岐部，夺取宝鸡、陇南，作解放汉中准备，如胡匪主力被歼，则乘胜追击至汉中、广元。

[3] 指青海马继援和宁夏马敦静，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陇东兵团指挥官兼第八十二军军长和宁夏兵团司令官。

[4] 乾、永、彬，指陕西乾县、永寿和彬县。常宁，镇名，位于陕西永寿县中部。南坊，镇名，位于陕西礼泉县西北。通润，镇名，位于陕西淳化县北部。

[5] 长、泾、凉，指陕西长武和甘肃泾川、平凉。

[6] 两马，指马继援和马敦静。

[7]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王，指王治岐，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属第一一九军军长。

王为费力，必须充分准备，从精神动员到作战技术都要力求准备充分，并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的牺牲，以期全歼两马或歼其主力，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因此午齐开始作战，对于刚到数天的十九兵团说来是否早了一点，值得考虑，似不如推迟若干天，使十九兵团充分恢复行军疲劳，并使各部准备更好些，请酌定。（二）如两马向彬、长、泾、凉作大的撤退，距离胡王较远，十九兵团只须负担钳制两马任务（仍要小心），则午齐（或午灰）开始作战是可以的。（三）广州伪府正在作迁移重庆的准备，大批工作人员已去重庆。我林罗^[1]七个军（其余六个军位于豫鄂湘赣四省任守备）可于八九两月到达湘粤桂边区，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广州、桂林等地。广州伪府迁渝时间，当在九、十月间。我刘邓^[2]九个军，可于九月由现地出动，十二月前后到达并占领重庆、贵阳等处，以期歼灭伪府，开辟长江上游。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现有一派主张迁台，但不占优势），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四）你们在执行当前战役，占领宝、凤^[3]、泾、凉后，看青宁胡王四敌主要是青宁两敌被歼程度如何，再决新的部署，如两马主力被歼，进一步解决兰州、青海、宁夏及甘肃西部已无重大困难，则可以按照二中全会时商定的计划，早日分兵为两支。第一支西进，担负解决甘宁青新四省（我们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

[1] 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和第一政治委员。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宝、凤，指陕西宝鸡和凤翔。

州，取得油源。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取得更大油源，这是极端重要的任务)，这一支兵力的数量以能担负解决上述任务为原则。第二支南进，以占领成都解决川北为目的，出动时间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不可太早，宁可稍为缓一点，以期聚歼胡匪，不使逃入云南。现白崇禧^[1]正在部署以桂系兵力退据云南，若再加胡宗南部，则我们解决云南势必要使用大量兵力，而使用大量兵力到云南去，例如五六个军，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现在预计以林罗一部由广西，刘邓一部由贵州合击昆明，总数希望不超过三个军。（五）如果青宁胡王四敌的主力特别是青宁主力不能在泾、凉、宝、凤及其以东地区被我歼灭，则你们暂时不能作大的分兵。那时，为了免除西进路上的侧翼威胁，可以考虑以主力先给胡匪以打击，然后西打两马，待两马主力歼灭后再分兵。（六）请根据上述意图部署一切，此电请给贺龙^[2]同志一阅，并征求他的意见。

毛泽东
已感

[1]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2] 贺龙，当时任西北军区司令员。

给周谷城^[1]的信

(1949年6月28日)

谷城先生：

得书甚慰，如见故人。革命高涨，大家都是高兴的。前途尚多困难，惟有团结最大多数民众，方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反抗。相期共同努力！敬颂
教祺！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1]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当时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教务长。

致林彪、邓子恢、谭政、陶铸电^[1]

(1949年6月28日)

广东现有大量的人民游击部队和大块的游击根据地，如果曾生的两个有战斗力的小师整训得有成效，将来开入广东配合游击队工作可起大作用，加上你们的一个至两个军就可以解决广东问题。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寻求两广纵队帮助解决广东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邓子恢、谭政、陶铸电的主要内容。

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1]、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

[1]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后，他联合1300多名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主张改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1898年光绪皇帝任用他和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参与政事，试图变法。后来顽固派的代表慈禧太后重握政权，维新运动遂告失败。康、梁逃亡海外，组织保皇会，同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相对立，成为反动的政治派别。康有为的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

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即美国没有受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

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

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1]。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

[1] 武松是中国著名小说《水浒传》中的一个英雄，他在景阳冈打虎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极广。

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的，列宁和斯大林早已告诉我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并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也是这样。人民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末，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这件事，中国人民的经验是太多了。孙中山临终时讲的那句必须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话，早已反映了这一种经验。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

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它们的政府和我们一起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

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1]。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本文不打算多谈经济问题，这里不来详说。

[1] 关于农业社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关系问题，参见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省委、市委和区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第七部分和第八部分。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同志根据苏联的经验和我国的实践，对于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应当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问题，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二十二年，到现在才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

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孙中山所说压迫平民的近世各国的资产阶级，正是指的这些人。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

[1] 这是朱熹在《中庸》第十三章注文中所说的话。

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还很小。现在没有可靠的数目字，根据某些材料来估计，在抗日战争以前，现代工业产值不过只占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

“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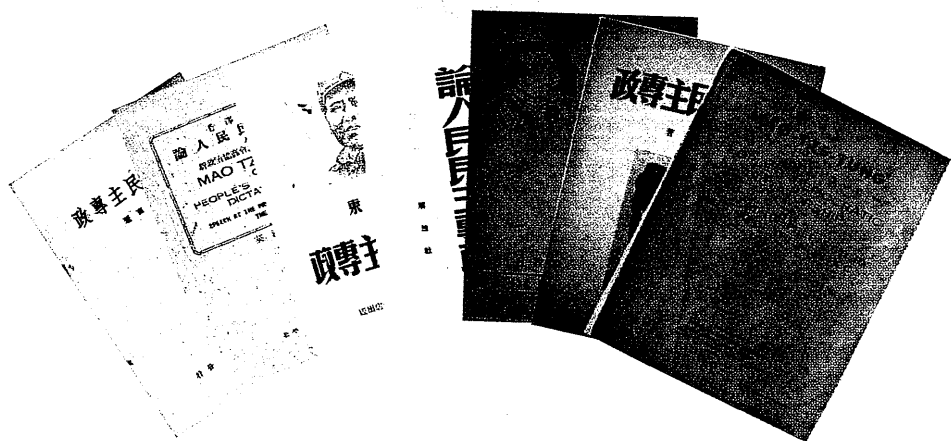
我们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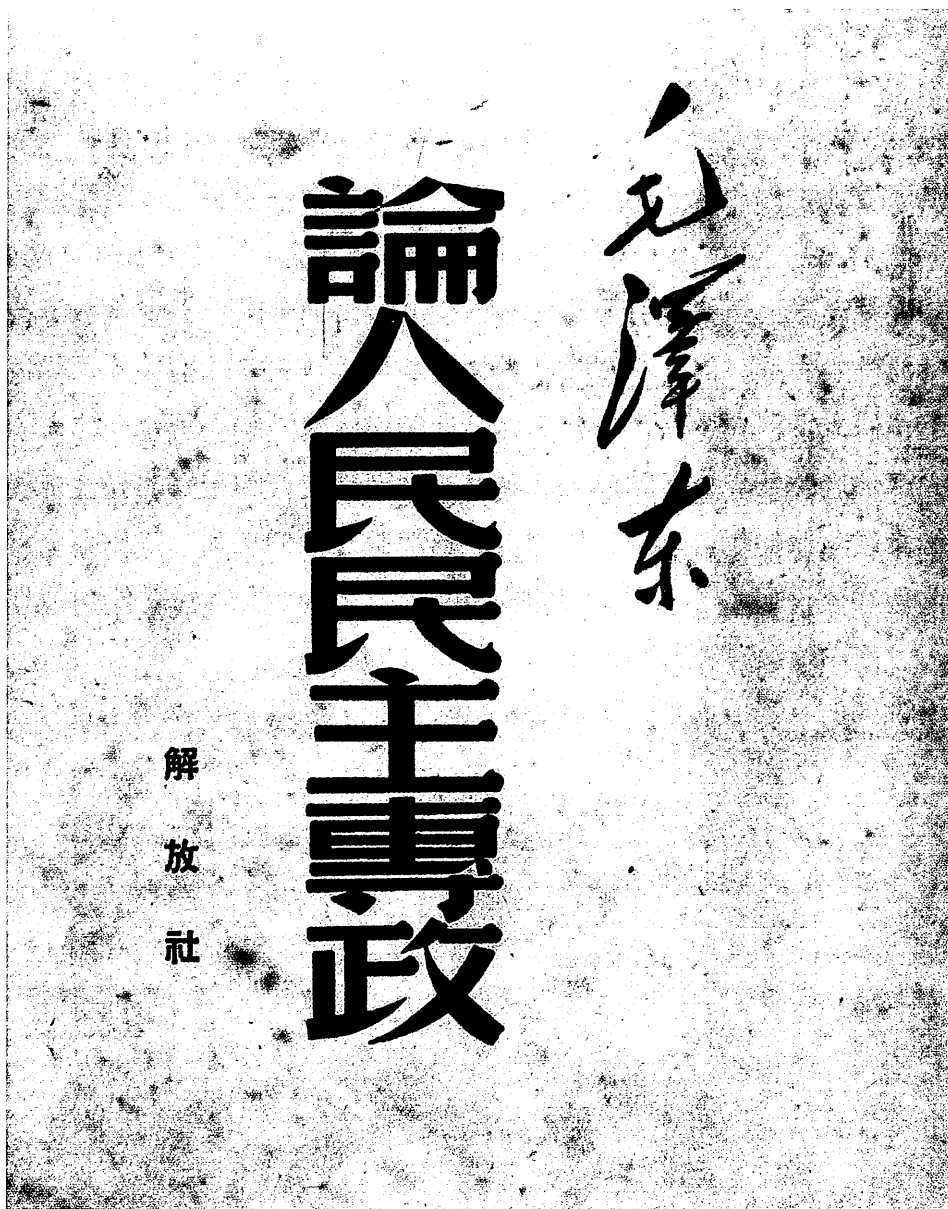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

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部分版本）。



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图为1949年7月解放社出版的单行本。

人民民主专政，或叫人民民主专制，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结构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办实行专政，实行专政，实行专制，压迫这

毛泽东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手稿（部分）。

为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塔题名

(1949年6月)

革命烈士纪念塔

毛泽东

革命烈士纪念馆
毛泽东

毛泽东为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馆的题名。

中共中央电贺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

(1949年7月1日)

【新华社北京一日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贺二月在北平开幕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电文如下：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诸位代表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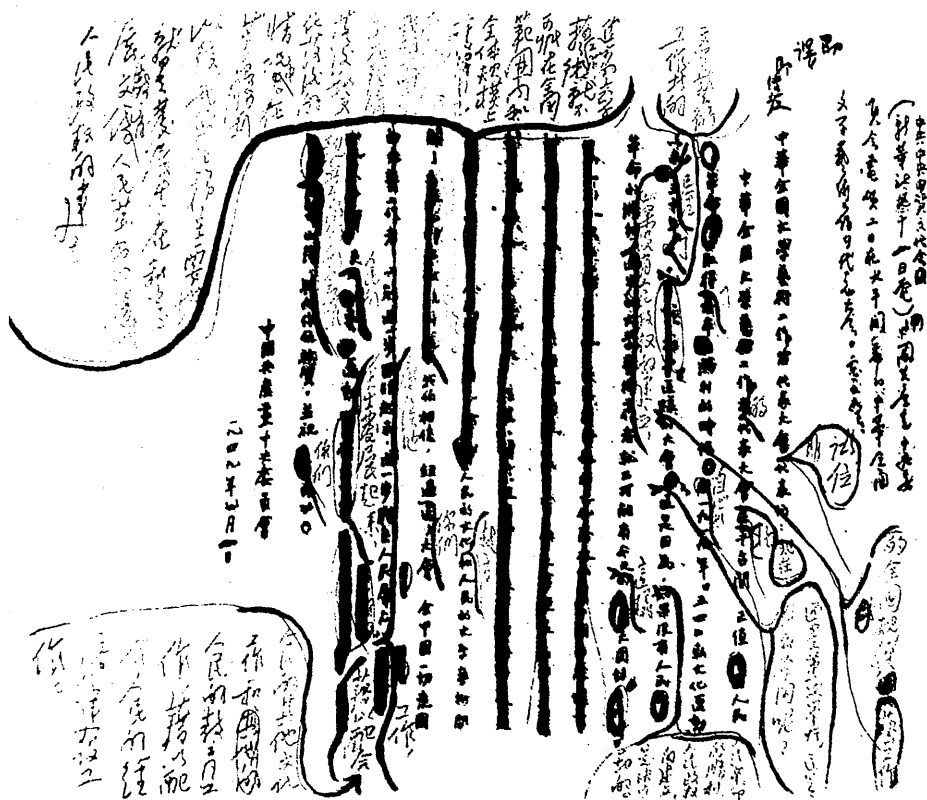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代表大会现在在北平召开，正值人民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的时候。自从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年了，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大会还是第一次举行，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人民革命的胜利，人民政权的建立，是决定一切的。如果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人民政权的建立，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团结，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就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获得自己的发展。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我们相信，经过你们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

[1] 这是新华社根据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贺电编发的消息。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大发展起来，藉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藉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现当你们的会议开幕之际，特向你们致贺，并祝你们成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



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电贺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手稿。

为华北军政大学成立一周年题词^[1]

(1949年7月1日)

为着消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为着保卫人民共和国，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毛泽东

[1] 华北军政大学是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解放区培养军事、行政干部的学校，它是在原晋冀鲁豫解放区抗大分校的基础上于1948年成立的，1949年正值华北军政大学成立一周年之际，毛泽东为之题词。

为多事流，减国民党残余力量
努力斗争，保赤会共和国
努力斗争，保赤会共和国
毛泽东

毛泽东为华北军政大学成立一周年的题词。

为《新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题词

(1949年7月2日)

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毛泽东

團結起來
參加生產和建設
改善婦女的經濟地位
和政治地位
毛澤東

毛泽东为《新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的题词。

哀悼季米特洛夫的唁电^[1]

(1949年7月3日)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诸同志：

惊悉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季米特洛夫同志因病逝世，不胜哀悼，特电致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日

[1] 国际工人运动卓越领袖、保加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乔治·米哈依洛维奇·季米特洛夫于1949年7月2日因病在苏联逝世。这是毛泽东给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唁电。

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1]

(1949年7月4日)

林、邓，并王、萧^[2]：

(一) 王萧陷电及程潜备忘录^[3]均悉。此事请林邓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二) 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编整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三) 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军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和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等的电报。

[2] 王，指王首道，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萧，指萧劲光，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1949年6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向中共湖南省工委递交的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表示愿意站在反蒋、反桂、反假和平的立场上，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和谈八条二十四款的原则，谋取湖南局部和平。湖南省工委派人将备忘录送到武汉，由王首道、萧劲光转报党中央和毛泽东。

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四）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五）李明灏^[1]已到否。

军委
午支

[1] 李明灏，民主人士，1948年到解放区，当时任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他和程潜、陈明仁都是湖南醴陵人，大革命时期，他在程潜兼任校长的陆军讲武学校任教育长，而陈明仁曾是程潜和李明灏的学生。由于这些联系，当时中共中央军委和第四野战军乃派他以解放军代表的身份去做程、陈的工作，推动程、陈起义。

此^并请你们考虑。军委手支

已林彪，已林彪
发午 NO 134
附註 朱凤同志收
内容 对程潜方针

中央军委
抄送战部
友与 NO 118

林彪在王青全青陪都程潜消息录均悉
此事清林部注意我们认为是程潜想度是
好的在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
问题(一)程潜所提条件但联合指挥机构保留
其军队番号加以编整等项(二)等
三项要求均可照准(原则上)是孔即成立军事上
组织定具体办法(三)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
快(三)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反(四)解决我军
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五)请林部考
虑程潜现任军政老(六)加党各项职务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的手稿。

给程潜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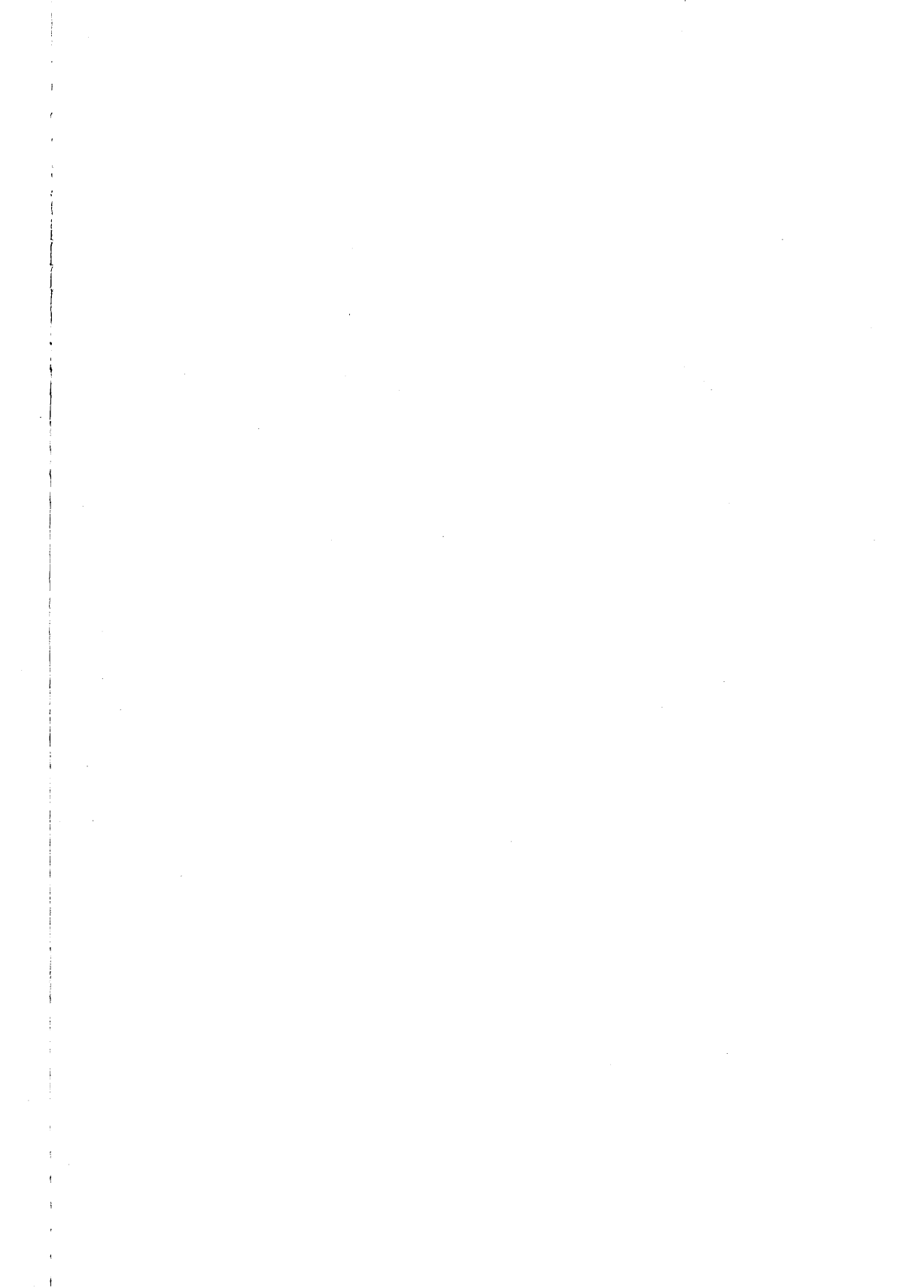
(1949年7月4日)

颂云先生勋鉴：

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毛泽东

午支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26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0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